

CNG

CHINESE NATIONAL GEOGRAPHY

中国国家地理

2009.4
总第582期

福建
专辑
上

福建 中国海洋文明的代表？

港口 海上零公里
滩涂 耕海牧渔
海岛 山海装订线
福船 领航风帆时代
海峡 是非场还是欢喜地？

ISSN 1009-6337



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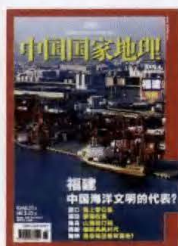
9 771009 633001

RMB20元
HK\$25元

国内统一刊号 CN11-4542/P
邮发代号 2-006



2009
4



闽在海中。

这句出自《山海经·海内南经》的古语，似乎能诗意地道出福建与海洋千丝万缕的关系。

濒海与多山的福建位于欧亚大陆东南隅，背倚众多山地，面朝太平洋，这种独特的地理单元，使福建天然地具备了归顺大海的气质。所以，这块土地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与海外产生联系的区域之一；所以，这块土地上的人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向海外发展的人。

如是，我们的福建专辑策划中，离不开海，离不开山。上辑我们是围绕着海洋来结构文章，下辑自然就是山了。那么，上辑的封面我们是离不开海洋了。

第一张是港口。福建拥有众多的良港，其中的

福州、泉州、漳州、厦门四大港口在不同历史时期此起彼伏地成为中国的海上门户，宋元极盛时期，泉州港还是中国的海上零公里处。而厦门港不管是在清代还是在今天，都举足轻重，图片中的厦门港，远远眺望，这座目前在港口综合实力排名中位居福建第一、全国第七、全球第二十二的天然良港一派繁荣。第二张是滩涂。漫长而曲折的海岸线，平添了众多的天然海湾、滩涂，这给福建的海水养殖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耕海牧渔的渔民们在创造物质财富的时候，不经意地创造了一些赏心悦目的美景。罗源湾的海上网箱养殖人家，便是其中的一道风景。第三张是海岛。辽阔的海域与山岭遍布的陆地，让福建仿佛是一部打开的“山海经”。而众多的海岛，则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山与海交融的最前沿。这块形似海鸟的礁石，诡谲异常，极具视觉冲击力。摄影师蓝添艺在拍摄她时，一脚踩空，摔成股骨粉碎性骨折，这是他在病床上给我们传来的图片。第四张是福船。中国帆船的建造与航海技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领先于西方，是中国古代海洋文明成就的佐证之一。其中福船功不可没，曾经浩浩荡荡的郑和船队，大部分都是福船。图片中泉州沿海的渔船，恍若那个帆船时代的缩影。

最终，我们选择了渔船作为封面。天空中，云破处，夕阳下，历史的雾霭，曾经的辉煌，今日的落寞，在这张图片中，弥漫开来……



《中国国家地理》全国读者服务网——南宁站成立

2009年2月18日，《中国国家地理》全国读者服务网第16个服务站点——南宁站成立，发行部主任连建华出席了揭幕仪式。

1 连建华主任（右）和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长军（左）为南宁站的成立揭幕。

2 读者在服务站内挑选刊物



地址 / 南宁市秀林路西一里3排4号（南宁第六人民医院对面）电话 / 0771-2173546 13481193559 联系人 / 施经理

行走天下之中国国家地理栏目开通

日前，《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与北京交通台联合主办的“行走天下之中国国家地理”栏目开通，每月两次在北京交通台播出。来自《中国国家地理》的资深编辑、特约学者专家将与听众一起交流，既有地理等自然科学的人文解读，又有行走天下的实战故事。

活动

穿越高黎贡山 野生动植物考察

位于怒江西岸的高黎贡山被喻为“世界物种基因库”。4月，让我们沿西南丝绸古道徒步穿越高黎贡山，跟随专家考察类型多样的森林生态系统，寻觅红腹锦鸡、灰叶猴、云南红豆杉、大树杜鹃等种类繁多的珍稀野生动植物。

时间：4月20—24日 地点：高黎贡山、腾冲
费用：4800元/人 预付报名款：2000元/人



摄影 / 杨小春

候鸟寻踪——扎格斯台淖尔观鸟

位于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中的扎格斯台淖尔是候鸟迁徙途中的驿站。5月，冰湖始解，波色乍明，天鹅、蓑羽鹤等珍稀的野生鸟类成群聚集于此。让我们与鸟类专家同行，寻鸟于蓝天之下，观鸟于碧水之间。

时间：2009年5月1—3日 地点：内蒙古正蓝旗扎格斯台淖尔
费用：1800元/人 预付报名款：500元/人

特别提示：根据天气情况及其他，活动路线及行程可能会有调整。最新活动详情及报名方式请访问中国国家地理网（www.dili360.com）会员活动频道或来电咨询：010-64852136 64845374

预告

中国国家地理大讲堂

水下摄影世界 2009年5月7日

主讲人 / 吴立新 国内著名水下摄影师，2007年获得“世界水下摄影锦标赛”微距（含虾蟹）类银奖。目前他已将摄影对象转向国内，用影像展示中国真实的水下世界。

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 2009年5月21日

主讲人 / 周剑生 著名华人摄影家，日本PPS通讯社、日本世界文化图片社签约摄影师。1994年开始从事以“世界遗产”为主题的环球摄影取材，足迹遍及近80个国家和地区。曾多次在国际、国内举办影展。



摄影 / 徐健

首届中国国家地理 “花影炫色”摄影大赛

花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礼物，绚丽、静谧、神奇而不失优雅。让我们透过镜头，搜索花的美丽身影，记录花的绚丽姿态。

首届中国国家地理 “荒野传奇”摄影及DV大赛

野生动物是人类的朋友，它们精巧而艳丽，狂野而机敏。让我们通过相机和摄像机，捕捉野生动物精彩的瞬间，记录野生动物世界演绎的传奇故事。

以花卉摄影为主题的首届中国国家地理“花影炫色”摄影大赛和以野生动物为主题的首届中国国家地理“荒野传奇”摄影及DV大赛均将于5月5日开始征稿。

摄影 / 徐健



摄影 / 赵超

以上讲座 **免费** 向公众开放，有关讲座及摄影大赛的详细信息请关注中国国家地理网（www.dili360.com）会员活动频道。

一个中国海盗的心愿

撰文/单之蔷

海盗王直的心愿

咚……咚……有人敲门,我知道送书的来了。我在当当网上买的几本书:《倭变事略》、《筹海图编》……,这是几本记录明代嘉靖年间倭寇事情的书。

这些天来,我不断地买书查书,书都是关于当年倭寇的书。我被一个疑问紧紧地抓住了,欲罢不能。

我在网上看到一段关于倭寇的文字,写的是倭寇的首领王直(一作汪直)被杀时的情景,王直不是日本人,而是安徽歙县人,这让我很惊讶。倭寇的首领竟然不是日本人?我可是从小在教科书中读着戚继光抗倭的英雄事迹长大的。一种强烈的愿望让我去了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找来一册册明史,看那些抗倭名将的传略,不仅仅是戚继光,还有朱纨、胡宗宪、俞大猷、曹邦宪、唐顺之等等,我要在其中找这些抗倭名宦和名将打了哪些仗,杀了哪些倭寇;我又找到了当年的一些书,《倭变事略》、《筹海图编》便是其中的两本。

《筹海图编》是明代江苏昆山人郑若曾所著,他曾被浙江巡抚平倭的总督胡宗宪招至幕下,亲自参与了平倭的过程。他的书当属记实,或者说具有权威性。在这本书中我看到了“擒获王直”一章,“王直,歙人也。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舆,以故人宗信之”……王直曾与朋友一起商量去海外经商谋生,原因是“中国法度森严,动辄触禁,孰与海外乎逍遥哉?”后来王直去广东,造巨舰,运载着一些生丝和硝磺等,去日本、暹罗、西洋诸国,五六年的时间,王直就发了大财。

嘉靖十九年(1540年),王直与李光头、许栋等商人在宁波的双屿岛与佛郎机(葡萄牙)、倭人(日本)开展贸易。《明史》中说他们“踞宁波之双屿岛(今六横岛和佛渡岛)为之主”。

当时的双屿岛被中日历史学家称为“16世纪的上海”,全球的商品、财富在这里交换、中转、集散,来自日本、西班牙的白银通过这里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由这里进入世界。这里很像香港——一个世界自由贸易区。

1524—1547年,这个经济特区、自由贸易港迅速发展起来,葡萄牙人在上面建立了教堂、医院、市政厅等,岛上居民多达数千人,其中葡萄牙人占一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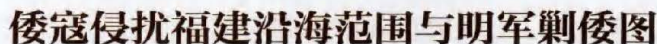
此外还有各国的商人。但明王朝实行海禁,禁止海上的自由贸易,朱元璋定的规矩是“片板不许入海”。双屿岛,在朝廷的眼里便是“倭寇”盘踞之地。不久,主管浙江、福建海防军务的巡抚朱纨派大军进攻双屿岛,一番激战,双屿岛被荡平。一本西方人写的书说,此役光葡萄牙人就死了800多人。从此这个“16世纪的上海”又成为了两个只有海浪拍打的默默无闻的小岛。王直侥幸逃脱,远走日本。

后来他占据了日本一个岛屿星布、名为“五岛”的地区(今日本九州西海岸外群岛,包括福江、久贺、奈留、若松和中通),自称“徽王”,又招来徐海、陈东、叶明等人为他的部将,他的侄子和养子是他的心腹。他还吸纳了几个日本人为他的下属,日本史料中称他为“五峰船主”,周围三十六岛都归附于他。

这时的王直还没有想做强盗,他给中国官府捎信说:他愿意率领自己的人马帮助官府扫清海盗,条件就是开放海禁,允许贸易(这条件有点像西方列强要求五口通商),他愿意做一个管理贸易的小官。(看到这里,我就想,若是英法西葡等西方列国,此时肯定给王直加官进爵,封为当地长官,试想不费一兵一卒,就把疆域扩大到了日本列岛。)但明王朝不这样想,官府没有答应王直开市贸易的条件,帮助肃清海盗可以,为此奖给王直100石大米。这奖励对于富可敌国的王直来说,简直就是讽刺。王直大怒,将这些大米全都扔进海里。由此他对在明王朝的统治下能否作商人产生了怀疑。后来他不顾禁令,驾船在舟山群岛附近的岛屿停泊做贸易,遭到明朝官军的围剿,王直靠发射火箭侥幸突围。从此王直绝了走私经商的念头,由此走上了劫掠财物、攻城杀人的强盗之路。早年王直在海上做生意,为防打劫,就雇用日本武士在船上充当保镖。海上不比陆上,陆上有国家维护秩序,海上的安全全靠自己,因此武装贸易是那时海洋贸易的通常做法。

王直的下属中,有一些被雇用的日本浪人武士,但为数不多。王直比较狡猾,每次劫掠烧杀后,都让部下留下是某岛倭寇所为的痕迹或口信,即《筹海图编》所说:“必诡云某岛寇所为也。”王直的狡猾,得一时之利,却铸下了千古骂名:倭寇。

但剿倭的名臣总督胡宗宪看出了王直的破绽,因为他看见倭寇进退纵横皆按兵法,可知不是毛贼,又熟知沿海州县的内情,倏忽而来、倏忽而去,可



入閩平倭，歷經三年時間，數次大敗倭寇。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倭寇再次大舉犯閩，戚繼光在仙游城、同安兩次大敗倭寇，倭寇退入廣東饒平一帶。隨後，戚繼光駐兵漳州，與廣東方面合擊倭寇，攻克其巢穴南澳島，大股倭寇遂被全歼。至此，福建倭患平靖。

知其中必有内奸坐镇指挥。他很快知道了倭寇的后台指挥就是王直。

胡宗宪改变了以往剿杀的策略，诱王直来降。王直本来也不想反抗朝廷，他同意投降，但是有个条件：这个条件竟然还是解除海禁、开市通商。胡宗宪虽然没有批准开市贸易的权力，但他还是答应了王直，谎称同意开市贸易。为了这个条件，王直回来了，谒见胡宗宪的结果是被投进杭州的监狱。王直被杀那天，与儿子在刑场相拥而泣，拔下头上束发的金簪给儿留念，长叹一声：想不到竟死于此。然后引颈就戮。

他的养子王澈带领下属停留在舟山群岛的一个小岛岑港，听到王直被杀，立刻肢解了官方的人质夏正。与前来围剿的官军展开激战，大部分战死。

不知大家注意没注意王直的愿望，一个对抗朝廷的海盗的愿望。“解除海禁，开市贸易”，这就是王直的心愿。中国几千年来揭竿而起，反抗朝廷的人无数，但提出这样的诉求却是开天辟地第一次。陈胜、吴广的“大楚兴、陈胜王”；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此”；张角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宋江的“替天行道”，等等，都是大同小异的追求，本质都是一样的。这样的诉求实现的结果无非是王朝的更替，却不会有新时代的到来。但是假如王直的诉求与番国“开市贸易”要是实现了呢？还会是王朝的更替吗？简直不敢想。那是不是中国提前500年就加入了“WTO”？

王直死后，倭寇不但未灭，反而变本加厉。可见走私、做海盗并不是王直一伙，当时中国东南沿海几乎全线告急，从杭州湾到珠江口没有一处不是战火硝烟。

倭寇非倭，首领都是中国人

倭寇为患，从明初就开始了，直至万历年间才止，持续了200多年。其中最烈是在嘉靖年间。所谓“嘉靖倭患”，指的就是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王直等勾引日本倭寇，大举入寇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的这件事。这场倭患一直持续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前后达15年之久。

我想知道倭患中到底有多少日本人。我开始对手中的书籍和资料中出现的倭寇人数进行统计，我发现无论是正史《明史》、《明实录》，还是像《筹海图编》、《倭变事略》这样的野史，都把“倭”和“贼”这两个概念不加区分。大的地方、笼统之处多用“倭”，比如“倭来犯”，但到具体之处，具体到人，都用“贼”。

各种书中所能找到的，被明王朝认定为倭寇

首领的有名、有姓或者有称呼者，大约20个。他们是：安徽的歙县许栋、王直、徐海；福建的李光头，漳州沈南山，福清邓文俊、林碧川，海澄严山老、许西池、洪迪珍、张维，诏安林国显、吴平；广东的萧显，饶平张璠、林凤、许朝光，东莞何亚八，大埔萧雪峰，潮安曾一本，澄海林道乾。他们和王直一样都是中国人。

抗倭之战，大大小小不下几千仗，动辄杀贼成百上千，都是有首级为证的。据书中记载，总共被剿灭的倭寇或贼以及海战中溺水而死者不下十几万人。但其实这里面真正的倭寇并不多，大部分都是中国人。

这并不是今天才明了的事，早在倭患最盛时，许多人就指出这一点。如《筹海图编》在“叙寇源”部分，即追踪倭寇来源时说：“今之海寇，动辄数万，皆托言倭奴，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其余皆中国之赤之无赖，孑人而附之耳。大略福建漳郡居其大半，而宁绍往往亦有之，夫岂尽倭也。”史籍《嘉靖东南平倭通录》载：“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又如《吾学编》载：“大抵贼中皆华人，倭奴其十之一二。”

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成了杀人越货、对抗朝廷的强盗？为什么这场持续久、危害烈的暴乱发生在东南沿海，也就是浙、闽、粤这一带？

是因为明王朝严厉残酷的海禁政策吗？那为什么同样濒海的辽宁、河北、山东或者广西等地没有或者倭患较轻呢？同样濒海，东北、华北、华中的海岸沿线为什么与华南沿海有如此区别呢？

元末明初，在中国改朝换代的混乱之际，一些日本武士自发组织起来，来中国武装走私，也兼营烧杀抢掠的勾当。除了这些，明政府还面临着一些豪强如张士诚、方国珍的残余势力，他们与朱元璋争霸失败后退到了东南沿海。

为了铲除这些隐患，明王朝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一来严禁濒海居民私自出海，违者将会面临杀头、充军等一系列严厉制裁；二来大量招收沿海渔民、船户为兵，招收了大约十万多人，在漫长的海岸线上广设兵寨卫所，大约有5000余个，并给这些卫所配备士兵和战船。

中国漫长的海岸线实际成了前线。在这种严厉的高压下，明初中国的海岸似乎宁静了，但是这是高压下的宁静，是爆发前的沉默。

海禁主要是禁止与海外通商，所以那时所有海上的贸易都成了走私。只要是做生意的船和人就是贼是盗，可杀可捕。

然而经过了宋元两个朝代，中国东南沿海已经

经历了方兴未艾的海洋贸易时代，一个围绕着中国渤海、黄海、东海和南中国海的商贸圈已经形成，而通向印度、非洲的远洋航线也已经形成，中国人生产的丝绸、茶叶、瓷器等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商品。东南沿海的居民已经成了依靠海洋贸易为生的一群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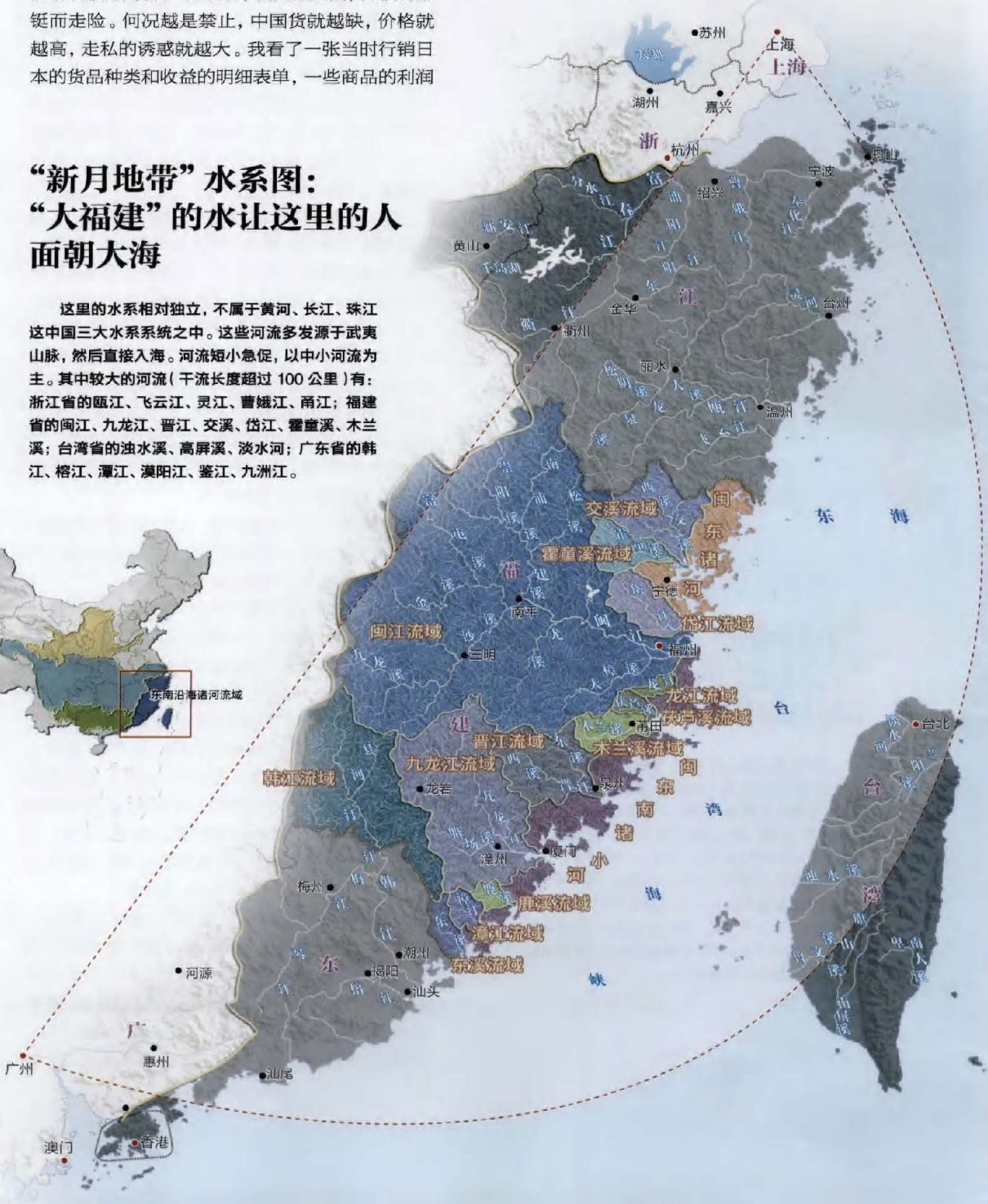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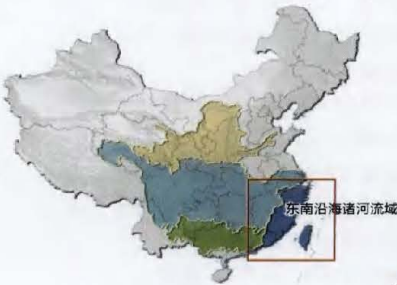
在明初的高压下，与番通商、贸易发财的冲动被压抑了，那些迎风远航的中国帆船不见了。但是贸易、赚钱、利润一经发现，就无法阻挡，人们甘愿铤而走险。何况越是禁止，中国货就越缺，价格就越高，走私的诱惑就越大。我看了一张当时行销日本的货品种类和收益的明细表单，一些商品的利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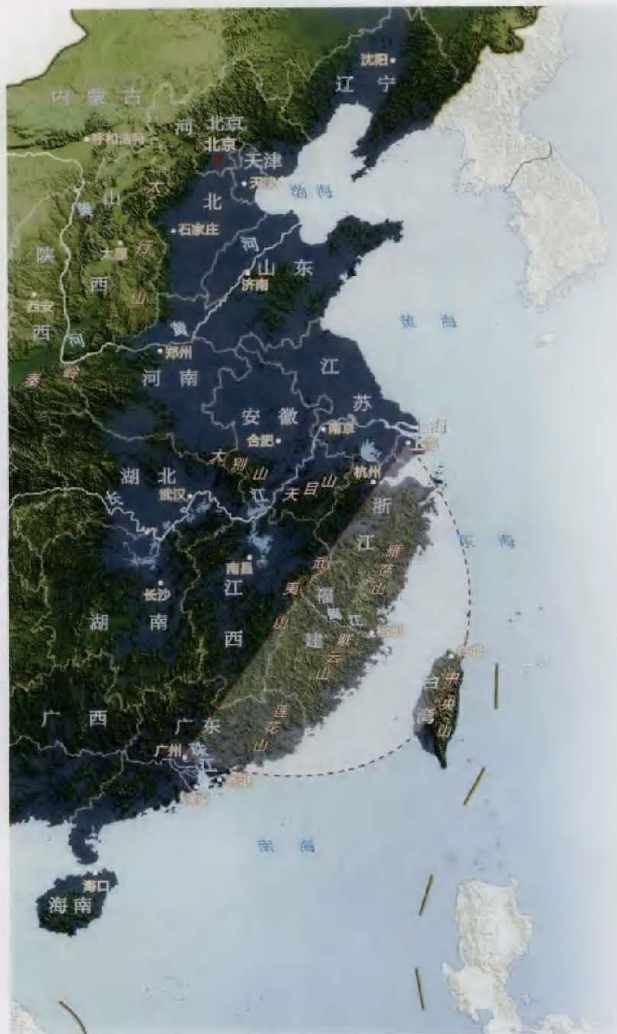
高达 10 倍以上。

为什么到了明中叶的嘉靖年间，倭乱最盛呢？一个原因是明初，中国海上还看不到西方殖民者，中国人的贸易对象还是东亚、东南亚、西亚一些国家。朱元璋 1368 年做了皇帝，哥伦布 1492 年才登上美洲大陆，这中间差了 100 多年。但到了明中叶嘉靖皇帝（1522 年）时，西方殖民者葡萄牙人已经

“新月地带”水系图： “大福建”的水让这里的人 面朝大海

这里的水系相对独立，不属于黄河、长江、珠江这中国三大水系系统之中。这些河流多发源于武夷山脉，然后直接入海。河流短小急促，以中小河流为主。其中较大的河流（干流长度超过 100 公里）有：浙江省的瓯江、飞云江、灵江、曹娥江、甬江；福建省的闽江、九龙江、晋江、交溪、岱江、霍童溪、木兰溪；台湾省的浊水溪、高屏溪、淡水河；广东省的韩江、榕江、潭江、漠阳江、鉴江、九洲江。





“新月地带”山系图： “大福建”的山让沿海人 民远离中原

这里有中国最贴近大海、海拔最高的山地丘陵。在距离大海 300 公里以内的区域内，分列着众多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主要有武夷山、天目山、仙霞岭、括苍山、雁荡山、戴云山、中央山脉、雪山山脉、玉山山脉、阿里山脉等。其中大陆地区的山岭海拔多为 1000—1500 米，少数山峰可达 2000 米，黄岗山海拔 2157 米，是我国大陆东南部的最高峰；而台湾岛上的最高山——玉山海拔则高达 3952 米。巍峨的大山阻隔了濒海地带与中原内陆的交往，也使得在中原农业文明历朝历代往南、往东扩展的过程中，这里保留了比较独特并相对独立的区域海洋文化。

占据了马六甲海峡、菲律宾等地，荷兰人接着也到了。1517 年，开始有葡萄牙人在澳门定居。外国人已经开始出现在中国海，找上门来和中国人做生意了。王直在宁波附近的双屿岛制造的“16 世纪的上海”就是一个例证。

可以说，此时全球化已经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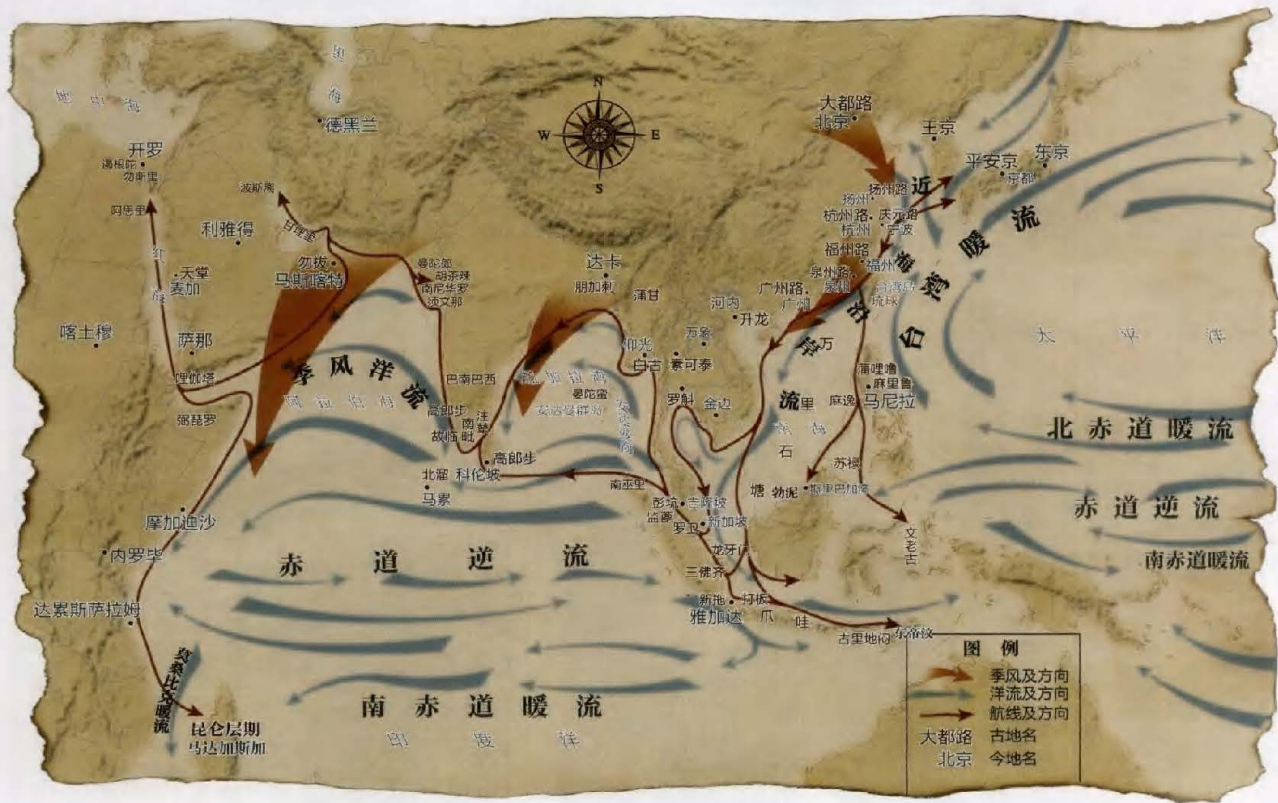
明朝的皇帝不知何谓“全球化”，虽然有永乐年间郑和七下南洋的壮举，但那已经过去了近百年了。在明朝皇帝的头脑中，中国还是在世界的中间，其余国家无非是一些地处僻壤的番夷小国。直到万历年间，看到从澳门登陆的葡萄牙牧师利玛窦带来的中国不在中间的世界地图，皇帝对世界才略知一二。对于通过海洋与这些番国贸易的意义，明朝的皇帝不可能知晓。

明朝与前面宋元两朝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对农业的重视和对商业的排斥。中国皇帝极少农民出身，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一个。他生于安徽凤阳，小时候因为吃不上饭被父母送到庙里做和尚，在庙里又因为吃不上饭，被迫托钵游走四方，后来参加了起义军，成为首领，后来做了皇上。所以说朱元璋对农业的重视是顺理成章的。本来中国文明的主体就是一种重农抑商的农耕文明，朱元璋更有许多重农抑商的名言，他经常用本末二字指称农和商。他常说“一夫不耕，民有受饥者；一女不织，民有受寒者”，这里哪有商的位置。

其实不织不耕也能生存，人类还有游牧和商业这两种生存方式。濒海的民族往往是商业民族，商业精神也是海洋文明的重要体现。

什么是海洋文明呢？我思考的结果是：海洋文明不是指“靠海吃海”，不是指为了获取海洋的“渔盐之利、舟楫之便”所形成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海洋文明指的是一种文明能够凭借海洋的广阔性和开放性与其他文明进行物质交换和文化交流的能力，及这种能力所形成的精神价值和物质成果。那种以海为田、耕海牧渔的生产和生活，本质上还是农耕文明，从事这种活动的渔民还是农民，从事这种活动的濒海民族还是农业民族。所以东北、华北、华中的几个省，虽然濒海，但是这里不曾产生海洋文明。他们有航海史，但没有海洋文明史。

“东南沿海”的人一叶扁舟“下南洋”，他们几乎把南中国海变成了“中国湖”，他们给中国带来了无垠的蔚蓝色的海洋。但是中国农民出身的统治者无法理解海洋，无法理解南中国海的意义，南中国海周边的土地，只能等待远方的殖民者来占领。留给中国的只是大洋中一片珊瑚礁和地图上的“九



洋流和季风将中国海船送往全世界

漫长而曲折的海岸线，众多的优良港湾，为中国人走向大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季风和洋流则是大自然为帆船时代的中国人准备的宝贵礼物。

南亚和东南亚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季风区，冬季的东北季风和夏季的西南季风尤为显著。而表层海水在风的推动下又会沿着一定方向流动，形成特定方向的洋流，其流速可达每小时0.9—2.8公里。

每年冬季我国东南沿海盛行东北风，受其影响近海沿岸洋流方向由北向南，海水从长江口向南一直流到爪哇

岛，一条下南洋的天然航线就此诞生。当航线延伸到印度洋并继续向西向南拓展时，受印度洋东北季风和季风洋流的影响，航行依旧顺风顺水。

夏季，印度洋盛行西南季风，季风洋流也调转方向，中国海商们则可以随之调转船头驶回中国。此时，我国杭州湾以南，东海、南海的沿岸流与外海暖流（主要是台湾暖流）汇合在一起，自南向北流动。

图中所示航线为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航线。宋、元时期是我国古代海外

贸易最发达的时期，此时福建泉州港是世界著名的贸易港口，据南宋赵汝适《诸蕃志》所列，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与泉州有贸易联系的国家与地区共有50个；到元至正九年（1349年）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中则增加到99个。当时泉州与海外诸国的航线主要有以下五条：与高丽、日本的贸易航线；与中南半岛、马来半岛的贸易航线；与菲律宾、勃泥的贸易航线；与苏门答腊、爪哇和加里曼丹的贸易航线；与印度、波斯、阿拉伯的贸易航线。

连划”，即使这些现在也近乎于不保。

明朝的统治者不仅不能理解下南洋，不能理解南中国海，就是像王直这样的在家门口的贸易他们也必须彻底消灭而后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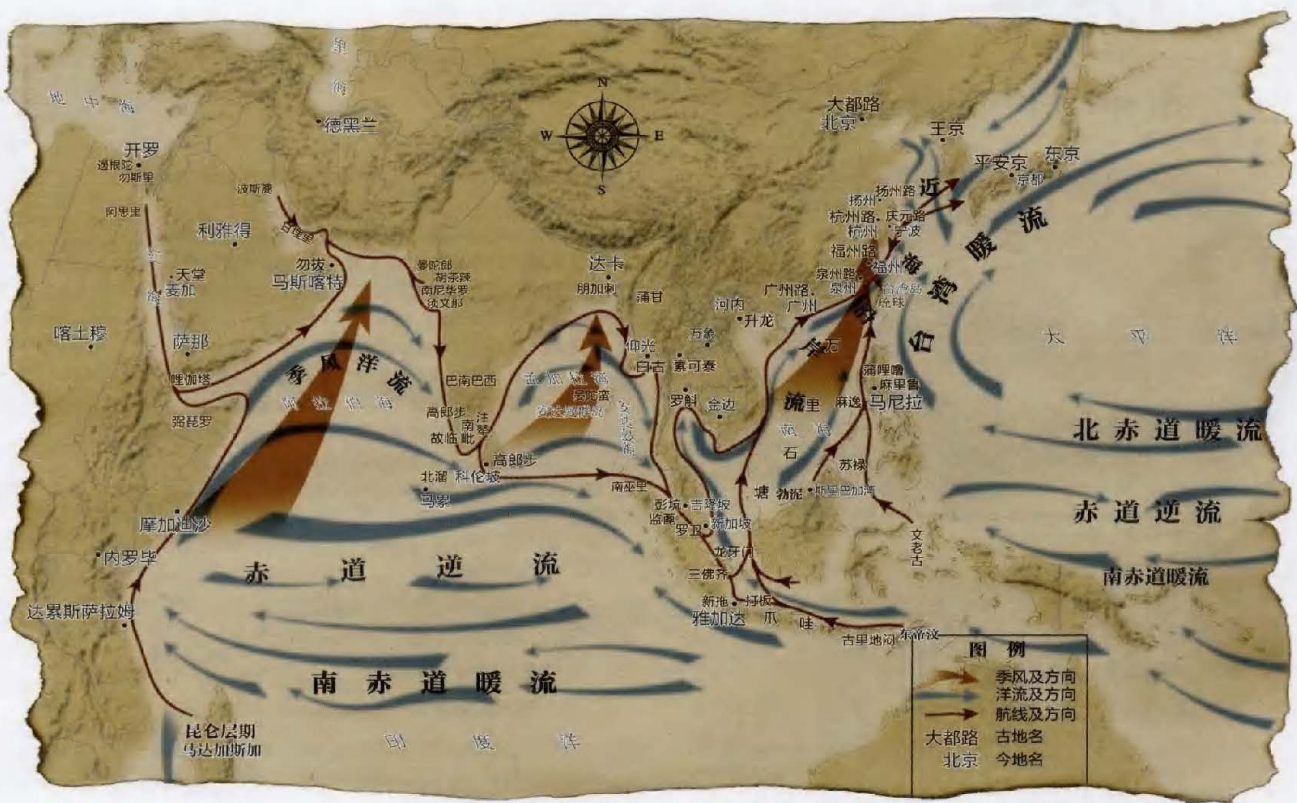
而中国东南沿海已经进入了世界商贸圈，既然这些人依靠海洋贸易为生，那么海禁就等于不允许农民种地，不允许牧民放牧，等于剥夺了他们生存的基础，他们只能铤而走险，违法经营，武装走私，武装走私做不成，那只好上岸以劫掠烧杀为生。在

《筹海图编》中，我还看到这样的记叙：倭寇对与海外通商的村镇是不抢的。

于是中国沿海一带商人转为“倭寇”也就很自然了。在明代，一些明白人早就看出了这一点。《虔台倭纂》载：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禁愈严而寇愈盛。

于是我们看到这样的现象：海禁松弛或开放海禁，则倭患息，海禁严则倭患起。

明代嘉靖年间的这场倭患，实质是中国民间海



商集团的武装走私贸易与明王朝海禁政策的一场持久的大规模的冲突。这期间固然有真的倭寇和流民盗贼参与，但性质并不因此而改变。每当社会动乱之际，都是流民和社会游荡不轨之徒的狂欢节。

遗憾的是，这些武装走私的海商竟然提不出自己的纲领和口号，他们还不如历史上的张角、黄巢、宋江、方腊。他们甚至还树不起一面旗帜，这也不能责怪这些海商，因为他们的诉求即使写在旗帜上：开市通商，也不会像“替天行道”、“杀富济贫”那样一呼百应。因为他们仅仅代表了东南沿海新月地带那一小部分人。

倭乱，规模之大不亚于任何一次农民起义，但是如此规模的动乱却是无声的，只能听到官方的声音，另一方是沉默的。幸亏王直披露了一下他们的心声，否则他们将带着一个“倭寇”的恶名永沉地狱。

中国有这样一块地方——“大福建”，或者说中国海洋文明的“新月地带”

我在看一张倭寇侵扰范围的分布图。

倭寇攻城略地、烧杀抢掠最严重的地方就是从杭州湾到珠江口这一弧形地带，即浙江南部、福建、

广东东部这一带，有名有姓的 20 个倭寇首领也都是这些地方的人。为什么？

今天这些地方是中国的侨乡，是中国人出走海外最多的地方，这里也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生活最富裕的地方。

这些地方能够组成一个区域吗？这个区域有怎样的共性呢？我对着地图反复思考。

我发现如果从上海到广州画一道线，这道线将把我认为具有独特品质的这些地方画出来，还要加上台湾，这样就把沿着海岸的那些岛屿也包括进来了。这个地区好像一弯新月，因此我把它称为中国的“新月地带”。这个地带生活的人，他们的文化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答案是：海洋性。这里是中国农耕文明的边缘，海洋文明的中心。

本来我想把这个区域称为“大福建”，因为这个区域以福建为核心，台湾岛过去的行政区划也属于福建省。但是考虑到广州这个中国海洋文明极为发达的地方，我们还是给这个地方一个中性的称呼——中国的新月地带。

其实省这样的行政区划是统治者人为设定的。统治者出于控制和稳定的目的，往往有意打乱具有

元末明初中国海上贸易势力范围



自然和文化统一性的地方。中国古代统治者划分行政区划的原则是“山川形便、犬牙交错”。就是既考虑自然和文化的统一，又为了避免割据和独立，要打乱和拆分具有这样统一性的地方，像浙江南部——温州一带，还有广东潮汕地区，就自然和文化而言，划入福建省可能更为合适。

那么为什么这个“新月地带”是中国版图中最具海洋性的地方？为什么是浙江、福建、广东这几个地方率先走进海洋，做起海洋贸易来呢？

我们应该从自然中找原因。

最容易发现的是水的秘密。如果你找到一张中国的水系流域分布图，你就会发现这个地区的河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自成体系，独流入海。这里的河流没有或基本没有汇入长江、黄河、珠江这几大水系的。这其中福建最为典型，福建的河流——闽江、晋江、九龙溪等都是独流入海。这里的河流虽然短，但是水量大，闽江虽然流域面积只有黄河的 $1/12$ ，但多年平均流量比黄河还多。可见这个区域的河流具有“短而壮”的特点。

河流的流向指示着精神和文明的走向。也许正是这独流入海、自成体系的河流让这个区域的人得以锤炼出一种区别于中原农耕文明的海洋精神。

不能指望那些流淌几千公里，流域面积百万平方公里的大河形成一种面向大海的海洋文明，这样的大河只能形成自成体系的内向型的“大河文明”，也就是农耕文明。只有从那些海边的山上流淌下来的亚大河（仅次于大河）能够形成面向大海的文明。

我们不能指望黄河、长江的河口地区能诞生海洋文明。一方面这些河流太大，河口地区，河流恣肆汪洋，迁移游荡，在古时人类还无法控制，河口地区往往是水灾频发之地。而当人类能控制这些地

宋元时期，拥有雄厚海上实力的中国吹响了从大海走向世界的号角。元末明初，从东亚的朝鲜半岛、日本到现在的中南半岛、南洋群岛、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从马六甲海峡、孟加拉湾、波斯湾、阿拉伯海、亚丁湾、红海，直至东非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地的沿海港口，都出现了中国海船。从中国远渡重洋而来的陶瓷、丝绸等成为各地最受欢迎的流行物，中国人的海上贸易也愈发昌盛。

然而，随着明、清政府的海禁乃至迁海政策的出台，刚刚萌芽的海上文明不但没有繁荣壮大，反而慢慢枯萎。世界上率先走向海洋的中国人没有成为海上的霸主，闭关锁国让中国主动放弃了本应属于自己的大航海时代。而在地球的另一端，属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大航海悄然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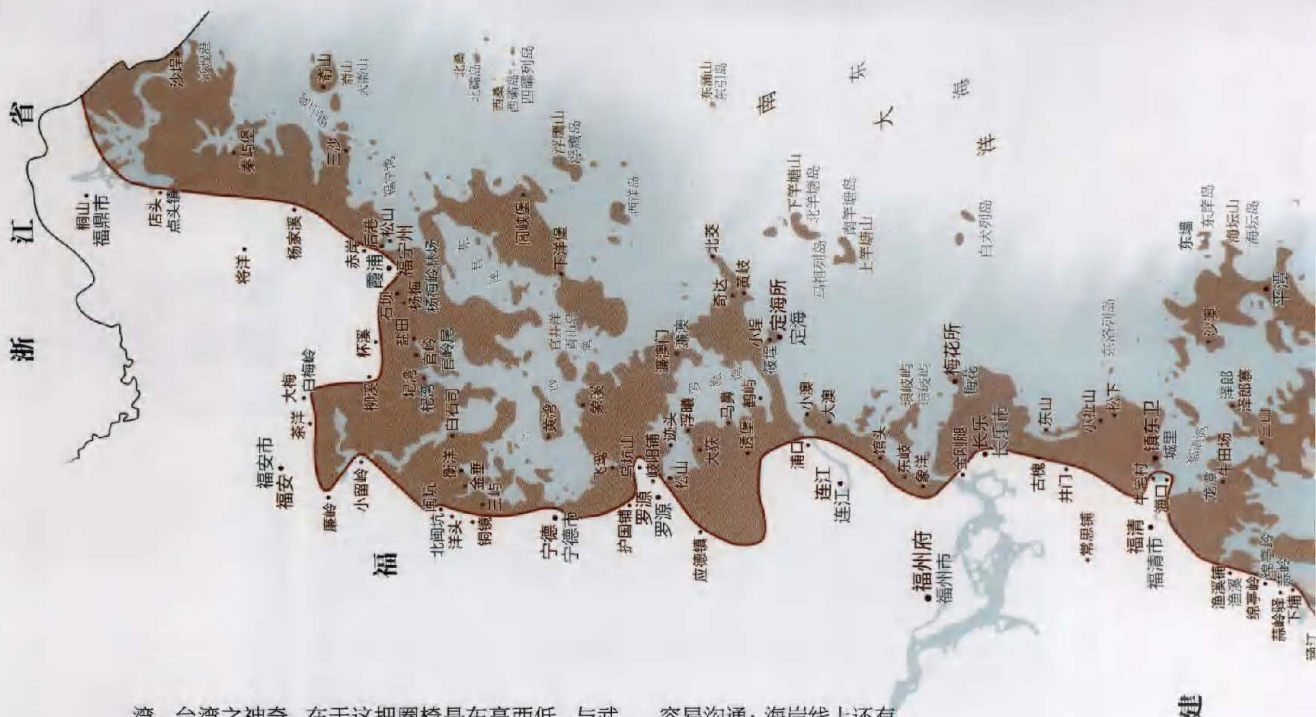
方时，这些大河所携泥沙沉积而成的三角洲——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又成了农耕的乐土，成为了农业文明最为发达的地方。

那些短而壮的河流则是发育海洋文明的最好的地方。宁波的甬江、台州的椒江、温州的瓯江、福州的闽江、泉州的晋江、漳州的九龙江、潮州和汕头的韩江……就是这样短而壮独流入海的河流。

世界上海洋文明昌盛的地方，除了濒海，还是一些短而壮独流入海的河流所催生的地方，比如地中海的希腊、法国、西班牙及葡萄牙、荷兰、英国等。这些国家都没有大河。

欧洲是因为阿尔卑斯山造就了一些呈放射状入海的河流。我们所说的这个“大福建”或者是中国的“新月地带”之所以有这些独流入海的河流，也是因为有大山的存在。这个山就是武夷山，我说的这个武夷山是大武夷山，今天游人络绎不绝的武夷山只是大武夷山的一小部分。

中国的南方多丘陵，长江以南、南岭以北是江南丘陵，但这些丘陵都太小了；南岭和广东、广西的丘陵高了许多，但高度还是不够。否则秦始皇也不可能把湘江和珠江打通，用灵渠沟通起来，因此从这个意义看珠江和长江是相通的。但是南方的丘陵到了浙江和福建这一带就变了，变成了大山——武夷山，这道东北—西南走向的大山，是一个大的山系。北边是仙霞岭，南面是莲花山，最高的山峰有2000多米，1000多米的山峰就更多了。一道大山还不算，还有一道大山——戴云山，这些山不仅高，而且一面山高崖陡，一面形如台阶层层降低，高的地方是面向中原的，对中原文化构成阻隔；低的地方朝向大海，这些大山就像一把拥抱海洋的圈椅。与这把圈椅隔海相对的还有一把圈椅——台



建

湾。台湾之神奇，在于这把圈椅是东高西低，与武夷山相反，它背对大海，面向大陆。因此我说台湾天然是中国的一部分，我把台湾及周边的岛屿归为“大福建”的范围。从山的角度看，武夷山形成一道屏障，它是中国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分界线。

除了山和水有特点，更有特点的是这个区域的海岸。中国的海岸线漫长，从辽东的鸭绿江口到广西北仑河口，长达数万多公里。但并不是所有的海岸都适合建港口、泊帆船的。一般而言，在山地丘陵地区的海岸，曲曲折折，港湾和岛屿众多，那些港湾水深，沙少，避风，最适合建港；而平原地区的海岸，则平浅沙多，岸线平直，港口容易淤积。

在长江口以北，黄河和黄河的古河道及长江三角洲形成了最大的平直型海岸，这里的海岸很难建港，因此这里海洋文明难以成长。

民间有一种说法：“浙江岛，广东湾，福建在中间。”说的就是浙江海岸以岛多为特征，有1800多个；广东海湾多，海湾相邻不断，有20多个；福建是岛多湾也多，大的湾有15个，大的列岛有5群，群岛有4群。

放眼整个新月地带，这里的海岸是山地丘陵间的海岸，它们曲曲折折，或者山向海中凸出，或者海向山凹进，这里多海湾、半岛、海岛，因此也被称为山地港湾型海岸。有人形容这种海岸：“深港是河，远海有陆。”这里既有深入内陆的港湾，如浙江的象山港像一条宽广的水道，深入内陆70多公里；也有平行于海岸的港湾，福建的三沙湾有平行海岸35公里。这样海岸和内陆的交通便捷，港湾与港湾之间也

容易沟通；海岸线上还有一群群岛。这样港口由于深入内陆，能减轻风浪的袭击；海上还有可作为远航基地的岛屿。可以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海岸。

再说洋流和季风。

在18世纪汽轮出现在大洋之前，海洋中航行的是帆船，帆船是靠风吹着走的，还有大海中的洋流，也能把船送向远方。因此那时，哪里的海岸有季风、季风吹送的方向，还有哪里有洋流、洋流的方向，都决定了哪里能出海贸易，哪里能成为货物集散地，哪里能成为大港，或者能航行到哪里。

神奇的是，中国的大福建地区，有着送中国人去远航的难得的季风和洋流。了解和认识大海中的季风和洋流，利用季风和洋流去进行远洋贸易，一直被阿拉伯人和西方人视为商业秘密。其实中国人早就掌握了这个秘密。送中国人去远航的季风和洋流是何等地神奇，它们竟然是能把中国人送出去，又能把中国人带回来。因为这季风每年调转一次方向。

每年10月，长江口以南开始吹东北季风，洋流也随之而行，这时是中国人从东南沿海出发的季节，满载着丝绸、瓷器、茶叶等货物的航船张满风帆出发了，从中国的南海经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洋。这一路都是中国人进行贸易的地方和国家；等到来年的夏天，季风和洋流倒转方向，变成西南风，洋流也随之而变。这倒转的季风正好吹送中国人返航。对商人而言，世界上还有比这更美的事情吗？这季风、洋流，中国人即使不想去贸易，它都会把

中国人吹去、漂去。总之，大福建这块地方的人，天然就应该去航海，去大洋中闯天地。过去我不相信美洲的印第安人是商代的殷人，中国人早就到达过美洲，我也不信太平洋中的那些岛国上的人是福建这一带的南岛语族，后来通过研究季风和洋流，我相信了这些说法，因为不是这些人主动想去那里，很可能是被动的，是被季风和洋流吹去的。某一次船失去控制，他们就会漂流到那些地方。

总之，无论从山、水、海岸、季风、洋流各方面看，中国的大福建地区都具备了最好的催生海洋文明的自然条件。

中国最具海洋精神的人群——大福建人

人呢？我们说说这个区域的人——大福建人。

他们是中国善于航海的一群人，也是中国善于经商的一群人。这群人不是由于基因凝聚而成，他们中有生于斯长于斯的土著，古称“百越”；有因战乱从中原逃于此的移民，比如“客家人”；还有因通商从海上来的外蕃，多是阿拉伯人；千百年来这些人已经融合成一个靠海吃海、依海洋而生的族群。这里的靠海吃海、依海为生不仅仅指渔业，更重要的是贸易。说他们是个族群很勉强，因为联结他们的不是亲缘和社会关系，而是谋生的手段和价值取向。这个族群本身也是四分五裂，之所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族群，是为了区别中国那些以农为生的中原人和游牧或半农半牧的北方人。他们的存在离现在也不过千年，我们姑且把这群人叫做“大福建人”。这群人最为典型的代表是现今闽南的厦、泉、漳人和粤东的潮汕人。他们是中国“海上的马车夫”，是中国的“世界人”。

这群人有经商的才能，有拼死一搏的冒险精神，但是缺乏政治的头脑。他们经商一流，政治末流。如果把湖南人的政治才能给他们，他们就不是今天的地位，中国也不是今日的中国。

理解他们，不能局限在中国这个民族国家的概念里，要把眼光投向海洋：要在这样一个区域里理解他们，这个区域就是围绕

清初，为防御来自海上的郑成功反清力量，清政府强令福建、广东等沿海居民内迁，濒海地带严禁民众居住。这是继明代海禁政策后，政府对中国海洋文明发展的又一次严重打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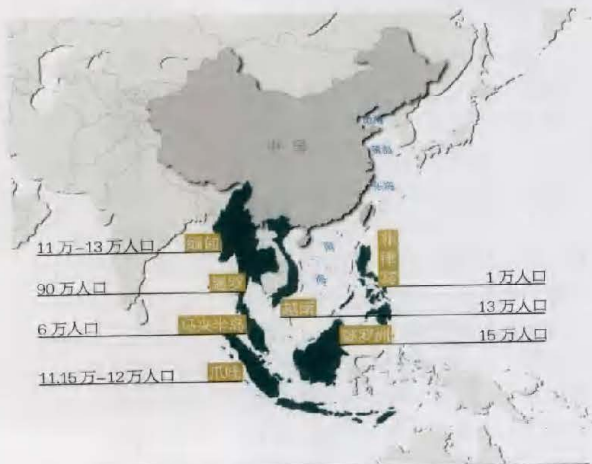
福建迁界始于康熙元年（1662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才令全部复界。迁界对社会经济破坏极大，迁界

时，凡属界外的村庄、田宅被烧成一片焦土，昔日富庶的海滨地带“无复人烟”。以海为生的福建民众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且因界外大片森林被砍伐，多数海堤被冲毁，海水漫灌，生态环境严重恶化。

沿海迁界： 清政府对沿海居民的强行拆迁



19 世纪中期南洋的华侨分布



《水浒传》中，宋江的义军全军覆没，然而梁山好汉中的混江龙李俊却选择了出海谋取王业，最终成为暹罗（今泰国）国王；在金庸小说《碧血剑》的结尾，也有类似的情节。

小说纵然不能当真，然而自古以来以福建为代表的东南沿海人民确实对海外世界十分向往。在他们的心目中，南洋充满商机。从唐朝直至宋元时期，福建海商便逐渐主导了东亚海域的商贸，元末明初，在东南亚的东爪哇和南苏门答腊的旧港已经开始形成华侨的聚居区。时至明朝，海禁政策使得海上商贸逐渐衰落，饱受海禁之苦的东南沿海人民趁机出洋谋生；到17世纪初，东南亚的华侨总数约有10万人；随着清兵入关，朝廷在沿海施行海禁迁界，流离失所的迁民以及不愿臣服满清的汉人被迫违禁出海，前往南洋从事贸易、手工艺、采矿及种植业。到19世纪中期，东南亚各地的中国移民及其后裔数量已经超过150万。我们把这一时期东南亚各国的华侨人口分布标在了这张图上，南海仿佛是中国の内海，而东南亚很多华人聚集区在当时就如同中国的海外省。

着渤海、黄海、东海的东北亚还有围绕着南海、马六甲海峡及印度洋的东南亚、南亚、西亚。用这个区域的中国人的话说，就是“北洋”和“南洋”。这个东北亚和东南亚曾经是这群中国人最为活跃的地区，这个地区也就是所谓的太平洋西边一系列群岛围成的所谓岛弧或岛链。这些岛弧和岛链今天成了某些大国企图封锁中国的栅栏，但过去这些岛弧围成的黄海、东海、南海，对中国人而言就像是中国的地中海和中国湖。

船呢？在那个时代，中国人已经具备了世界上最优秀的造船技术，郑和七下西洋，就证明了这一点。当时的大福建地区的海岸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船型，其中福建沿海建造的福船最为有名。福船尖底翘首、深舵高帆，就适合乘风破浪去远航。还有

指南针早已应用到了航海。

一切都具备了。这个地区理所当然地要成为海洋文明的一个明星，如果没有巨大势力阻碍的话。但是这个巨大的阻力是存在的，这就是来自中原的代表农耕文明的统治阶级。中国历代都有南北之争，从三国时代的东吴被北方的晋所灭，到孙中山的北伐。在南与北的战争中，总是南方失败。其实这南与北之争就是海洋文明与农耕文明之争，南方的失败是因为他们所代表的仅仅是中国的东南一隅，那些河流独流入海的地方。但是黄河长江的流域太广大了。

中国曾有机会成为横跨海洋的大帝国，但错失了两次千古难遇的时机

前面已经说了中国有这样一块地方——大福建地区，这块地方具备了海洋文明萌发、成长、壮大的一切有利条件，他们天然应该去远航。可以说，万事具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为何？就是统治阶级的允许和配合。

在中国历史上，只要统治者稍稍放宽对大福建地区的管制，这个地区的海洋贸易就会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中国曾经有两次海洋文明大发展，融入世界的机会：一次是宋、元时期，一次是明末清初。

宋、元时期，宋代的统治者虽然也想控制民间贸易，但是由于在北方与辽、金、西夏对抗，陆路全塞，只有通过海路与海外进行贸易。宋朝鼓励海外经商，奖励对海外贸易有贡献的人。一方面招来番商来华贸易，一方面在各个口岸设置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尤其到了南宋，竟提出“开洋裕国”的政策。又因为偏安于杭州，因此对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在政府的鼓励下，两宋以来，中国的海洋贸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其标志是海外华商网络形成。那时中国海商数以万计，资产百万的大海商亦不鲜见。南宋初，泉州商人“夜以小舟载铜钱十万缗入洋”，“泉州杨客为商贾十余年，致货二万万”这样的记载在宋代一些笔记书牘中比比皆是。

海外华人聚居地出现，华商成为中国海外贸易的主导。宋元时期，海外华人已经开始有自己的聚居地。宋代的高丽“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闻人因贾舶至者”；泰国的华人势力已经达到了和国王一起建造佛寺；泉州商人在缅甸一带经商而不再回；爪哇新村和苏门答腊的旧港有华人数千家；而且华人有了自己的组织机构和武装。梁道明为爪哇数千家之首，陈祖义为旧港当地的华人头目，啸聚数千人马。

造船业空前发展,一批著名大港出现,甚至可以说出现了一批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宋元时期,造船业十分发达,所造大船载重可达600多吨,载人500多人。13世纪初,中国有印度洋上最好的船。

海外贸易的货品是什么呢?唐以前中国的海外贸易主要是奢侈品——丝绸和贵金属,但到了宋、元时期,瓷器、纺织品、日用器皿等大宗货物已经成了外贸的主要商品,并且已经有一大批人从农业中脱离出来,专门生产这些出口商品。

元代对待海贸的政策承袭宋代的政策,也是鼓励海外贸易。元时的海外贸易的盛况仅仅从马可波罗对泉州港的描述就可见一斑。

宋元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最出色的海洋国家,中国的海洋文明程度绝不亚于地中海上的西方国家。

可以说宋元时期是中国海洋文明的黄金时代,这也是历史给予中国掌握海权、成为海洋大国的绝好机会。

但遗憾的是,这次机会被代表农耕文明的明王朝给葬送了。中国在成为海洋大国最为关键的时代遭遇了最不具有海洋精神的朝代。

那时哥伦布还没到达美洲,麦哲伦还没环球,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人还不是“海上马车夫”,英国人和法国人还不知太平洋在哪里。

历史给了中国以机会。中国早就有了全球化,早就加入了WTO。那是在800年前。那时中国用不着和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的沿岸国家谈加入的条件,他们全唯中国的马首是瞻。

经济也是政治。中国商人的网络在“北洋”和“南洋”形成时,一个势力圈、影响圈也就形成了。那时的中国要想成为历史上罗马那样的帝国,或者波斯和阿拉伯那样的帝国也不是不可能的。甚至那时的南中国海完全可以成为“中国湖”。

这些机会被明朝的统治者葬送了。我们不能指望明朝的统治者为中国开疆拓土。据《明成祖实录》记载,太祖朱元璋多次告诫子孙:“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

明王朝在海洋中做的最大一件事,就是郑和七次下西洋。但是郑和下西洋只是为了宣示国威,抚慰四方,以期换来万国来朝的盛世景象,它的目的并不是发展海洋贸易,推动海洋文明。郑和下西洋只是证明了中国有实力、有能力成为一个海洋大国,但其所作所为却预示了中国海洋文明的衰落。郑和下西洋代表的完全是官方垄断的朝贡贸易,而排斥了民间的私人贸易。

郑和动辄万人的庞大舰队,七下西洋,历时三十多年,若是西方国家派遣,一路上不知要宣布占领多少领土,建立多少殖民地,一个庞大的中华帝国必将建立。但是郑和所到之处,不仅不扶持华人势力,而是与当地政府及原住民一起镇压华人,在明史中就记载了郑和镇压了前面提到的占据马六甲海峡的陈祖义所率领的五千多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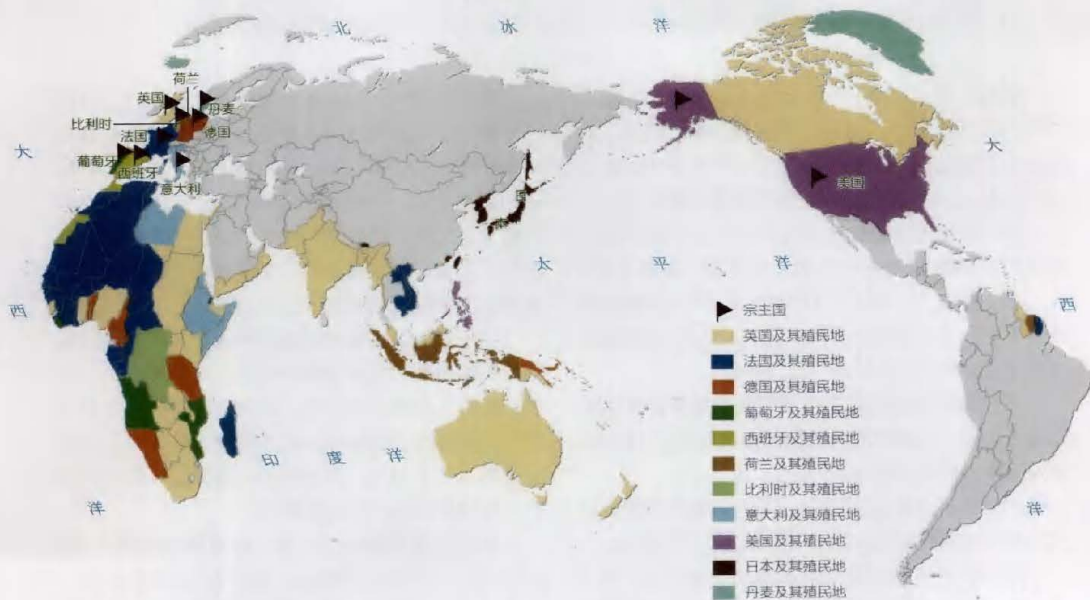
明王朝可以说是把中国的封建专制和重农轻商的传统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海禁就是一个例证。继明太祖朱元璋之后,明成祖朱棣更加变本加厉:他规定把沿海能够去远洋的尖头船都改成不能破浪的近海平头船。从此南洋、北洋、印度洋再也见不到那乘风破浪的中国船了。

吴晗是著名的明史专家,他是这样说的:“成宣时代积极经营南洋以后(我对这话保留意见),南洋已成为中国之一部,无论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方面,均为中国之附庸。南洋之开拓及开化,完全属于中国人之努力。假如政府能继续经营,等不到欧洲人的东来,南洋诸国已成为中国之领地,合为一大帝国,或许世界史要从此变一样子。可是政府放弃了这责任,并且不愿意继承前人的伟绩,退婴自守,听其自然。这担子便又重新放到无数的无名英雄身上。他们不但没有国家的力量做后盾,并且冒着违反国家法令的危险,凭着勇气和求生的欲望,空拳赤手,乘风破浪,到海外去开辟他们的新世界、新事业。”

历史给中国的又一次机会是明末清初。明末海禁部分开放,南中国海又风帆竞发,东南沿海的中国人又蜂拥海外谋生。但这时的南中国海已经不是宋元时期中国人主导海洋的局面了。

正如吴晗所说:“八十年后,欧洲人为了找寻香料群岛陆续东来。他们不但拥有武力,作有组织的经营,并且有国家的力量做后盾。不到几十年,便使南洋改变了一个样。自然而然地替代了以前中国人的地位。瓜分豆剖,南洋成为了欧洲人的殖民地。华侨寄居篱下,备受虐待和残杀,中国政府不能过问。这是中国史上一大转变,也是世界史上一个大关键。”

这时的海洋已经是武装的海洋,西方殖民者的枪炮,决定此时的海洋贸易必须有武装保卫。但是中国商人具有顽强的生存能力,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海商集团还是崛起了。这其中的代表就是郑芝龙的武装海上集团。1633年,郑芝龙在金门料罗湾与荷兰人的舰队决战,打败荷兰人,从此荷兰人退出福建沿海。郑氏集团成功地控制了海上贸易,海商远洋贸易要到郑氏这里领牌照。马尼拉的



1914 年西方列强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地分布示意图

15 世纪初，葡萄牙这个当时人口不到 100 万的小国，拉开了人类大航海的序幕，同时也拉开了欧洲扩张的序幕。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航海家们用前赴后继的航海探险将原先割裂的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依靠新航线和殖民掠夺迅速建立起势力遍布全球的殖民帝国。

到 18 世纪，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大

西洋取代地中海成为商业交通的必经之路，海上霸主也随之更替，英国、法国、荷兰这几个面向大西洋的国家迅速兴起，参与到瓜分殖民地的热潮之中。

后来又经历了工业革命时代殖民地的萎缩，以及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在非洲和亚洲掀起的占领殖民地的高潮，到 1914 年，殖民国家及殖民地

已占全世界 85% 的陆地面积。此时，实力强劲的英国和法国，以及衰落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仍然掌握着大片的殖民地，而新兴的美国、德国、日本和意大利这些国家也在世界殖民体系中占有了席之地。

传教士金提尼描写了郑氏集团的实力：“仅在厦门水域的水师就多达 13000 艘帆船，成千上万分布在海上的船只听命于这个王国……”

郑氏海商集团的崛起，中国人第一次有了武装对抗并战胜西方殖民者的庞大的海商集团，给了中国又一次开创海洋文明成为海洋大国的机会。

但这次机会又被来自北方的清王朝葬送了。

清王朝的海禁比明更严厉，为了清除郑氏集团，清王朝不仅仅是禁海，还要求海迁，就是沿海居民从海岸线一律后退 30 里或 50 里。这可能是历史上最大规模、最蛮横的“野蛮拆迁”。可以想见这种海迁政策对濒海居民的生路造成多大的影响。

后来清政府放松了海禁，但这时出海的中国人，再也不是天朝贵客的商人，而是整船整船的被诬称为“猪猡”的劳工苦力。

海洋已经瓜分完毕，早已没有中国人的位置。但是这块具有海洋文明精神的土地还不安定，还在躁动，他们一次次地试图冲出禁锢，奔向海洋。

中国文化中并不缺乏海洋文明，在我国东南那块新月形的土地上，它绵延不绝，数度辉煌。

遗憾的是，从康梁的“戊戌变法”到孙中山的北伐，他们都被来自北方的农耕文明战胜了。

直到有一天，一个小个子的四川人，他虽然来自内陆盆地，但是他熟悉海洋，他在法兰西做过工俭学，就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这个绵里藏针、沉默寡言的人在法兰西的工厂里，一边做着钳工，锉着工件，一边想着什么，谁也不知道，但是中国重拾海洋文明的希望，竟然落在了他——邓小平的肩上。

1979 年，他在中国东南沿海那块新月形土地上的一个海湾边，画了一个圈，后来这个圈不断扩大，很快布满了这块犬牙交错的港湾型海岸。从此中国又一次从这里走向海洋。

历史是很有意思的。当我听到中国终于加入了 WTO，我想到了王直，400 多年前的一个海盗。其实我们做的，正是实现了王直的愿望。□

责任编辑/张璇 高新宇 地图编辑/王若 陈云 图片编辑/吴敬 版式设计/介彬

编者注：单之蔷先生的卷首语已出精选本，书名《中国景色》，敬请读者关注。

咨询电话：010-64852138 / 64842147

福建与中国海洋文明研讨会剪影

摄影 / 王彤



苏文普
福州大学教授
闽商文化研究院院长



曲金良
中国海洋大学教授
海洋文化研究所所



高伟浓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专家
咨询委员会委员
中国东南亚学会副会长



柳和勇
浙江海洋学院
人文学院院长



庄国土
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院长



韦文樟
宁波中国古船研究所特邀研究员



叶显恩
广东省社会科学
学院研究员



金行德
宁波中国古船研
究所特邀研究员



许路
大连海事大学厦
门教学点主任



中国的海外贸易始于秦汉之前，到了元代已经和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了海上贸易关系。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诸多贸易港口次第兴盛，各领风骚。



图例

- 港口
- 今地名
- 古港口名

中国古代主要海外贸易港口示意图

编者按

位于欧亚大陆东南隅的福建省，是中国众多沿海省份之一。占全省土地总面积 90% 的丘陵山地，使得福建在中国的地形图上如异军突起。位于东南边缘加之背山面海，福建似乎天然地具备了归顺大海的气质！福建给了我们面朝大海的机会。福建人重商、极喜冒险、生性不安分、爱往海外跑；福建有历史上闻名中外的港口；福建有中国影响力最大的海洋保护神；福建还有颇具远洋能力的福船……福建文化的独特之处每每与作为中国文明主体的农耕文化相异趣，这引发了我们对海洋文明的思考。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沿海生活的人们都创造了什么样的文明形态？福建的海洋文明相对其他沿海省份来说具有什么样的独特之处？我们请来中国海洋文明研究领域的专家，在北京召开了一次“福建与中国海洋文明”研讨会。这些专家分别来自山东省、浙江省、福建省和广东省，他们认真和热烈的发言为我们认识福建、了解中国的海洋文明奠定了基础。

福建·山东·浙江·广东 谁更“海洋”？

福建人最具海洋性格吗？

讨海生活

◎ 苏文菁

我说的福建，和今天的行政划分恐怕还有一些不完全符合的地方。我喜欢用另外一个概念——“闽”，也就是福建原来的称号。“闽”所涵盖的区域除了现代行政区域的福建、台湾，还包括了浙江南部的一些地区——瓯江流域的部分地区。另外福建西南的汀江，流到广东后改称韩江，广东的韩江流域也属于“闽”这个范畴。“闽文化区”是一个具有独立地理文化单元意义的区域，一般谈到福建海洋文明的时候，我们确定的是这样一个区。我个人觉得这是中华大地上一块比较独特的区域，在中原农业文明历朝历代往南、往东扩展的过程中，这里保留了比较独特的区域文化，并进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地理单元。

福建的地域特点不仅是濒海和多山，更重要的是以现在行政区的福建为主体的区域，不在中国的三大河流（黄河、长江、珠江）体系中，基本是属于东南沿海直接入海的河

流体系。所以受到地形地貌的影响，中国

历史上福建人向海洋讨生活的年代应该是最早的。从福建人群的构成就可以看出，我个人认为，福建人不全是中原移民的后代，而应该是福建原住民，中原迁徙而来的人，海洋上来的马来人、阿拉伯人以及其他海上迁徙民族的组合。有证据表明，福建原住民是一个善于航海的民族；唐代以前到福建的中原移民里，军人和一部分宫廷政变里的政治犯占了主体；历史上大量进入福建的海上民族的海洋文化个性也比较强；这三方面共同作用，使福建人最早形成了海洋性格。福建人的海洋性格是极具海洋文明的开放与冒险的，是最不安分的。而此后无论是中国海洋文化兴盛的时代，如唐、宋、元，还是海禁高压的时代，如明、清，这里的人们总是表达着自觉的海洋文明个性。

不太安分的族群个性使
“闽”人最早走向海洋。

◎ 柳和勇

地域人群海洋性格的形成与一个地域海岸带地理条件、资源构成等都有关。我们浙江是水乡，湖多、江多，而且浙江人“以舟为车，以楫为马”，这是非常鲜明的特色。还有

我认为很难说是福建人最早形成了海洋性格。舟山群岛发现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迹表明，当时浙江已有了航海历史。

就是岛屿突出，全国 6500 个岛屿，浙江有 3061 个。从很早时候

起，浙江沿海的人就和海发生了亲密接触，

与海洋同进退。比如在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木桨、陶舟、深海鱼骨，以及在舟山群岛发现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迹，都表明大概在六七千年前，浙江就有了原始的航海活动，进行海洋渔捕，甚至跨海航行定居海岛。浙江的造船、航海及海洋贸易一直较发达，有些方面一度曾领先全国。

◎ 曲金良

总的来说，欧洲有西方海洋文明的模式，中国有自己的海洋文明模式。中国有这么大的海域，又有不同的区域，从南方到北方，从黄海到北部湾，在这些不同的区域中，我们有各地不同的海洋历史文化积淀，各个地区的海洋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和特点，对中国海洋文明的贡献也都有不同的东西。

相对于南方沿海来说，山东地区是中国文明中心区域最直接的沿海地带和海上门户，是中国彰显海洋特色历史最早的地区。山东最早的“东夷文化”其实就是“东海文化”，考古界还在山东半岛发现了六七千年前的渔漂、渔钩、网坠还有沿海城市遗址

等等。春秋时代的齐国，是当时的“海王之国”。当然还有很多：“殷人东渡”、

中国有这么大的海域，从黄海到北部湾，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色。向海洋发展是山东人自古以来重要生活方式。



濒海和多山是福建地形最大的特点，也是造就福建海洋文明的重要原因。摄影 / 林丹

孔子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齐景公的“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秦代的“徐福东渡”等，都能说明这一地区海洋文明的先进。后来，秦始皇移民 3 万户于琅玕，更使山东琅玕港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沿海港口城市。此后山东在历史上一直是中国北方连接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的中心地区。这些都表明：向海洋发展是山东人自古以来重要生活方式。

◎ 叶显恩

广东沿海最适合自南到北的沿海人群与海洋互动。

广东背倚五岭，面临南海，有珠江水系纵横其间。地势北高南低，河道南流，海河互相沟通。中南部珠三角河涌密布，湖泊星罗。东南西三面濒海，海岸线曲折，其长度居全国之首。且港湾众多，可充良港。南海盛行季风，即冬季气流往往来自亚洲内陆，出现东北风向；夏季气流则来自太平洋和印度洋，产生西南风向。季风驱动海水移动，形成纵贯南海的漂流。两种季风所形成的漂流方向恰好相反，为古代居民乘简陋

的舟楫来往于南海对岸的南洋诸岛国，提供了天然的方便。最适合自南到北的沿海人群与海洋互动。

冒险开拓

◎ 庄国土

其实移民动机是一种诸因素的合一。福建移民是一种文化选择，这没有错。但是诸因素里应该还包含自然地理因素，除了广西以外，东南沿海福建山的比例是东南几个省最多的，可耕地是最少的，而且福建的地并不是非常富庶。而在广东向外移民最集中的汕头、潮州包括嘉应州（今梅州）这些地方，它的土地人口承载能力相关系数跟闽南大体相当。所以生存压力是一个应该考虑的问题。当然现代的情况跟鸦片战争之前不一样，最近我们和美国科学基金和纽约大学合作，在纽约和福州地区做了3000个移民家庭调查，涉及到4万多个移民，发现移民在纽约的收入比在福建的收入高20倍，这样大的差距，他肯定会选择出国。

的确，和浙江人相比，福建人更胆大妄为，出洋的人似乎有一种不顾生死的赌性，随便弄一条木船就敢去远洋，这里面的危险和艰难陆地上的人是感觉不到的。为什么福建人更冒险？特别是闽南粤东这个地方，我想生存的压力还是第一位的。浙江从唐中叶以后一直是中国的财富中心，闽南和粤东都跟它不可比。另外跟长江口以北比，闽南和粤东沿海一出去就是深水，就是准备一搏生死，你要讨生活就要有一搏生死的冒险精神。别的地方没有这个，比如说山东、辽东，没有一个地方像闽南和粤东人口压力这么大。

和浙江人相比，福建人更胆大妄为，似乎有一种不顾生死的赌性。个中原因，我想生存的压力还是第一位的。

我不太同意穷山恶水这个观点，我觉得福建人有一种文化自觉的选择，哪怕他在福建已经很有钱了，他还是想着到国外去赚更多钱。这也说明福建人比其他沿海地区的人更具冒险精神。

◎ 苏文菁

我不太同意“穷山恶水、地瘠人稠”是迫使大量福建人漂洋过海的主要原因这个观点。我觉得福建人的出洋应该是一种文化自觉的选择，把它放在沿海不同的族群中间，这种感觉可能特别明显。举个例子，从早年的下南洋、到今天“偷渡”到北美的福建人，都不是典型意义上的穷人。今天所谓的“偷渡”到北美需要7.5万美元作为资本，这是其他地方的人很难想象的，他们会认为7.5万美元完全可以过一种体面的生活了，何必漂洋过海去纽约打黑工呢？我个人认为，无论是下南洋还是“偷渡”，经济利益的驱使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福建人不像其他地区的人们，在生存压力大的情况下选择在中华大地上行乞，他们的选择是出海，将自己的命运、未来与海洋联系在一起。他们身上那种对现状不满的不安分是一种文化，就像当年乘着“五月花”号离开英国的美国先民们一样，他们总相信人类有更好的生存可能，是什么？他们也不确定！但是，他们愿意用自己的未来，甚至是生命来搏一把！

我觉得福建人的海洋性格决定了他们不会安分守己，这应该是一种文化的选择，同时也说明福建人比其他沿海地区的人都更具冒险精神。

冒险和不安于现状的精神，其实很难说是某一个地区所独有的，海边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 高伟浓

冒险和不安于现状的精神，其实很难说是某一个地区独有的吧，海边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就说后来的“猪仔”华工吧，开始时是被迫出洋，也没有想过什么冒险，但是一旦获得自由身，他们便开始冒险了。还有我们今天很少谈到的广东“四邑”一带的华侨，当年到美国淘金，修铁路，他们的冒险精神也不亚于其他的移民群体。

冒险精神我看不光是福建有，浙江也有。我们那边渔民在海洋上经常会面临死亡威胁，但是还照样去。

◎ 柳和勇

冒险精神，是海洋文化的重要表现，我看不光是福建有，浙江也有。有的事情没有办法，我们那边渔民在海洋上经常会面临死亡威胁，但是还照样去。以往渔民说他们在海洋捕鱼时，一只脚在棺材里，一只脚在棺材外。冒险是他们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生活，他们必须这样子。

福建是中国历史上 海洋贸易最发达的地区吗？

地位

◎ 叶显恩

广东是中国两千多年前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这没有什么争议。泉州港在元代的时候取代了广州港，但到明代以后，广州港的地位又恢复了。

广东是中国两千多年前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这没有什么争议，《汉书·地理志》记得清清楚楚。而且从魏晋南北朝以来，开辟了从广州通过海南东面到西沙群岛的航线，省去了绕行北部湾，从这以后，广州就是中国对外海上贸易的中心港了，这也没有什么争议。

要说有争议的就是福建泉州港，泉州港在元代的时候取代了广州港，成为最著名的港口，这毫无疑问，大家都承认。但泉州的兴盛起因于南宋偏安杭州，以及随后元代政治地理的变化，是政治因素起了作用。但到明代以后，

广州的地位又恢复了。万历六年至崇祯四年（1578—1631年）间，在广州还举行相当于今日“广交会”的国际性定期贸易集市，历时数星期至数月不等。葡萄牙等国商人可直接在集市上与名为“走广”的江南商人做买卖。



今天的福建省福清江阴港已成为全国十大集装箱港之一，并向着国际大港的目标迈进。摄影/王宁

◎ 苏文菁

宋元时期是中国政府或者说中央主流意识形态对海洋重视的年代，宋代的统治者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以“开洋裕国”为国策，这个时代福建的海洋文化特性也就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一时期，我们中国的中央政权对海洋贸易的重视，再加上阿拉伯国家在海洋上的拉动，福建，甚至是整个中国海洋文明在世界范围内都比较凸显。

宋元时期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对海洋最重视的年代，以福建为代表的整个中国的海洋文明在世界范围内都比较凸显。

而且海洋贸易作为世界循环的大交流，不完全是坐地收利的行为。我觉得广东的海洋贸易

类型从古到今，一直都是现在的“广交会”这样的形态，我设立一个聚点，世界各地的商人都来这里交易。福建的海洋贸易，历来是走出去的，闽商像水一样往外流，不论什么地方，只要有利益，闽商的商业行为就流到那里。同样属于海边，都有近海的便利，广东和福建有这样的差异：一个是吸纳型的区域，一个是外向型的区域。当然福建不完全是一个向外输出的港口，同时也是从世界各地接纳各种物产和文明的重要区域。

◎ 曲金良

我们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要考虑到整个中华文明，中国海洋文明和中华文明发展的基本路向是一致的，基本历史变迁的流向也是一致的，有一个经济中心南移的过程。

中国的经济中心在唐宋之前，主要是在北方。当时的中央王朝与海外地区的官方往来和海外贸易，在北方主要针对的是朝鲜半岛、日本群岛那一带。这和我们的航海水平有关系，早期的航海都是近岸航行占主导。

因此早期的海外贸易中心也就在中原地区的沿海，山东是重要出海口地带之一。从山东半岛跨过渤海海峡，到了辽东半岛，然后到达朝鲜半岛，进而到达日本。

我们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要考虑到整个中华文明发展的基本路向，中国的经济中心在唐宋之前，主要是在北方。早期的海外贸易中心也就在中原地区，出海口就在山东。

◎ 柳和勇

我们国家的海洋文化构成，海洋商贸当然很重要，但光是以商业衡量中国海洋文明绝对不够，这根本不符合中国的传统主流文化意识。中国的海洋文化应该是在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影响下的海洋文化，光是商业、光是海外移民肯定不够。比如海洋渔业和海洋制盐业也是中国海洋文明的组成部分，浙江的渔业文化在河姆渡遗址中就有体现，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舟山渔场是中国最大的渔场，而且两千多年前舟山渔场就有捕捞大黄鱼的记载了。现在国外有人专门研究“大黄鱼文化”，作为海洋文化的重要构成内容。

光是以商业衡量中国海洋文明绝对不够，这根本不符合中国的主体文化意识。还应考虑渔业。舟山渔场是中国最大的渔场，浙江的渔业文化从河姆渡时期就开始形成了。

商品

◎ 柳和勇

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在隋唐时运送的主要大宗货物是丝绸，但到了宋元时期，除丝绸外，瓷器也渐渐成为外销出口的大众商品。为什么海上丝绸之路主要运送瓷器呢？是因为瓷器易碎，不能大量从陆上运输，水运成本低、不容易损坏。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浙江出品的瓷器品质高，特别是隋唐时期的越窑青瓷代

“海上丝绸之路”主要运送瓷器，而浙江出产的瓷器品质高，宁波港古称明州，是海上丝绸之路东端重要的港口。我觉得说到海洋贸易的发达，在宋元时期，浙江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表了当时南方的最高水平，宋代龙泉窑青瓷代表了我国青瓷的最高成就。这一点可以从宁波附近的上林湖越窑遗址中得到证明。宁波港，古称明州，是海上丝绸之路东端

重要的港口。我觉得说到海洋贸易的发达，在宋元时期，浙江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所以，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申遗”，也应该是宁波、泉州、广州三家联合起来搞。

说到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必定要包含北方，必定要有山东。唐以前朝贡贸易的货源在哪里？主要都在北方。比如山东地区，从先秦就是丝绸业最发达的地区。

◎ 曲金良

我插一句，如果说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必定要包含北方，必定会有山东。海上丝绸之路的“申遗”，现在是四家了。

中国的海洋贸易中，论贸易量当然是民间贸易量大，但占中华文明主体的体制性的还是朝贡贸易。朝贡贸易的形式一直延续到明清，其间民间的海外贸易屡屡被政府宣布为非法。

唐以前朝贡贸易的货源在哪里？包括丝绸、陶瓷这些货物的产地主要都在北方。比如说山东地区，从先秦就是丝绸最发达的地区，所谓“齐纨鲁缟”就是证明。北方的桑是多年生桑树，用它养的蚕、制的丝的品质是非常高的，过去都用作贡品，然后皇帝再赐赠，作为朝贡贸易的主要货物。因此唐以前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在北方，后来逐渐南移。

◎ 叶显恩

从海洋贸易的货物来讲，大宗货物只有三种：丝绸、瓷器和茶叶。当然丝绸是古来的传统，但是18世纪20年代以后茶叶就取代它作为主要的出口产品。我更要提出一点，广东的海洋文化，结出了许多丰硕之果。其一就是桑基鱼塘，它是海洋文化的典型，是在传统农耕文化中种入了海洋文化的内涵，是为出口贸易服务的农耕。

我更要提出一点，广东的海洋文化，结出了许多丰硕之果。其一就是桑基鱼塘，它是海洋文化的典型，是在传统农耕文化中种入了海洋文化的内涵，是为出口贸易服务的农耕。

种桑养蚕本是最古老的农耕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珠三角“桑基鱼塘”与传统的农桑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在16世纪以后出现的海上贸易市场取向下兴起的，菲律宾马尼拉丝市的需求是其直接的动因。其指导思想是重商重利，目的在于满足海上贸易的需要。

◎ 庄国土

叶老师说到的茶叶，在 18、19 世纪的中国海贸上占

第一，这没有错，但这是怎么形成的？关键在于武夷茶的外销。福建武夷山生产的茶叶，在 17 世纪后期进入欧洲后就得以流行。福建茶叶主要输往欧洲的英国、法国、荷兰等国，并转输往美国，1900 年以前，其茶叶年运输量占茶叶输出总量的 70% 以上。

但是武夷茶不能从福建港口运出，而要运到广州再出口。因为当时清政府有一个规定：所有茶叶必须陆上运，不能从海上运。武

18、19 世纪清政府不允许武夷茶从福建港运出，而是要运到广州再出口，甚至引发了鸦片战争。后来被迫开放了五处通商口岸，其中福州和厦门就是运输武夷茶的主要港口。

夷茶要翻过武夷山进江西，然后沿信江进入鄱阳

湖，再从鄱阳湖进入广东的北江再运到广州，这一路靠茶叶生存的人很多，但这样运成本就非常高。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甚至说茶叶贸易引起了鸦片战争。因为英国人不能容忍茶叶要翻山越岭弄到广州去卖，所以要发动战争，所以要求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通商口岸，其中福州、厦门港成为运输武夷茶的主要港口，宁波和上海则是输出江浙皖茶叶的主要港口。

商人

◎ 叶显恩

广商是继晋商、徽商之后成就最大的。清乾隆以后，广州十三行商人取代徽、晋商人成为国内首富。例如广州商人伍秉鉴积资达 2600 万两白银（约相当于当时的 5600 万美元），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本。而且到鸦片战争前期，广商的生意已经做到了全世界，许多美国商人因营运的需要也要向他们借钱。有一位商人潘长耀还写信给美国总统麦迪逊，抱怨美国商人欠他 100 万美元还没有偿还。这些事情以前我们没有了解，最近才慢慢露出水面。

从上可见，广州的豪商已经置身于当时的国际市场之中，与传统的中国商人的经营理念不啻天壤之别。广商的商业网络不仅越过传统的南海水域伸展到欧美各地，而且与国际的贸易网络相交织，甚至已经直接投资于欧、美各地。这都是大手笔，有现代理念，产业革命和商业革命也首先在我们这里举起大旗，这些都是海洋文化结出的果实。

到 19 世纪以后广东的买办纷纷跑到上海，成了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新的经济制度的代表，推进了社会的前进。

清乾隆以后，广州十三行商人取代徽、晋商人成为国内首富。广商的商业网络不仅越过传统的南海水域伸展到欧美各地，甚至直接投资于欧、美各地。福建的海商也很厉害，福建的买办也很厉害，但他们不会转化。



对另一位女海神——“龙母”的信仰在唐代就已十分盛行，比妈祖信仰的历史更为悠久。龙母信仰至今在华南地区、香港、澳门和东南亚一带仍有着深远和广泛的影响。龙母太庙位于广西梧州，始建于北宋初年。
摄影 / 邹红

◎ 柳和勇

浙江有经商的传统，古代的“工商皆本”思想影响很深。上海的开拓发展就有浙江人的功劳。另外，香港的船王包玉刚也好、董建华也好，都是浙江人。

◎ 庄国土

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广州十三行，有七行是闽商而不是广东商人。刚才叶先生谈到的伍秉鉴也是福建人，作为十三行行首的潘家、伍家也是福建籍贯，福建商人就是哪个地方有钱赚就去哪个地方。

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广州十三行，有七行是闽商而不是广东商人。

浙江有经商的传统，古代的“工商皆本”思想影响很深。上海的开拓发展就有浙江人的功劳，上海的许多银行、纺织厂、轮船公司等，实际上都是由浙江人首先创办的。浙江商人在海外也是非常厉害的，香港的船王包玉刚也好、董建华也好，都是浙江人。现在，浙江人仍善于经商，很小一个商品会做到非常大：如纽扣，再小没有了，它可以做到全国 80% 以上的占有率，打火机也如此。浙江人精明、勤奋是公认的。

◎ 苏文菁

《南京条约》签订后，广州十三行失去外贸垄断的特权，清政府让十三行商人筹款作战争赔款，令富庶天下的行商家庭也纷纷破产。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火烧十三行”后，一些尚有实力的十三行商人带着大笔财富北上到上海，成为上海开埠的先行者。“五口通商”以后，上海迅速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上海的许多现代化的建设，包括很多现代化的文化设施如复旦大学都和这些商行到来有

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一些尚有实力的十三行商人带着大笔财富北上到上海，成为上海开埠的先行者，这些商行的商人大部分都是闽商。

关。这些商行的商人大部分都是十三行中的闽商，这也符合闽商们“哪里有钱赚，哪里就有闽商的影子”的特点。

而且福建人到上海以后，太快介入政治了，和小刀会、白莲教这些有诸多的关系，清政府特别为福建人设置了一道律令：“禁止福建人进入上海”。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奇特的现象。

妈祖是中国唯一的海洋保护神吗？

◎ 叶显恩

关于海神的问题，我们广东有“龙母文化”，和妈祖不是一回事

儿。还有南海神庙，那个庙宇很大，现在一到三四月份，不得了，很赚钱的，海内外都到那儿朝拜。还有南海神庙，历代皇帝派人治南海都到那里的。还有北帝神庙，也是崇敬水神。当然妈祖文化在我们那儿也有。我们另外可以讨论为什么妈祖能够这么盛行普及，南海神庙一直是官方派大臣祭祀的唯一神庙，在此之外没有别的。

◎ 柳和勇

妈祖信得是比较晚了，但是中国的航海活动是比较早的，中国早期航海活动当中的民间信仰和崇拜也是有的，比如观音道场为什么建在普陀山，就和航海有关系。古代到韩国去、到日本去，船必须在这里停靠，补充给养，祈求菩萨保佑平安。我们现在一个观点是，普陀山观

广东有“龙母文化”，和妈祖不是一回事儿。还有南海神庙，历代皇帝派人治南海都到那里的。还有北帝神庙，也是崇敬水神。

◎ 曲金良

关于海洋精神信仰，民间信仰也好，官方信仰也好，从老百姓来说，中原内地关于海洋的信仰主要是东海龙宫

和龙王，沿海渔民主要信仰是龙王，海商保护神主要有妈祖。在先秦的时候，关于海外世界还是带有神话色彩的，海上仙山、海上仙人，长生不老草、不老药，你说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我们相信不相信呢？我们当然很多人会怀疑这个东西。但是对历史的发展我们不能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评判，那个时候对于海外世界的精神追求是人们当时的航海动力。

中原内地关于海洋的信仰主要是东海龙宫和龙王，沿海渔民主要是龙王，航海以后才是妈祖。

妈祖信得是比较晚了，但是中国航海是比较早的，航海当中的其他民间信仰和崇拜也是有的，比如说浙江的普陀山，观音道场为什么建在普陀山，就和航海有关系。



音道场的形成是日本、韩国、中国共同弄起来的。虽然有人认为，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形成与日本高僧慧锷从五台山请观音像回日本时滞留普陀山有关，但我认为，海上交流活动是形成观音道场的最重要原因。古代，我们浙江和日本、韩国之间的海上交流是非常密切的。

妈祖信仰是我国传播最广、信众最多的海神信仰。摄影 / 周金琰

◎ 高伟浓

在福建人里面，航海保护神也不只是一个妈祖。比如清代朝廷派到琉球地方的册封舟上，除了妈祖作为必备的大保护神外，

还有其他一些福建地方的保护神被供奉着

或悬挂着。由此

推论，当时福建

人到南洋去，保

护神可能不只

是妈祖，可能

有别的保护神。

妈祖，我个人意

见，不能说她就

是航海神，神有个功能泛化的问题，妈祖肯定

多次被泛化。清代有关妈祖的档案材料表明，

哪里大堤决堤了，或者哪里有旱灾和涝灾了，

哪里需要求雨了，他们就供奉妈祖。总的来

说，大约与水有关的，都可能成为妈祖的保佑

范围，在中国大陆尤其是这样。

◎ 苏文菁

妈祖作为海洋文明的精神符号，如何建构到中华文明中的呢？我们都注意到她是女性形象，福建人叫她“妈祖”，这是对家里女性长者的称呼。联想到观音在印度是男的在中国变成女的，欧洲人创造的海神波塞冬是男的，而福建人创造的海神妈祖却是女的。为什么福建创造一个女性形象的海神妈祖呢？我们经过思考，就把它和孝道思想联系在一起，这是宗教的移位，这可能更符合中华文化的建构性思想。

福建人在出海的时候也是有恐惧的，恐惧是人类面对海洋时的一个正常心态，这种恐惧用什么东西转化呢？用文化

心态来转化：我出洋谋

生、搏击海浪不是为了

自己，我是为了我的家

人，这是孝道的表现，

神明一定会保佑我。这

就是妈祖这样一个区

“妈祖”是福建人对家里女性长者的称呼，我们把它和孝道思想连在一起，这已不是简单民间信仰，而是带有浓厚福建区域色彩的中华文化。



福船作为远洋商船，在中国古代海外贸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域性的小海神能建构到儒家文化里的重要原因。历史上许多统治者对妈祖进行加封，应该说它跟儒家最核心的孝道，维护家庭伦理，进而到儒家观念的家和、国兴、太平盛世有很大的内在联系。

◎ 庄国土

关于妈祖

文化也好、海神

文化、中华文化、

海洋文化，我觉得一涉及到文化一定要

非常小心，比如说我们讲海洋文化也好，还是

妈祖文化也好，提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现在

有一个习惯，大家什么东西都会往文化里装。

当我们说妈祖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的时候，同样关帝文化、土地公文化等各

种文化也同样重要，后两者甚至比妈祖更多，

在海外也好，在国内也好，土地公都比妈祖更

多。我们要把妈祖装到中华文化的筐里，还是

装到妈祖文化里面，一定要有一个逻辑的证明，

就是说它在这里面的比重

是什么样的。我们要论证什

么，应当对论证内容有个明

确的学理性定义，推论也要

有逻辑性，否则就成自说自

话，自娱自乐了。

福船是中国最具远洋能力的帆船吗？

◎ 许路

从宋代的开洋裕国，到元代的海上远征，明初的下西洋，明初至清道光 460 年间的 22 次册封琉球，明中期的抗倭，明后期与葡萄牙远征船队的交火，清初的郑氏抗荷、郑经海上割据以及郑氏垄断对日对东南亚的海上贸易、清代前中期中国帆船在东南亚贸易的主导地位及移民潮，在这些重大的官方和民间海事活动或事件中，福船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这些历史阶段中，福船是中国最具远洋能力的帆船，甚至到了鸦片战争前，福船的建造和航海技术还优于欧洲的帆船，而福船在鸦片战争之后的没落，主要原因在于五口通商后受到诸如拒绝保险与强制护航及课以重税的压制和摧残而非技术上的落后。1913 - 1955 年，历史记载中，福船三次横渡太平洋，到达美国西海岸。这是福船最远的航程。

鸦片战争前，在重大的官方和民间海事活动或事件中，福船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些历史阶段中，福船是中国最具远洋能力的帆船。

至元二十九年（1293 年）广东宣慰使塔剌海哈命亦里迷夫、史弼率元“兵二万，海船千艘，攻爪哇”。这已近乎远洋攻击了！其所需之战舰

一定是上了规模的。明代由于东南沿海抗倭的需要，将其中东莞的“乌艚”，新会的“横江”两种船增加战斗设施，改为良好的战船，“广船”在肃清倭患中作出了很大贡献。广船和福船都是在帆船年代适合远洋航行的船，元代，广船曾到达波斯湾。

平底沙船是我国历代皇朝南粮北运的主要运输船舶，也是南、北各口岸货物贸易的主要运输船种。沙船对上海港口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有重大历史作用。

◎ 韦文禧

平底沙船是我国历代皇朝南粮北运的主要运输船舶，也是南、北各口岸货物贸易的主要

运输船种。元代实行海上漕运，据《大元海运记》记载：朝廷委张瑄、朱清主办海运，曾有“限六十日造平底海船六十只”的诏令。沙船对上海港口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有重大历史作用，清朝道光年间上海有沙船 5000 艘，上海市的市徽就是以沙船为基本图案再加一白玉兰花而

构成的。一般认为沙船不是远洋海船，但是沙船也能到日本、琉球群岛。我想秦始皇时，术士徐福东渡扶桑用的就是沙船。□

广船和福船一样，都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航海船。广船一度是著名的战船，在肃清倭患中作出了很大贡献。元代，广船曾到达波斯湾。

◎ 金行德

广船和福船一样，都是中

国古代著名的航海船。唐代广东建造多种民用海船，当时的阿拉伯客商都喜欢搭乘大唐海船东行，有的甚至租赁或订造。其中著名的有“苍舶”，船长 20 丈，能搭载六七百人；还有“木兰舟”，可搭载数百人。在元代，广东海船已趋于大型化、军事化。

责任编辑/刘晶 张璇 杨嘉敏 王杰 耿菲琳
图片编辑/吴敬 版式设计/介彬

心旅程·新感动

MY JOURNEY, MY HANDBAG



联想 ideapad 笔记本

收藏旅行感动的行囊

摄影/郭继江



撰文/李申

在冬季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我手上这台16寸的联想ideapadY650笔记本电脑是我最好的伙伴。

在特罗姆瑟，我拍下了这里两个月来看到的第一缕阳光，连同思念的情书，一起用它传给我的女友。它有全新设计的高触感键盘和CITI-IMPRESSION的外观，以及具有自动对焦功能的摄像头，用起来完全得心应手。

在奥斯陆，我看到了在大雪和黑夜覆盖下的挪威人的狂欢，数百张充满笑容的美丽面孔，被我收藏进了我的联想ideapadY650，摆成了一个数字的华丽展览馆。

在霍宁斯沃格，我站在欧洲大陆的最北端，这里一面是海，一面是峭壁，冰天雪地之中，我的联想ideapadY650还能正常工作，帮我查询这里的地理资料，我知道这

里是北纬71°，东经25° 40'。

一次，我水土不服，高烧不退，在异国他乡的医院，这款娱乐性能超强的16寸笔记本电脑，陪我看东北的二人转，给我解闷。它拥有真正的16:9的全高清LED背光液晶屏幕和最新的NVIDIA GeForce G 105M 独立显卡，这款最新的移动显卡拥有256MB



GGDDR3独立显存。它同时还具备杜比家庭影院音响系统，以及以“音质”著称的JBL品牌音响，小小的机身，却有完全不输给顶级家庭影院的震撼享受。

联想ideapad Y650笔记本就是为了高清娱乐生活而生，不但可以让我欣赏完美的高清视频，还可以尽情享受3D游戏的乐趣。

我背着它走过了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山脉，幸好它采用了特殊的机身设计，以及采用了仅应用于航天和汽车工业的碳纤原料，重量只有2.55kg，比很多15寸的笔记本电脑还要轻巧。

联想ideapad Y650一改往日影音笔记本笨重的外观，它是最轻俏的16寸笔记本电脑，黑白分明的外观设计，圆润的边角、橙色的腰线，宛如一款代表顶级时尚的“handbag”，十分出众。A面六边形纹路设计，浓缩了现代人心中的城市印象，在这空间几何中自由构建自己的精彩世界。ideapad Y650的内部设计同样让人眼前一亮，纯白色钢琴漆C面与黑色的墨晶屏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加重了城市印象的设计感，令人印象深刻。

这款笔记本电脑为我增加了很多的回头率，我骄傲地告诉热情的挪威人，这么漂亮和强大的电脑出自一家中国企业。

它很博学，随时随地为我答疑解惑；它很轻，完全不会为我的背包增加负担；它很坚强，无论是户外还是冰天雪地之中，都能全力以赴投入工作；它很善于交际，在千里之外也可以让我和我的朋友分享旅行的愉悦和兴奋。

挪威有世界上最干净的风光和著名的北极光，我手边有这台联想最新款的笔记本电脑，这次旅行简直太完美了。

每一个美好的产品，都有超越物质进入精神层面的东西，我没法想象一次没有它

的旅行，我的联想ideapad Y650。



心旅程·新感动
ideapad Y650笔记本





6月的一个傍晚，几艘渔船刚刚靠岸，停在宁德市霞浦县东壁村的小港湾里。渔民回家休息了，将一张张渔网平整地晒在滩涂上。这梦幻般的蓝色、这耐人寻味的意境，很容易引起观者对霞浦的向往。

摄影/李柏林

海上还有一个福建

撰文/左凌仁 摄影/郑德雄 等

福建拥有全国最曲折的海岸线，给它平添了众多的天然海湾、滩涂，闽江、漳江等几条大江入海口也拥有发育良好的湿地或红树林，这给福建的海水养殖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海水养殖业的蓬勃发展让海上又多出了一个福建，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的地理格局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形成了“三山六水一分田”的新格局。

● 你是不是以为这些渔民正在打捞的是海苔？错，海苔是用紫菜加工的。这些细丝状的绿藻学名叫浒苔，别名苔菜、苔条，在宁德市连江县出产较多。苔菜的产量可不像海带那么多，只有在高档餐厅才能吃到，据说十分可口。摄影 / 杨建峰





福建沿海的海湾中几乎每个都有河流入海，营养物质丰富。这些海湾多数三面环山，口小腹大，水流稳定、温度适中，而且风力较小，还可以极大地减少台风的不利影响，是海水养殖的绝佳场所。



初春的福建浸泡在雨季的迷雾里，车子行走在海边，雾气从车窗的缝隙钻进来，让我享受着湿润的同时，也感到丝丝凉意。公路沿着曲折的海岸线蜿蜒向前，身旁的大海已经变成了水上农田。在福建 3752 公里长的大陆海岸线上，从随潮水涨落而时隐时现的滩涂到近海浅湾，随处可见水产养殖的围垦田、网箱，一眼望不到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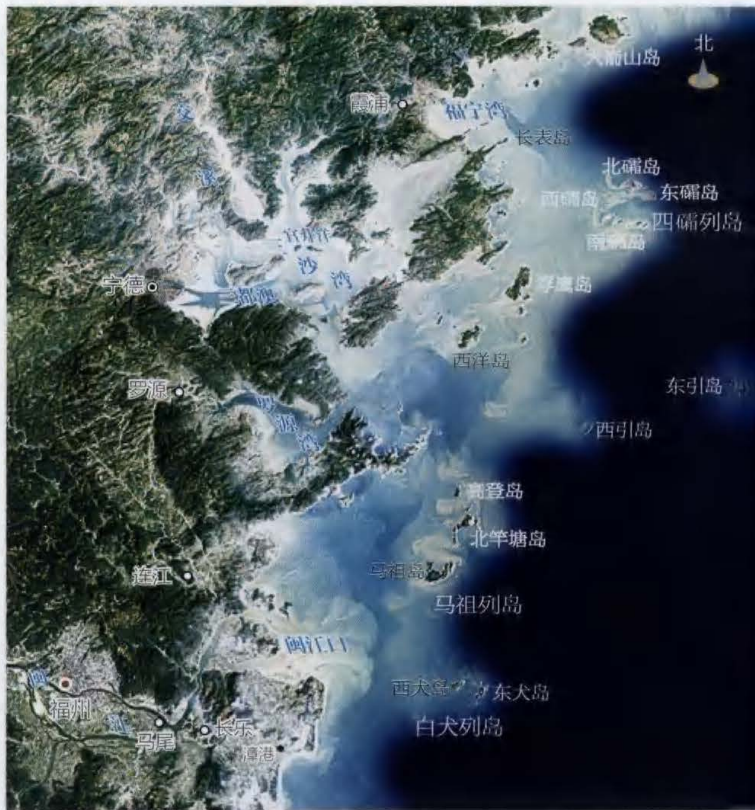
福建处于中亚热带、南亚热带的交界，属亚热带海洋气候，气候温暖湿润。这里海阔水深，海岸线长，岛礁资源、海洋渔业资源十分丰富，是贝、藻、鱼、虾、蟹等水生动植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海域之一。但是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沿岸、近海渔场捕捞压力加大，传统捕捞对象资源衰退和变动，大黄鱼、墨鱼已在福建各海域形不成鱼汛，渔业捕捞只能到更远的外海甚至远洋作业。与此同时，海水养殖推向了 30 米等深线以外海域，田园牧歌式的传统捕捞不可避免地开始让位于海水养殖。大海变成了农场，寸土寸金，只要容得下一个网箱的地方都不会被闲置。这改变了沿海的景观，改变了大海原本健全的生态系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而且还继续在改变着这里的一切。

海湾：一湾净水遍海田

福建大陆海岸线的南北直线距离总共不过 500 多公里，由于受多组与海岸线交错的断裂构造的影响，加以波浪和潮汐的长期侵蚀作用，海岸十分曲折，曲折率居全国首位。折来弯去，竟被它绕出 3752 公里来，让福建成为全国大陆海岸线最长的省份。在海岸曲折之地，海水深入到大陆腹地，见缝插针，掠去所有低处的土地，迂回在大山的谷地间，形成美丽的海湾。

著有《福建生态环境》一书的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的曾从盛教授说：“福建海湾

左 〇 霞浦县涵江村，5 月，刚从海里捞出的浅棕色的海带，像一串串大鱼被晾晒在竹架上。快涨潮了，渔民们为了避免海水将待干的海带浸湿，正两两一组拽着控制海带的绳子，让海带高高地吊起来。



福州—霞浦海岸及滩涂卫星遥感图

福建拥有中国最曲折、最漫长的大陆海岸线，滩涂十分广阔。福州至霞浦这一段的卫星遥感图集中展现了福建海岸线之曲折、滩涂之广阔、海湾和海岛之众多，这正是福建水产养殖业发达的先决因素。制图 / 魏建宏

众多，大大小小算起来共有 125 个。”在这些海湾中，三沙湾面积最大，达 710 多平方公里，20 米以上深水海域面积达 143.85 平方公里，最大水深达 110 米，堪称世界一流的深水大湾。曾教授说：“福建沿海的海湾中几乎每个都有河流入海，营养物质丰富。这些海湾多数三面环山，口小腹大，水流稳定、温度适中，而且风力较小，还可以极大地减少台风的不利影响，是海水养殖的绝佳场所。”

到宁德之前，我一直坚信大黄鱼是自己家乡——山东——的特产，不料，这坚定的信念被一句话彻底粉碎了。“山东根本就不产大黄鱼，福建才是大黄鱼真正的故乡！”说这话的是担任宁德市蕉城区科技副区长的高级工程师苏跃中，国内有名的研究大黄鱼的专家之一。于是，这位刚为蕉城区赢得中国渔业协会授予的“中国大黄鱼之乡”名号的专



● 闽东的鲍鱼养殖以浅海网箱为主，在连江县定海湾内，网箱鲍鱼的养殖密度很大。这个工人拿的小鲍鱼大约半年大，通过它壳上那明亮的绿色，就可以判断出它一直吃的都是新鲜的海带。鲍鱼壳上的色道，忠实记录了鲍鱼在不同阶段吃的都是什么食物。摄影 / 徐健

井洋进行的敲罟作业，严重地破坏了大黄鱼资源。”罟是一种用竹筒制成的工具，渔民用连续敲击的方式，产生巨大的声响和震动，使大黄鱼这样的石首鱼类的耳室产生强烈共振，导致不管大小，通通昏迷上浮被捕捞，对资源造成毁灭性破坏。到上世纪 80 年代初，浙江舟山、福建闽江口等重要的大黄鱼渔场均已无法形成鱼汛。

苏跃中又自豪地微笑着说：“多亏我们宁德出了一个‘大黄鱼之父’——刘家富，大黄鱼又起死回生了！”这位老人利用三都澳官井洋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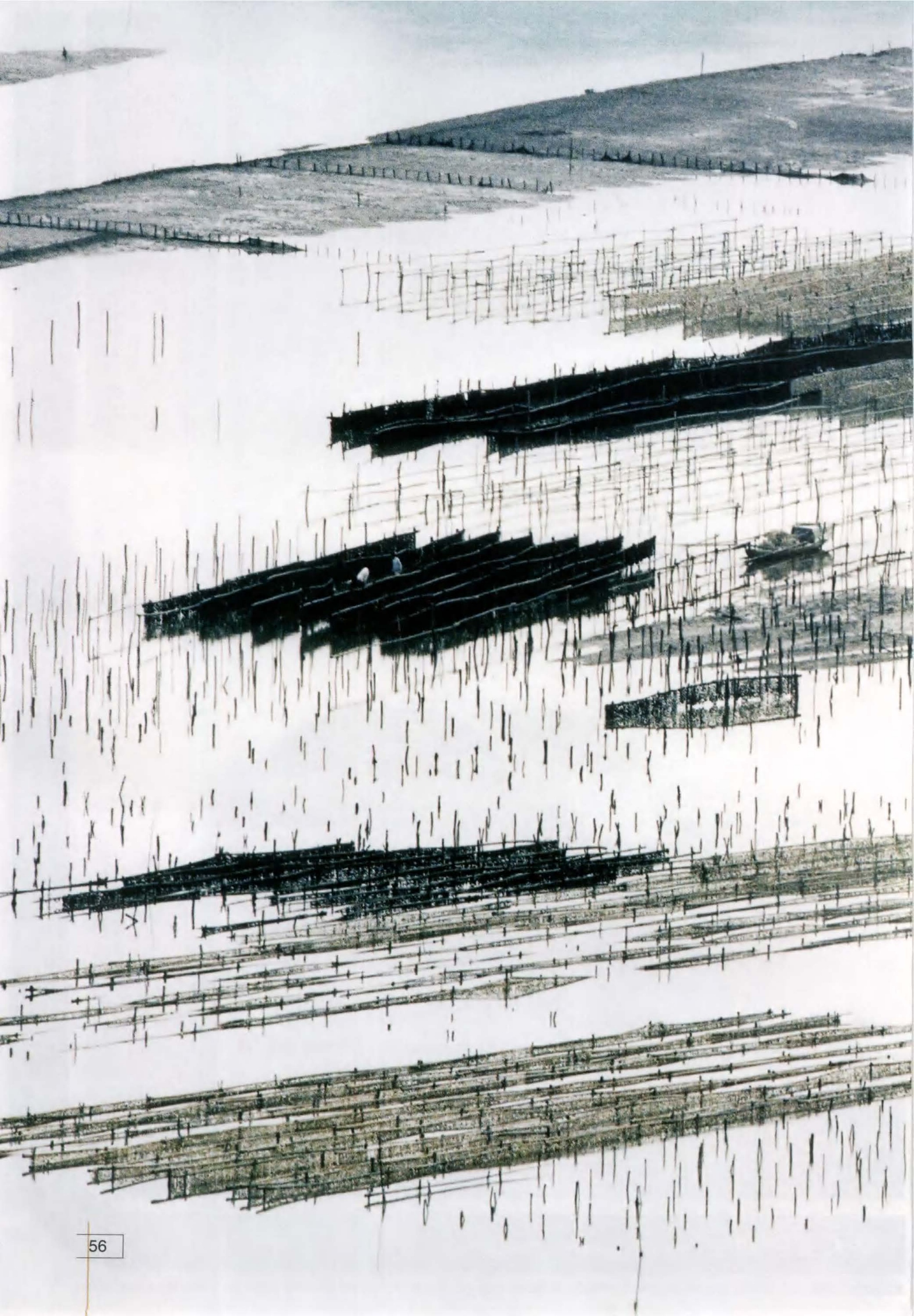
家型官员面带微笑，开始给我讲解大黄鱼的林林总总。山东之所以会被很多人认为是大黄鱼的产地，是因为山东的确是中国大黄鱼出口销售的重要基地，其实并不出产大黄鱼。而原本在福建盛产的大黄鱼之所以名不见经传，是因为在几十年前，福建有关部门在大黄鱼出口方面的一些限定，导致大黄鱼无法从福建直接出口，只能转道山东出口到韩国、日本等国家。

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水流，使得宁德三沙湾内的三都澳官井洋成为中国唯一的内湾性大黄鱼产卵场。大黄鱼属于亚热带海域的洄游性鱼类，原居中国海洋四大主捕对象之首，最高年产量达 20 万吨。但是由于酷捕滥渔，国内大黄鱼资源几近枯竭，濒临绝种。苏跃中说：“特别像我们闽东渔民在三都澳官

我国唯一的大黄鱼内湾性产卵场的有利种源条件，于 1985 年进行了大黄鱼海上人工采卵和人工育苗试验，当年就成功实现了人工育苗。

之后，三都澳的大黄鱼养殖业随之兴起。苏跃中说：“现在，宁德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大黄鱼养殖产区和出口基地，2007 年大黄鱼产量 6 万吨，约占全国的 70%。”宁德市人民政府于 2005 年 4 月成功地向国家质检总局注册了“宁德大黄鱼”原产地标志，现在，大黄鱼已经逐渐成为宁德市的金字招牌。

到达宁德的当天下午 2 时许，我冒雨赶往蕉城区三都澳的大黄鱼、鲍鱼养殖区。游艇飞速地在一排排网箱之间穿行了 20 多分钟，路过一个很大的鱼排时，开船的渔民说：“这些都是从大连獐子岛过来的，养鲍鱼的。”我以为听错了：“獐子岛的鲍鱼怎么会在这





○ 5月傍晚的霞浦，云淡村，新近收获的牡蛎和早些时候收获的牡蛎均整整齐齐地挂在竹架上晾晒着，只是新挂上的牡蛎呈灰色，早先挂上的是黑色。当地人习以为常的“挂蛎”，经摄影师定格成黑灰两色为主的画面后，犹如一幅写意的水墨画。





在福建平潭岛，摄影师采用二次曝光的方法，将黄昏的光线和夜晚的灯火融为一体，为我们拍下这张灯火通明的海上人家照片。跟福建众多海湾地区一样，这里水产养殖用的网箱密密麻麻连成一片。在近海网箱养殖急速扩张的当下，如何让养殖环境不至于急速恶化，生产出质量优良的水产品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摄影 / 石广智



“十日捕鱼九日空，一日得鱼九日功”，虽然浅海网箱养殖改变了捕鱼难的状况，但渔网还是渔民必不可少的工具。10月的霞浦，这些渔民把网铺在海边沙地上，一边晾晒一边补网，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颇有田园牧歌的意味。摄影/李响军





3月初的福建，多日连雨，霞浦大面积养殖的跳跳鱼，早已钻进泥质的滩涂下“冬眠”了，让摄影师徐健一心想拍到大场面跳跳鱼的计划成为泡影。因为环境和天气等条件的制约，为了防止跳跳鱼在拍摄过程中突然钻入淤泥，徐健特意将其放置在霞浦县沙质的滩涂上，为我们拍摄到这张照片。摄影/徐健

他的鲍鱼育种场和养殖鱼排都位于连江县定海湾内，他也是连江县第一个养鲍鱼的人。“2000年的时候，整片海区就我一个人养鲍鱼，当时养了10万粒，可是现在，”吴捷站在自家的鱼排上，挥手在身边画了一个大圈说道，“整片海湾里都是养鲍鱼的，1000多家，这个湾子里估计有3亿到3.5亿粒鲍鱼。”

对于海湾养殖的弊端，曾从盛认为：“福建海湾口小腹大，也导致了湾内海水交换能力弱，一旦海水养殖的密度过大，很容易导致水

产品大规模地暴发病害。”目前，福建鲍鱼、大黄鱼、鳗鱼、对虾等水产养殖品种养殖病害都较为严重。三都澳的大黄鱼养殖基地的鱼排区，过去大型的渔船能够进出，现在连小型的渔船也无法进入，加之大量使用冰鲜鱼作为饵料，造成养殖水域自身污染严重，大黄鱼在局部地区的养殖密度过大。2005年夏季，官井洋海区就出现网箱养殖大黄鱼鱼苗大量死亡的现象。

滩涂：泥淖深处淘海金

海水养殖，还有一片很重要的区域不可忽视，那就是海洋滩涂。它也是人类最早成功开发和利用的海洋地域。福建海岸许多岸段山丘直逼海岸，海底岸坡较陡，湾外滩涂又受风浪、海流冲刷，所以全省滩涂平均宽度

儿养呢？”

船开始减速，一个硕大的“海上渔村”的牌子出现在眼前，两条大狗吼叫着向快艇缓缓靠近。几十只网箱有序地分布在三栋红顶木房旁边。

这些人的鲍鱼的确是从大连獐子岛运过来的。一个正在给鲍鱼喂食海带的小伙子说：“冬天大连那边比较寒冷，鲍鱼生长缓慢，而三都澳这里水温适合，水质也好，海带、紫菜这些鲍鱼的食物也多，所以我们就用船载着活水，把鲍鱼运到这里来养，这样可以比单纯在大连养鲍鱼增加将近半年的生长时间呢。”

鲍鱼是时下中国海鲜市场上绝对的宠儿。自1987年鲍鱼在中国大连首次被成功养殖以来，鲍鱼在中国的产量呈爆炸式的增长。吴捷是连江县捷丰海珍品开发有限公司的老总，

仅 3.85 公里，比渤海、黄海沿岸及长江口地区的滩涂狭窄得多，而且面积分布不均。福建沿海拥有滩涂面积 2700 多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罗源湾、三都澳、福清湾、兴化湾等 18 个港湾内，约占全省滩涂总面积的 75%。

滩涂是生活在这些海湾沿岸渔民的肥沃良田，在这里 1、2 月份可拾蛏苗，3、4 月份可插牡蛎，5、6 月份可晾海带、捞鱼苗，9、10 月份可挂紫菜，还有经年不息的鱼排养殖和讨小海。在滩涂生物群落中，贝类是优势种类，目前在福建已经开展人工养殖的种类有泥蚶、缢蛏、西施舌、波纹巴非蛤等贝类。

说起福建的滩涂，就不得不提及霞浦，尽管它境内的滩涂并不是福建省最大的，但却是最有名的。霞浦境内的滩涂近几年来以种植紫菜为主，几千张种植紫菜的网和毛竹的支柱遍布整个滩涂，那阵势远胜于陆地上农作物种植的景象，俨然就是海上农场。我们到时，紫菜的收获季节已经过去。不过我们并不是为了欣赏那人文美景而来，而是为这里滩涂中养殖的一种不起眼的小鱼——跳跳鱼——而来。近些年来，跳跳鱼的滩涂养殖给霞浦人带来了巨大财富。

站在霞浦县长沙村后的高地上，眼前望不到边的滩涂被一条堤坝分成了两大片，一

片直接连到海边，是泛着微光的巨大滩涂，上面零星点缀着几条搁浅的渔船，以及渔船行驶时留下的航迹；另一片已经被竹竿和渔网分割成无数片豆腐块，里面一汪汪浅浅的海水波光闪动，这里是霞浦县长沙村的万亩大弹涂鱼养殖基地。

“跳跳鱼”是大弹涂鱼的俗称，是一种生长在滩涂上的鱼类。厦门大学海洋与环境学院教授洪万树说：“由于跳跳鱼会弹跳，所以很多人都买给孩子吃，认为孩子吃了后会活蹦乱跳。而且其肉味鲜美，营养丰富，有清热解毒的功效，所以深受闽东及浙南沿海一带渔民的喜爱。”但是野生跳跳鱼产量很低。2004 年，洪万树成功地攻破了跳跳鱼的人工育苗科技难关，并在霞浦境内对跳跳鱼土地养殖技术加以改善，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于是，养殖跳跳鱼在霞浦风靡一时。

不凑巧的是，我们来的季节不对，3 月份天气还比较冷，跳跳鱼们都窝在深深的泥淖里。当我们提出能否帮我们挖出一些跳跳鱼来拍摄的时候，村里的渔农很无奈地摇摇头。原来在这个季节想要抓塘里的跳跳鱼，需要用拖拉机的动力，把整个塘里的泥土搅浑，这样会把跳跳鱼出入的洞口封住，为了获得氧气，它们会从地底出来，就很方便捕捉了。不过现在



左 西施舌数量稀少，目前还不能人工繁育，用它为主料做成的名菜“鸡汤氽海蚌”被誉为传奇闽菜，致使这种贝类身价不菲，远远超过鲍鱼。在福建长乐海蚌资源增殖保护区里，这样掌心大小的西施舌也并不多。摄影 / 徐健

右 无论南北方，肉质鲜美的蛏子都是深受大众欢迎的海产。福州琅岐岛常年有大量淡水注入，海水咸淡适宜，饵料丰富，特别适合养殖蛏子。这几个收获颇丰的渔民，正准备把浸满淤泥的蛏子洗净出售。摄影 / 杨建峰

由于跳跳鱼会弹跳，所以很多人都买给孩子吃，认为孩子吃了后会活蹦乱跳。而且其肉味鲜美，营养丰富，有清热解毒的功效，所以深受闽东及浙南沿海一带渔民的喜爱。



上世纪 80 年代初,闽菜大师强木根、强曲曲创出“鸡汤氽海蚌”这道特级佳肴后,从国宴到省里的高规格接待以及现在的大宾馆饭店都将这道菜列为招牌菜。据说,西哈努克亲王每次到北京都点名要这道菜。

跳跳鱼的销售已经过了黄金时间,所以渔农并不愿意抓。“春节时候最贵,一斤能卖六七十元钱,一亩跳跳鱼塘内大概有几千条,上百斤,现在抓出来,卖不了好价钱,很亏的。”

霞浦县长沙村的村民以前本是以种水稻为主,但是跳跳鱼诱人的市场价格,吸引了村民们纷纷转为人工养殖跳跳鱼。在长沙村跳跳鱼养殖田的旁边,我遇上了村民林先生。他给我算了一笔账:“我今年养了 30 亩的跳跳鱼,一亩地产量在 120 斤。现在市场价,每一斤是大几十块的毛利,我去年春节期间一亩地赚了近 6000 块,你算算能赚多少钱。”大几十块是福建方言,意思是 50 元以上,100 元以内。掐指一算,仅养殖跳跳鱼,林先生一年就能赚近 20 万元,难怪不再种水稻了。

“G15”是沈海高速公路(沈阳—海口)的编号,它是唯一一条贯通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高速公路。从霞浦沿着沈海高速路南下,当高速路与自西而来的闽江交叉的时候,我们也来到了闽江口。由于闽江带来的泥沙长期在此淤积,形成广阔的滩涂和众多沙洲,水草茂盛,是福建目前已知的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湿地。在这里有一种珍稀的物种——西施舌。

西施舌,多么诗意的名字啊!西施舌是福建的一道名菜,也是长乐当地的一种名产。它是一种海蚌,壳大而薄,略呈三角形,长约 6—7 厘米,表壳黄褐色而光亮,顶部为淡紫色。因其两壳之间的腹足,形如人舌,故美其名为“西施舌”。福州长乐漳港镇海蚌场的刘德经场长告诉我:“全世界曾经仅有意大利威尼斯产的海蚌可与之媲美,如今威尼斯的海蚌已经绝迹,所以这种海蚌更显珍贵。其实西施舌在我国东南沿海均有出产,不过以福建闽江口的长乐一带品质最好,因为长乐位于闽江口,有大量淡水注入,海水半淡半咸,

水温相对稳定,很适合西施舌生长。”

西施舌被称为人间至味始于宋代,世代相传之下,备受青睐,成为传奇闽菜。上世纪 80 年代初,闽菜大师强木根、强曲曲创出“鸡汤氽海蚌”这道特级佳肴后,从国宴到省里的高规格接待以及现在的大宾馆饭店都将这道菜列为招牌菜。据说,西哈努克亲王每次到北京都点名要这道菜。长期以来无节制的过度捕捞使漳港海蚌产量锐减,西施舌遭遇生存危机,身价暴涨,最高时每公斤卖到 400 多元,平时每公斤也需 300 多元。据刘德经场长回忆,上世纪 80 年代,西施舌最高年产量达到近 600 吨,当年一公斤也就卖几角钱,而去年的产量还不到 10 吨。

为了保护西施舌资源,除了打击盗捕盗捞之外,长乐海蚌场进行了海蚌的育苗和生长的研究工作,但是刘德经场长表示,目前西施舌的人工繁育研究尚未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所以海蚌场都是到野外捕获幼苗,进行人工饲养后再进行增殖放流。在长乐海蚌场,我们见识到了此行唯一一种并不是以获利为最终目的的养殖,这里已成为西施舌资源恢复的希望所在。

红树林:漳江河口青蟹美

在福建沿海的滩涂中,还有一片很特殊的区域,那就是闽南漳江河口的红树林。红树林是由红树科的植物组成,组成的物种包括草本、藤本红树。它生长于陆地与海洋交界带的滩涂浅滩,是陆地向海洋过渡的特殊生态系统。现在,漳江口的红树林是中国红树林天然分布的最北界,也是我国北回归线北侧种类最多、生长最好的红树林天然群落。

云霄海洋与渔业局的方志亮局长告诉我们:“漳江多年来一直是福建省污染最轻的河流之一,由于红树林就位于漳江河口位置,所



左 ● 大黄鱼在南北方的餐桌上都是常见的海产品，因为销量巨大，经常有人用其他鱼来冒充。这是在大黄鱼的故乡三都澳官井洋、大黄鱼唯一的内湾性繁育场内拍到的专门用来繁殖的亲鱼，绝对正宗。捕捞大黄鱼都在晚上，因为大黄鱼只有在夜晚才会呈现出金黄色。摄影 / 徐健

右 ● 在长乐市的聚泉食品公司，一条鲜活的鳗鱼被冰昏、宰杀、清洗后，进入长达一百多米的烤鳗流水线，最后成为香气扑鼻的烤鳗。流水线上的工人不多，这个工人正在遴选上色后的烤鳗，检出不合格的。摄影 / 徐健

以红树林内生物多样性丰富。红树林能净化海水，留住江水从上游带来的有机物质，因此红树林以及周边滩涂中的鱼类和甲壳类品质高，这里天然生长着数量巨大的缢蛏及锯缘青蟹苗，所以漳江口锯缘青蟹的品质特别好。”

之前一直以为，一只螃蟹从出生后，它的壳也随着身体的生长而逐渐长大，听方局长讲过后才知道，所有的螃蟹在生长过程中都要换壳。“像锯缘青蟹这么大的螃蟹，想要长到手掌这么大，一般要经历 14 次脱壳，脱壳后，它的个头长大，最外层的物质很快就会长成新的硬壳。”锯缘青蟹食用的最佳季节是春节期间，此时的螃蟹已经进入繁育期。方局长说：“这时候都是膏蟹，肥得很，不过最好的是油蟹。”据他讲，“油蟹”是母蟹，只有籽多得连大蟹里面都满满的才可以被称作“油蟹”。他说：“我 20 多年来，也就见过一两次这样的蟹。”

在云霄，晚饭一如既往地是丰盛的海鲜，种类也都差不多。一路上带领我奔波于各个养殖地的向导——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民之友》广播节目的总编辑汤忠民和司机林师傅，他们已经跑遍了福建绝大多数的水产养殖地，但是到了这里后，对着眼前的泥蚶大快朵颐，并且连连称赞。方局长笑着说：“因

为这么好的泥蚶在其他地方根本找不到。”但是我们几个从北京过来的却浅尝辄止，因为当地食用泥蚶都是稍微过一下热水，剥开壳之后还有血迹，味道虽然很鲜美，却带着一股令我们消受不起的腥气。

方局长告诉我们，当地人提起云霄的土特产时都说，“云霄上面有两粒，下面有两粒。”上面两粒指的是枇杷和杨桃，下面两粒指的就是泥蚶和波纹巴非蛤。由于距离台湾很近，所以云霄、东山一带与台湾的交流往来也很多，台湾对当地的影响也很大。波纹巴非蛤就是受台湾人启发，才走上当地人的餐桌，并让很多当地人发家致富。

波纹巴非蛤一般生活在浅海区，在东山湾内广泛分布，云霄和东山境内都很多。在位于东山湾的东山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何伟湃和我们聊起了波纹巴非蛤，他说：“几十年前这种蛤在这里到处都是，人们下海游泳时随手都能摸上很多，但是当地人一直都不吃它。”因为这种东西偏寒性，当时人们生活水平不高，吃了以后会闹肚子。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时，当地允许对台小额贸易，巴非蛤由于口感脆嫩、肉质鲜美，很快就获得了台湾人的青睐，成为抢手货，大量输出到台湾。随着当地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肉质、蛋白质食物

的丰富，食用巴非蛤对人体影响也消除了，所以当地人也开始大量食用。

但是破坏性的、毫无节制的捕捞很快让东山湾的巴非蛤资源枯竭，而且东山和云霄两县为了抢夺资源，甚至发生械斗，闹出了人命。谈话间，何伟湃和汤忠民两人回忆起当年的事情，汤忠民当年曾参与了这一冲突的报道。他回忆说：“我是云霄人，当我到了谈判现场，最初东山的人不停地和我套近乎，后来云霄有认识我的人，开始和我称兄道弟，东山的人就摆摆手走了，说我肯定会帮云霄人，哈哈。”后来，两县经过协商，创新性地想出了招标承包制的办法。这一办法后来也在2001年的《国家海域使用法》中颁布实行，被广泛推广。海域被区分承包后，巴非蛤的人工繁育也取得了成功，而当地人也意识到了不能涸泽而渔，所以当地的巴非蛤养殖越来越红火。汤忠民说：“过去来这里，都是破破烂烂的小渔村，现在你看，几乎家家都住上了漂亮的小洋楼，这都是巴非蛤的功劳啊！”

工厂化养殖：成就世界鳗鱼工厂

除了利用海洋之外，福建省很多地方县市还有众多的工厂化的水产养殖，例如鳗鱼的工厂化养殖和加工，已经成为福建农业的支柱产业，一直处于中国农产品单项出口创汇的第一位。福建烤鳗产品已经占到了全世界产量的50%，全国产量的70%。可以说，福建的鳗鱼养殖与加工使之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鳗鱼工厂”。

目前，鳗鱼产品全球年消费量约20万吨，其中，日本年消费量达12万—16万吨，是世界最大的鳗鱼消费国。长乐市海洋与渔业局的工程师池宝兴说：“上世纪90年代，福建鳗业生产规模超过了日本、台湾，成为了世界最大



的鳗鱼养殖出口基地。”从此，福建鳗鱼养殖的兴旺和日本的鳗鱼消费产生了直接联系。

池宝兴还有一个身份——长乐市鳗业协会秘书长，这几年来，他一直为与日本鳗鱼之间的贸易矛盾伤透脑筋。“日本经常通过各式各样的手段来制造贸易障碍，目的就是降低中国鳗鱼的进口数量和价格，让福建的鳗鱼养殖户们一直处于被动状态。1996和1997年，中国鳗鱼出口受阻引发了恐慌性抛售，鳗鱼价格从一吨19万元跌到2万多元，一大批鳗农破产、负债，甚至有人无奈自杀。”1998年，“福建鳗业协会”应运而生。池宝兴一直希望国内的鳗鱼行业能够学习日本的行业协会，通过内部沟通和协调，形成一股力量与日本进行强有力而且有效的商战，从而谋得利益最大化。

在池宝兴的陪同下，我们参观了长乐市漳港镇的大康养鳗厂。刚进到厂子里，就看到几个工作人员像在搞化学实验一样，在一堆只有实验室里才能见到的瓶瓶罐罐前忙碌着。询问之下，才知道他们正在进行水质化验，以监测鳗鱼养殖池内的水质，而监测水质，更重要的是为了监测鳗鱼的生存环境和自身的品质。

目前，鳗鱼的加工是中国所有水产养殖

品种中发展最完善的。在长乐聚泉公司，我们亲眼目睹了活生生的鳗鱼是如何在流水线上成为芳香扑鼻的烤鳗的全过程。聚泉公司是目前全国烤鳗出口值最大的企业。烤鳗的加工过程相当复杂，但是在聚泉公司，这种复杂已经因一道道明确的分工而变得简单而迅速，经过两个小时，一条活生生的鳗鱼就在这条流水线上，变成了质量可靠的高档烤鳗。

可以说，鳗鱼养殖在福建算是一种特例——非本地原生物种、非本国主要消费水产——是一种纯引进、养殖加工后再出口的工厂化外贸商品，而福建由于所占的超大比重，也成为世界鳗鱼市场动荡的晴雨表。

沿着福建海岸线行走了 2000 多公里后，采访结束了。这 2000 多公里的路途中，那大海上浮的用塑料泡沫和制作拖鞋剩下的边

角料做成的养殖漂浮物一直在眼前浮现。汤忠民说：“其实，这些应该都用专门养殖用的漂浮球，不过渔民们为了省钱，都用这个。”养殖造成的海水污染正在加剧，每年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都要开展专门的“海漂垃圾”整治活动。如何在海水养殖急速扩张的同时，保障养殖环境不至于急速恶化，生产质量优良的水产品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曾从盛教授在讲到与其他水产大省相比，福建水产养殖的优势时说过：“福建境内的河流绝大多数都是发源于本省，又从本省入海，所以水质是自己可控的，水质控制好了，水产养殖的用水安全也就有保障了，污染问题自然就解决了。”水质控制如此，海水养殖中出现的所有问题都是这样，关键并不在于能不能做，而在于我们究竟愿不愿意做。■

责任编辑/周晓红 刘乾坤 图片编辑/吴敬 版式设计/介彬

● 夏天的傍晚，一艘满载而归的渔船停在霞浦北兜村，渔民们将捕捞到的各种海产带回家。





苏格兰， 威士忌的故乡（二）

撰文 / 徐春昕

在西方，广义地说，“威士忌”是所有以谷物为原料的蒸馏酒的通称。通常来说，只要是使用谷物酿造，在蒸馏过程中保留谷物的原味，并在蒸馏后在橡木桶中陈放一段时间再装瓶出售的酒都叫做威士忌。威士忌的产地也早已遍及世界上很多国家。

不过，苏格兰威士忌一向被看作是威士忌的嫡派正宗，原因有两个，一是威士忌的起源虽然已不可考，但是较能确定的是，威士忌在苏格兰地区的生产已经超过了五百年的历史，因此一般人们视苏格兰地区是所有威士忌的发源地。第二是受到 1988 年的苏格兰威士忌法案的限制，法案中，苏格兰威士忌的定义极其严格：规定只有在苏格兰境内，由谷物、水和酵母酿造，且只能装在容量不

超过 700 公升的橡木桶中至少存放 3 年进行醇化的威士忌才能称为苏格兰威士忌。该法案还规定苏格兰威士忌装瓶后酒精度不得低于 40 度，每一种酒所标示的酒龄是指酒在橡木桶中醇化的最低年数。这让苏格兰威士忌始终不离乡土，从而味道也纯正非常。

苏格兰威士忌色泽棕黄带红，清澈透明，气味焦香，带有一定的烟熏味，具有口感甘冽、醇厚、劲足、圆润、绵柔的特点。它的工艺特征是使用苏格兰当地的泥煤为燃料烘干麦芽，再粉碎、蒸煮、糖化，发酵后经壶式蒸馏器蒸馏，产生 70℃ 左右的无色威士忌，再装入内部烤焦的橡木桶内，贮藏上 5 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最后经调配成酒精含量在 40 度左右的成品出厂。

有关苏格兰威士忌最早的文字记录是在1494年。当时的苏格兰修道士约翰·柯尔(John Cor)购买了8筛麦芽,生产出了35箱威士忌。不过那时候的威士忌主要是用来作为一种抵御严寒的药水,并不是常见的饮料。

随着威士忌逐渐为人们接受,1644年,官方开始对威士忌征税,高额税收导致了非法蒸馏和走私,也为苏格兰低地的酒厂带来了没顶之灾。他们的地址明显,很难躲避税收官员的检查。为了降低成本,只能在生产中偷工减料,逐渐被市场淘汰。而与此相反的是,高原酒厂易于藏匿,它们可以更好地发展酿造技术。因此现在在苏格兰地区,高地有将近100家酒厂,而低地只有4家。

1823年,乔治五世到访苏格兰,更改了税收法律,使得合法生产威士忌也可以获得利润;同时在1834年,一种能够大幅提高产量的COFFEY蒸馏器被发明,威士忌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苏格兰威士忌终于到达了它的繁荣时代。

十九世纪初的苏格兰,不仅在高税收时代勉强保留下来的老酒厂迅速地焕发了新的活力,纷纷到政府领取生产许可证,从此登上了大雅之堂,以规范化的经营创造出了著名的品牌,可以说今天盛行于世的威士忌品牌,例如格兰威特、百龄坛、白马威士忌等等都是这个时期诞生的。

要品尝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我们就不得不提到百龄坛。百龄坛拥有目前世界上年份品类最为齐全的调和型苏格兰威士忌,而且它本身的历史非常具有代表性。

1827年,出生农家的乔治·百龄坛先生在苏格兰名城爱丁堡开了一家杂货店,开始为杂货店的高贵主顾提供其精选的威士忌。为了进一步吸引顾客,乔治·百龄坛试着将清新淡雅的谷物威士忌和醇香浓郁的单一麦芽威士忌相调和。凭着对完美的不懈追求,乔治·百龄坛最终调出了新品威士忌,其风

味之独特,远胜于原有的种类。

1869年,乔治·百龄坛在两个儿子的帮助下,已将业务扩张至格拉斯哥,并开始以“乔治·百龄坛父子”为品牌向全球市场出口调和型威士忌,迅速成为口感顺滑的高品质调和型威士忌的代名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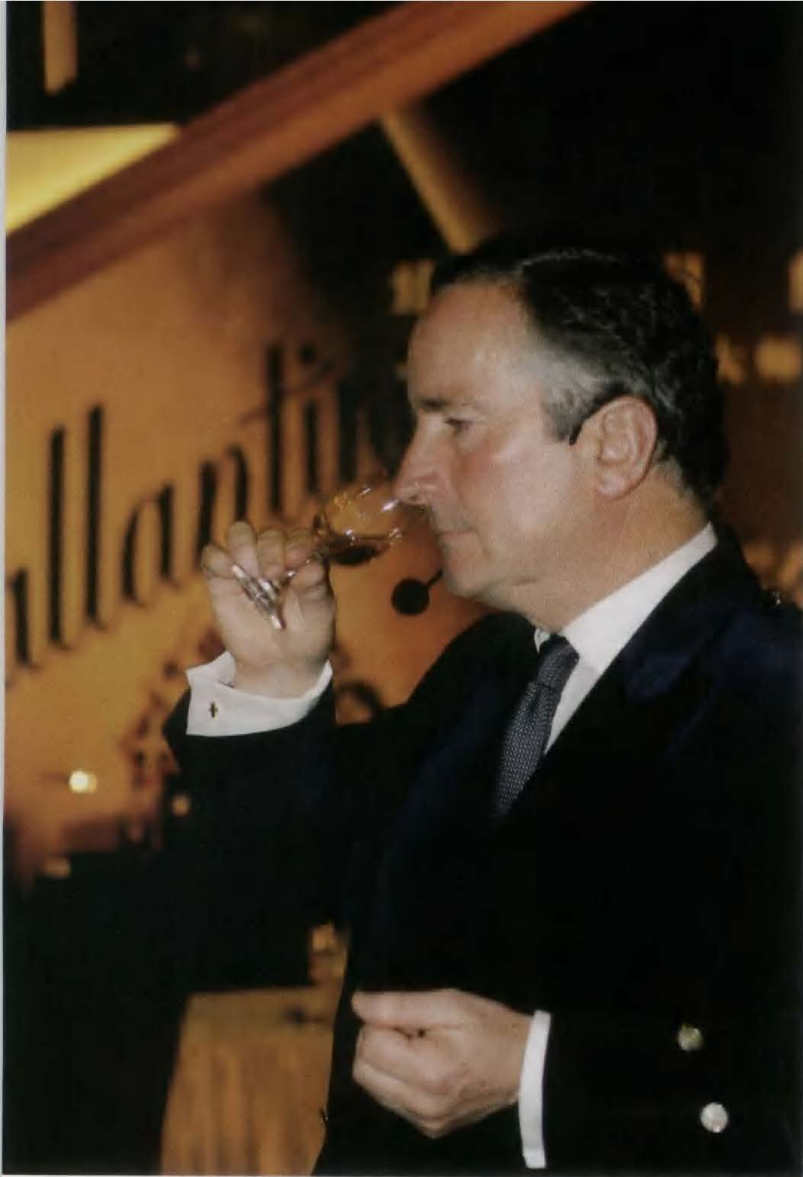
1895年,维多利亚女王钦点百龄坛为皇家御用酒——这是一家公司显赫名望的终极认可。

不过,同是苏格兰威士忌,因为原料和制造方式的不同也可以分为三种:麦芽威士忌(Malt Whisky)、谷物威士忌(Grain Whisky)和调和威士忌(Blended Whisky)。麦芽威士忌是由单一麦芽酿造的,口感浓郁,得到很多人的青睐;而谷物威士忌则采用多种谷物作为酿酒的原料,如燕麦、

左◎远足者在Ben Vane小径上眺望苏格兰高地的风光。一望无际的苏格兰高地野性十足,倔强的苏格兰人厮守着这片土地,珍爱着他们的烈酒——威士忌。摄影/Richard Elliott

下◎酒窖是酿酒业的一道重要风景。一百多年来,百龄坛威士忌严格遵循创始人乔治·百龄坛先生酿造最高品质威士忌的理念,主要使用手工制作的波旁(Bourbon)橡木桶对威士忌进行储存。





黑麦、大麦、小麦、玉米等，口味清新淡雅。主要用于调配其他威士忌酒和金酒，市场上很少零售。而调和威士忌是用一种或多种谷物威士忌为基底，并且混合一种到多种麦芽威士忌后调制而成的威士忌。调和是一门艺术。通过将不同地区、不同酒龄、不同橡木桶内的麦芽威士忌和谷物威士忌按照不同比例调配在一起，从而赋予威士忌新的口味和特性。不同比例调和的微妙变化，令苏格兰威士忌格外精彩、迷人。在苏格兰，每一家威士忌公司都有其首席调酒师。他的工作就是将创新、艺术和技巧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他必须能够运用灵敏的嗅觉和味觉，结合自己的经验和“百科全书式”的记忆，日复一日地评估和区分各种不同的威士忌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影响。

百龄坛威士忌中含有来自苏格兰四大著名威士忌产区的 40 多种单一麦芽威士忌，由

百龄坛首席调酒师将它们进行调配，从而制成口感圆润、浓郁醇香的调和威士忌。

至于百龄坛威士忌究竟如何调配，至今是酿制业的高级机密。自从 180 多年前，百龄坛先生首次调配成功后，在漫长的岁月中，此秘密仅传授于百龄坛的每一代首席调酒师，从而能精准地延续着百龄坛的口味，保持着世界上最受欢迎的苏格兰调配威士忌之一的地位。

除了调配，百龄坛威士忌还有两项非常自豪的特征：一是使用的橡木桶，百龄坛严格遵循乔治·百龄坛先生酿造最高品质威士忌的理念，主要使用手工制作的波旁（Bourbon）橡木桶，对威士忌进行陈酿的酒桶已窖藏过其他酒种 30 年以上，因此陈年过程中对酒的味道产生着特有的影响。二是百龄坛独特造型的蒸馏器，这种特殊的蒸馏器对酒体的丰富口感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百龄坛的产品分为：特醇、12 年、15 年、17 年、21 年、30 年等多个品种。不过，



1938 年，百龄坛获得英国皇室授予的无比荣尊的圣徽，认可乔治·百龄坛父子是“苏格兰贵族阶级的新成员”。圣徽，从此成为百龄坛最独特最醒目的标志。至今仍出现在每瓶百龄坛苏格兰威士忌酒瓶上的该圣徽，包括苏格兰的旗帜以及制作威士忌的四大要素——大麦、水、蒸馏罐以及橡木桶。圣徽的两边各有一匹马，上面印有苏格兰的民族旗帜——蓝色背景的银色圣安德鲁十字。圣徽下面是拉丁文箴言：全人类的朋友。这一箴言恰如其分地彰显了百龄坛苏格兰威士忌的国际地位与和谐的品鉴之道。

不管是哪款产品，只要你看到百龄坛的酒瓶，就会发现它们都带有一个特别的纹章，这个纹章是1938年由英国皇室授予百龄坛的，用于表彰其至高品质与精湛工艺，代表着无比尊荣。纹章由苏格兰旗帜图案和制作威士忌的4种必需原料（大麦、水、蒸馏器以及橡木桶）的图案组成，寓意每种原料都以其特有的方式赋予了百龄坛系列威士忌花香、甘甜和醇香的口味。纹章上还有百龄坛的座右铭“Amicus Humani Generis”，意为“全人类的朋友”。

在威士忌漫长的发展道路上，品酒人判断和欣赏威士忌的能力也鼓励着酒业的发展。众多的知音、优质的顾客也是酒业成长的动力。一个地道的威士忌爱好者饮酒是很有步骤和讲究的，基本上分为看色泽：一般来说，存放时间越长，威士忌的色泽就越深。例如百龄坛特醇色泽微黄泛金，而百龄坛17年是金琥珀色，百龄坛30年则是暗金黄色了。接下来还要看挂杯、闻香味，最后才是品尝酒。

然而对一般的消费者而言，并不需要如此的大费周折，在苏格兰当地居民饮用苏格

兰威士忌时，通常是纯饮，或是加水，或是加冰块三种饮用方式，当然这并无一定的标准饮用方式而强加于每位品酒人。苏格兰人认为最适合自己口感的方式就是最好的饮用方式，因此，如果下次有机会品尝苏格兰威士忌时，一定要先找出最适合自己口感的饮用方式，那就是最标准的方式了。

左◎ 百龄坛品牌传承总监——比尔·布吉斯 (Bill Bergius) 在2006年1月被任命为执杯者协会 (the Keepers of the Quaich) 主席，该协会是苏格兰威士忌酒业中享有盛誉并为国际所公认的行业协会。比尔·布吉斯在整个苏格兰威士忌行业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

下◎ 图为酿酒用的铜蒸馏器。蒸馏酒是乙醇浓度高于原发酵产物的各种酒精饮料。世界上最早的蒸馏酒是由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古代居民凯尔特人在公元前发明的。当时的凯尔特人使用陶制蒸馏器酿造出酒精含量较高的烈性饮料，这就是威士忌酒的起源。除了威士忌，白兰地、朗姆酒和中国的白酒都属于蒸馏酒，大多是度数较高的烈性酒。



福建港口

曾经的中国海上零公里

撰文/聂作平 摄影/朱庆福 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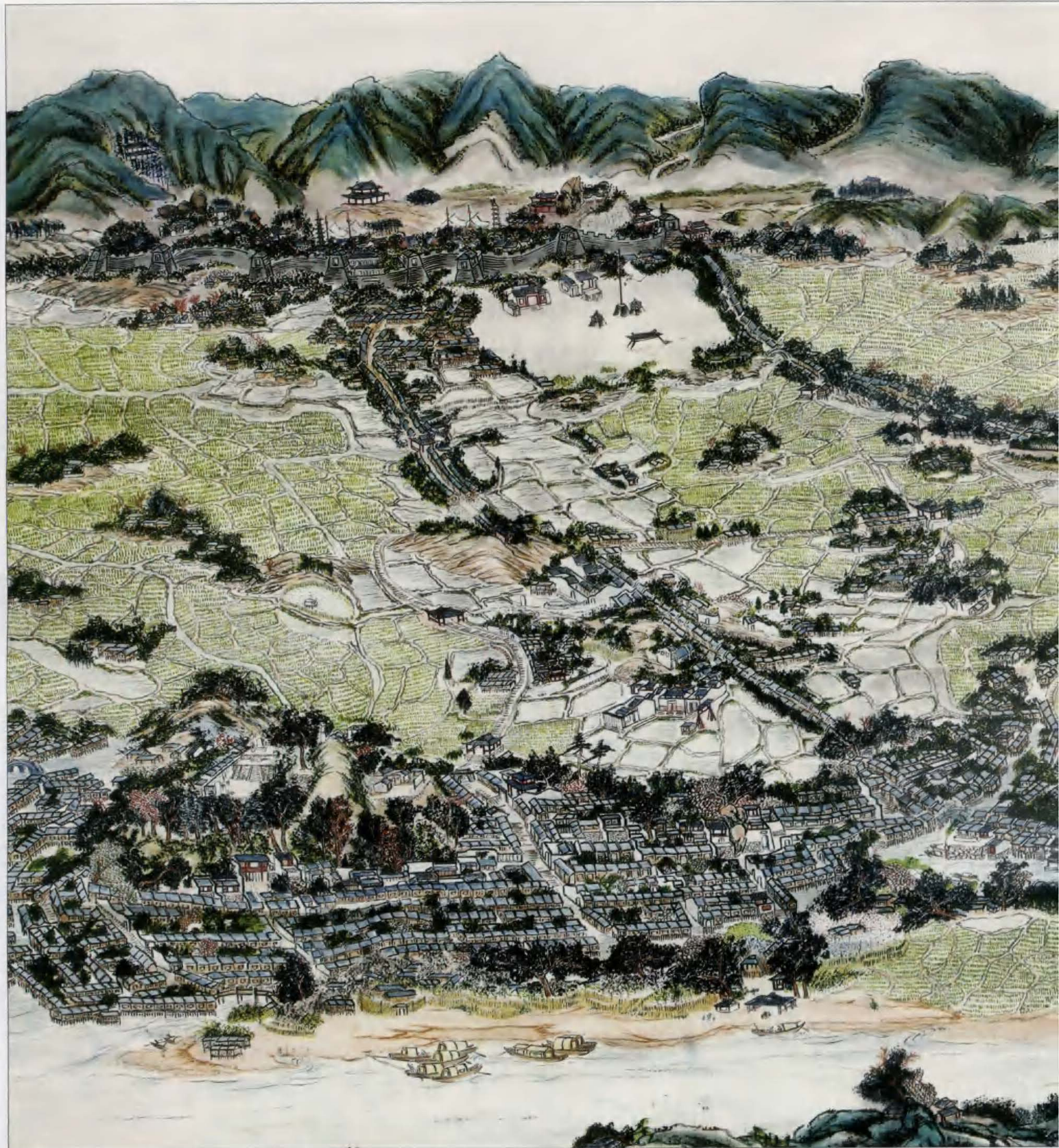


由于濒临太平洋的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福建以它 3700 多公里长的曲折海岸线,从遥远的古代,一步步成为中国的海上走廊。福、泉、漳、厦四大港口,如同一篇锦绣文章的起承转合,它们接力赛般地在上千年的时光里,此起彼伏地成为中国的海上门户,极盛时期,曾是中国海上的零公里处。梳理四大港的兴旺、衰落与蜕变,庶几也相当于重温了一回中国海洋文明史。



● 从远处眺望厦门港,这座目前在港口综合实力排名中位居福建第一、全国第七、全球第二十二的天然良港一派繁荣。历史上,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厦门港曾是大陆与台湾对渡的唯一港口。

1998年，加拿大汉学家鲁克恩在荷兰复制了这幅似地图而非地图、似山水画又非山水画的古画，带到福州。经福州的文博专家曾意丹考证，确认这是一幅清代康熙年间的福州城台景观图，最后由福州画家郑子端，历时半年，根据自己一些新的考证成果，重新绘制了《福州城台景观图》。那些消失了的景观让跨越了3个世纪后的福州人浮想联翩。
绘图 / 郑子端



如果我们知道，当时欧洲的著名城市如阿姆斯特丹，以及欧洲排名第二的大港巴塞罗那的人口，也远未达到 60 万时，就会清楚，19 世纪中叶的福州如何因地当要道而兴盛如斯。



福州：海上枢纽的千年往事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3 月的闽越大地，花朵鲜亮，细雨阴柔，总让人想起海子的诗。

我是为了寻访福建四大港而来的，足迹走遍了福州、泉州、漳州和厦门。行走之中仿佛可以听到那久远的刀光剑影，桨响橹声。

在历史上，有福州、泉州、漳州、厦门四大港口，而在每个大港下面，无一例外地都有众多的相邻外港：甘棠、马尾、江阴、后渚、法石、安平、月港、石码……这些听上去平淡无奇的名字，都曾赫赫有名的商埠，是中国率先走向全球化的前头堡。

在四大港中，福州港的建港历史最为悠久。早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 年）设置闽中郡，治东冶，县治就在福州。《后汉书》载，东汉初叶，东冶就与中南半岛开辟了定期航线。三国时，福州属于擅长造船和航海的东吴，吴国就曾设造船场所于今天福州城内开元寺东直巷内。可以想见，当时造好的船可以从福州城内直通大海。因为有通海之便，所以福州又成为吴国的海军基地。此时，最著名的事件莫过于卫温到达台湾。在泉州港兴起之前，福州港一直是福建省重要的港口。当时福州港除了与中南半岛和马来半岛诸国的传统航线外，还开辟了包括新罗、日本、三佛齐、印度、大食等国在内的新航线。五代，王审知据闽，致力发展海上交通。他从扩大福建对外交通的航道入手，下令凿通福州港之北的黄崎海道中梗舟巨石，那就是著名的甘棠港。甘棠港今天的具体地址在哪里，目前学界尚无定论，但大多数的说法是甘棠港在现在福州城以北闽东三沙湾内。

史载，这个空谷足音般的港口，它“人烟繁盛，舟船辏集”，为政府提供了大笔商税收入。它不仅是沿海贸易商业港，也是五代北

在泉州港兴起之前，福州港一直是福建省重要的港口。当时福州港除了与中南半岛和马来半岛诸国的传统航线外，还开辟了包括新罗、日本、三佛齐、印度、大食等国在内的新航线。



● 长乐太平港在明清时代曾是帆樯如云的大港，下檐桥也曾是郑和船队必经之地，如今那座岁月悠久的石桥只残存了一段栏杆。由于海陆变迁，太平港今天已经淤积成陆，旧时的河道上修建了老宅新居。摄影 / 王宁

宋时的一个重要对外贸易中转港。那时的福州城，因海上交通枢纽的显赫地位而“悉通海舟，朝夕盈缩之波，底泽鳞介，岸泊牒舶”。也就是说，当时，海船乘着潮汐进入福州城，闽江两岸都停满了大小船只，而福州城里，则是“人烟绣错，舟楫云排，两岸酒市歌楼，箫管从柳阴榕叶中出”。

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郑有国先生告诉我，同为海洋省份的广东和福建，它们都有悠久的海外贸易史，一大重要区别是，广东港口是吸纳型的，往往是坐商，坐等海外商船到来，福建则多为行商，在开拓型的致富精神鼓舞下，闽商不惜与风浪作伴，扬帆海外。如元末的林氏家族，重金制成大型商船，远走南洋诸国，后来成了几百人之众的大海商集团。

明朝成化年间，市舶司由泉州移至福州，福州港再次成为福建港口的龙头老大。

我曾经看过 19 世纪 40 年代来华的英国画家笔下的福州港。画面上，一座长桥连接城市和闽江上的岛屿，城市和岛上，都耸立着充当航海标志的高塔。港湾里，帆樯云集，岸边，一些中国人在悠闲观望。事实上，近代欧洲人不远万里来到福州港时，从他们留下的文字看，说是惊艳，毫不夸张：“福州城中有建筑物覆盖的面积大约为宁波的 2 倍，上海的 3 倍，厦门的 5 倍。我所听到的最低估计是，福州的人口有 50 多万，本人倾向于把这个数字增加到 60 万。这个数字应该不会过大，因为只要想一下城墙有二三十里长，城内面积都为建筑物覆盖。”——如果我们知道，当时

◎ 马尾港是福州外港，水陆交通门户。清同治五年（1866 年），在这里创办马尾船政，办学堂、造舰船、建炮台、驻水师。规模宏大，盛极一时。油画描绘的便是 1874 年，船政大臣沈葆楨用马尾船厂制造的船只巡视台湾（下供图 / 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尾船政在清光绪十年（1884 年）的中法马尾海战中毁于一旦，今天的马尾造船厂仍是福建的修造船基地。（右摄影 / 王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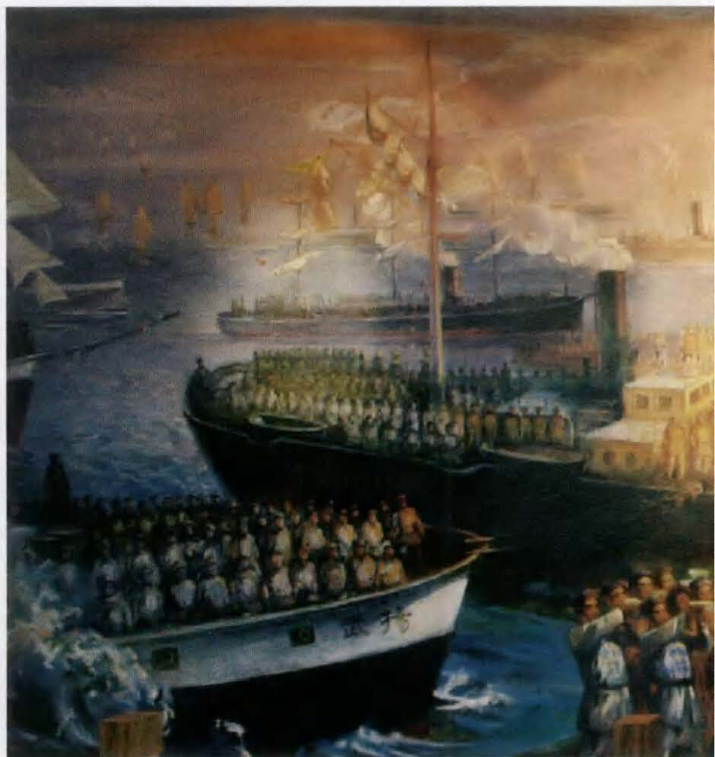


欧洲的著名城市如阿姆斯特丹，以及欧洲排名第二的大港巴塞罗那的人口，也远未达到 60 万时，就会清楚，19 世纪中叶的福州如何因地当要道而兴盛如斯。

最早到福州通商的西方国家是葡萄牙，紧接着是西班牙、英国和美国。1847 年前后的福州，在一个传教士眼里，沿着江岸都是商人住宅和货栈，南台一侧建成了英国及其他国家的公使馆、海关，以及外商的住宅和商馆。1855 年，3 家从事贸易的英国公司和 2 家美国公司共输出茶叶 15739700 磅，此后 3 年，每年平均有 35476900 磅输出。

进入 19 世纪 60 年代，福州茶叶贸易更加蒸蒸日上，“各国船只驶闽运茶者遽呈争先恐后之状，福州由是遂成驰名世界之茶叶集中地”。斯时，茶叶出口占了福州出口总值的一半乃至三分之二以上，自 1866 年以后的 20 年间，从福州港出口的茶叶超过了广州和上海，一举成为全国最大茶叶出口地，每年的出口量竟占全国三分之一以上。这些茶叶几乎都由闽江上游水运而来，在福州港转手后，送上远洋商船，福建茶叶的清香随之弥漫了大半个地球：从英国到美国，从新西兰到意大利，从南非到澳大利亚，从俄罗斯到新加

坡，福建茶叶都是驰名一时的名优产品。由于对外贸易扩大，各国纷纷在福州设立商业机构。1867 年，据闽海关统计，福州已有 15 家英国洋行、3 家美国洋行、2 家德国洋行、1 家布津吉商行、3 家银行、2 家货栈和 1 家印刷局。可以说，在当时，福州乃是远东地区



对福州港来说，比这场失败的战争影响更大之处还在于，随着西方列强进一步渗透，长江航线和北洋航线相继开辟，汉口、九江、天津、营口等沿江沿海城市接连开放，外国商人可以通过长江直入中国腹地。

最为国际化的城市之一。与海外的诸多联系必然使这座城市处于西风东渐的潮头，这里的知识分子也就比内地同行更早睁开眼睛看世界，从林则徐到严复，从沈葆楨到林觉民，莫不如此。

就在福州港以茶叶为龙头走向全面繁盛的19世纪60年代，一个饱含了近代中国人希望与屈辱的机构在马尾港应运而生，那就是声名卓著的福建船政。

今天的马尾是福州市的一个区，但在140年前，这里却是全中国最具国际性和全球意识的地方，在这里，诞生了若干个中国第一：第一家现代造船厂，第一座现代海军学堂，第一艘千吨级舰船，第一只铁甲船，第一架飞机，第一台实用蒸汽机，第一条海底电缆，第一架探照灯……1884年的中法舰队交战，曾经寄托了大清国中兴希望的福建船政变成一片耻辱的瓦砾。

福州港的衰落和中法马尾之战以及新航线的开辟密不可分。前者是谁都能看得出的表象，后者则需要深入分析才能洞悉的内因。

对福州港来说，比这场失败的战争影响更大之处还在于，随着西方列强进一步渗透，长江航线和北洋航线相继开辟，汉口、九江、天津、营口等沿江沿海城市接连开放，外国商人可以通过长江直入中国腹地，也可从天津和营口进入华北、东北。于是，福州作为中国重要贸易口岸的地位动摇了。1921年，福州人口仅为32万，也就是说，经过大半个世纪，这座城市的人口竟然减少了一半。至于贸易额，福州曾高居各个开放口岸之首，但这时已不到比它后开埠的天津的1/10。

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黄昏时分的九日山一派静穆，雀鸟归巢，游人星散，站在山顶的微风中，我能看到晋江



北宋时与泉州有贸易关系的国家有 30 多个，南宋增至 50 多个，元代则增至 90 多个。众多外国人来到泉州，既有传教的，也有游历的，当然更多是经商的。那时的泉州是一座五方混处、华夷杂呈的国际大都市。



宋元泉州港位置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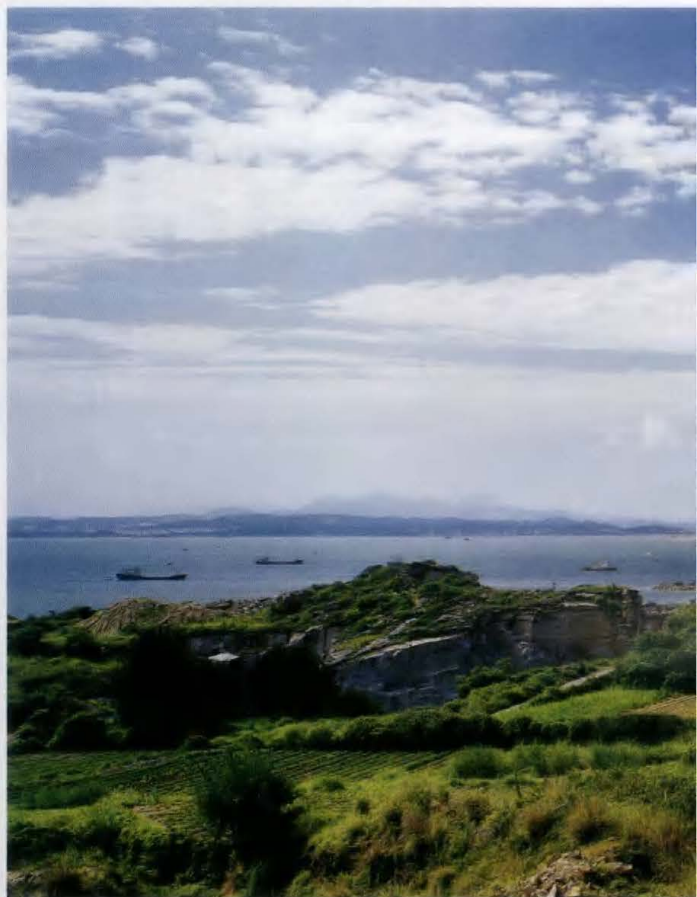
河上若有若无的轻雾。我知道，如果时光倒退，我所看到的轻雾中，将会出现为数众多的高大帆影。九日山多岩石，“但有岩石处，无一不刻字”，在这些风格迥异的摩崖里，我要寻找的是一种叫祈风石刻的遗物。

那是泉州这座繁荣了几百年的海上巨港的遗物。所谓祈风石刻，乃是两宋时期，每年商船出海前夕，太守和主管贸易与港口的市舶使就会来到九日山，为那些被称作番舶的远洋商船祈祷一路顺风。每次祈风，都要勒石纪念。一路浏览，我从其中一方石刻上读到了这样的文字：“车马之迹盈其庭，水陆之物充其俎。”这段文字描绘的是几百年前的祈风盛况，也是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又一佐证。

泉州港的兴起源于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中断：当北方因战乱而经济凋蔽时，南方却保持了相对稳定。南亚和中亚的商人们，为了高额利润，不畏艰险地从海上穿越了马六甲海峡后抵达中国。因此，当陆上丝绸之路式微时，一条以泉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渐渐形成。

历史上的泉州港，由 3 湾 12 港组成，这些星罗棋布于晋江和洛阳江入海口的港口中，最重要的当数后渚港、法石港、安平港

和蚶江港。宋元时代的法石港今天已不复存在——由于河床淤积，过去千帆竞发的港口已抬升为陆地，昔日泊舟的江面，如今是一条通向后渚港的街道。作为泉州港的主港，后渚港背山面海，港道深阔，不仅利于避风，也利于停泊和起航。安平港位于泉州南围头湾内，港内有白沙、石井两澳夹持，港内海面开阔，加上陆路交通发达，安平人自古就有出海经商的传统。得地利之便与风气之先，安平商人向来和徽商、晋商齐名，但和徽商、晋商不同的是，他们的经商之路是外向型的，这里的商人天生是叛逆者，不是活动在封建的经济体系中，而是通过包括安平在内的港口面向海外的，正如《安海志》所说的那样：“商则襟带江湖，足迹遍天下，南





◎ 宋元时期的建筑珍品六胜塔，屹立于泉州湾入海处——蚶江石湖金钗山上，见证了当时海外交通繁荣的历史。它是泉州港海路的第一座灯塔，也是海船进出泉州湾的重要航标（下）。上图是在泉州举办的纪念“海上丝绸之路”的节目中迎接各国使臣的场景。摄影 / 陈世哲



伊本·白图泰把泉州港和亚历山大港相提并论，认为二者是并驾齐驱的国际大港。亚历山大港由于得地中海之便而在一千年的时间里稳坐世界第一大港交椅。当泉州港在东方兴起时，亚历山大港已然走向没落。



国明珠，越裳翡翠，无所不有；文身之地，雕题之国，无所不到。”

元明之交的兵乱使后渚港逐步衰落，安平由于离泉州城较远，所受影响相对较小，加之海岸曲折，有利于走私，从而慢慢演变为私商大本营，代表人物就是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在与明政府和外来的荷兰商人及日本商人的博弈中，拥有强大海上力量的郑芝龙与荷兰达成协议：郑的船队把生丝及中国特产运到台湾，再由荷兰人以相当价格收购后转贩日本。郑芝龙受招安后，安平成了半官方半私商的福建第一大港。顺治初年，郑芝龙已有部众3万，帆船千只，垄断了以安平为中心的漳、泉海上贸易。其中，一年从安平至台湾的商船就达33船次，由台湾返安平的17船次。从安平运往台湾的是生丝、白砂糖、

瓷器及各种纺织品，从台湾运回的是胡椒、鹿肉及日本白银。财源滚滚的安平港给郑成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多年以后，当他打下台湾，还特意把荷兰人修筑的热兰遮堡改名为安平。

蚶江港位于泉州湾南岸。1784年，清政府开放蚶江港与台湾鹿港对渡，8年后，又开放蚶江港与淡水河口的八里坌对渡。其时，福建与台湾的对渡共3处，蚶江港是最重要的中心港。在蚶江，集中了众多泉州及台湾的行郊在此做中转贸易。所谓行郊，行是指商行，郊是指各种商行联合的商会。当时，从蚶江港运往台湾的多为陶瓷、药材、茶叶、烟叶及日用品，台湾运回的则是大米、樟木、楠木、蔗糖、水果。在蚶江镇保存下来的那条通往古码头的老街，我看到狭窄的街道全由青

○ 从高处俯瞰泉州城，黄褐色的屋顶错落有致。正中的两座塔位于开元寺内，那是两座修建于宋代的石塔。在几百年时间里，泉州一直是中国最大的港口，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把各自的宗教也带到了这里，开元寺乃是福建香火最旺的佛教寺庙之一。摄影 / 陈英杰



石板铺成，一块挨一块的石板已被几百年来
的行人踩得光滑发亮。起伏的房屋间，偶尔
会有一两座用牡蛎壳筑墙的老房子。据说，
这些牡蛎墙已经有几百年历史，它们经受了
从郑芝龙时代到今天的风吹雨打，却依然像
个精力充沛的老人那样神采奕奕。

唐朝开始，在不到 3 个世纪的时间里，泉
州港经历了 4 次飞跃：北宋时，赶上并超过
宁波，仅次于广州；南宋初，赶上广州，与
之难分伯仲；南宋末，超过广州，成为全国最大
港口；元代，成为世界最大港口之一。

宋元及明初出版的地理著作和史书，如
赵汝适的《诸蕃志》，汪大渊的《岛夷志略》，
周致中的《异域志》以及官修的《元史》，凡
记载我国与海外诸国的航线距离、方位和日
程，几乎都以泉州港为基准。也就是说，在那

个时代，泉州是中国的原点和海上零公里。
据统计，北宋时与泉州有贸易关系的国家有
30 多个，南宋增至 50 多个，元代则增至 90
多个。众多操着不同语言的外国人来到泉州，
既有传教的，也有游历的，当然更多是经商
的。那时候，泉州是一座五方混处、华夷杂呈
的国际大都市。

在当时的旅行家眼里，泉州无疑是一座
伟大的城市。马可·波罗曾奉蒙古大汗之命
护送公主远嫁波斯，他的远涉重洋之旅，就
是从泉州开始的。对这座东方巨港，多年以后，
他回忆说：“刺桐城的沿海有一个港口，船舶
往来如织，装载着各种商品，驶往蛮子省的
各地出售。这里的胡椒出口量非常大，但其
中运往亚历山大港以供应西方各地所需的数
量却微乎其微，恐怕还不到百分之一。刺桐

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

马可·波罗所谓的刺桐城，乃是泉州的古称。刺桐是一种原产马来西亚的热带植物，五代时，刘从效扩建泉州城，下令遍植刺桐，从此，泉州城便开满了红色的刺桐花，泉州被称为刺桐，泉州港被称为刺桐港。事实上，多年来，除了来自大食、渤泥、三佛齐、门者婆、真腊、占城等地的龙涎香、丁香、沉香、降真香和胡椒在这里大量进口外，波斯的菠菜、日本的蕪菜、暹罗的茄子、南亚的南瓜、荷兰的荷兰豆和葱，它们无一不由泉州登陆，踪迹渐

遍中国。作为回报，泉州输出的是丝绸、茶叶、蔗糖，以及泉州生产的深为西方王公贵族喜爱的瓷器和刺桐缎——15世纪，当商人们把精美的泉州瓷器运到欧洲时，虽然贵重得与黄金相当，却仍然供不应求。

伊本·白图泰把泉州港和亚历山大港相提并论，认为二者是并驾齐驱的国际大港。亚历山大港在埃及，由于得地中海之便而在一千年的时间里稳坐世界第一大港交椅。当泉州港在东方兴起时，亚历山大港已然走向没落。从某种意义上讲，泉州港正好取代了亚历山大港，成为当时全球的航运中心和世界第一大港。

月港：一个政策型港口的兴衰

其实，我的关于福建四大港的寻访，早在距离大海还有上百公里的华安山区时就开始了。在福建最大的土楼——二宜楼，我惊奇地发现，这座建于清代的土楼，竟然画有半裸的西洋美女，还照猫画虎地描着几行无法拼读的英文，墙壁上，糊着上个世纪初的《纽约时报》。土楼所在的地方是典型的福建山区，在一般人想象中，它往往和阻隔、闭塞之类的词语纠缠不清。但西洋美女和《纽约时报》使我顿悟：这个丘陵起伏的山区，一定有一条和外界交流的秘密通道；后来，当我从华安前往漳州时，我看到了那条秘密通道——水量丰盈、江面宽阔的九龙江和九龙江入海口的月港。

● “南海一号”是考古界对一艘近千年前沉没于广东阳江海面的宋代商船的称呼。在这艘当时最为先进的商船上，打捞出大量精美瓷器。据考证，这艘不幸沉没的商船，正是从泉州装载了货物运往海外。图为打捞沉船的场景。摄影 / 梁文栋



如此说来，月港并不是一个适合建立港口——至少并不是一个适合建立出海大港的地方。考察历史，不难发现，月港是一个政策型的港口，它的崛起和繁荣，纯属阴差阳错。



○ 豆巷是当年从海澄镇通往月港码头的一条百余米长的小街，当年进出月港的货物，统统由这条不起眼的小街上船下船。街上的石板路和两边的民居仍然保留着旧时模样——当地人说，明朝时就是这个样子了。图为生活在豆巷里的孩子们。摄影 / 王宁

九龙江是福建第二大河，这条从闽南山区流出的河，水量大，落差小，自古就是沟通漳州和闽南山区的要道。至于月港，它的港口从海澄镇起，顺流而东，经过海门岛后到达九龙江口的圭屿，并经厦门岛入海。据记载，从月港到厦门，无动力时代的船只需要航行差不多一个晚上。属于内河港的月港，港口不深，出海也不方便。当地人介绍，以前，由于九龙江水浅，大船装满货物后从月港出发时，必须得用几条小舟拖曳，大船才能航行。如此说来，月港并不是一个适合建立港口——至少并不是一个适合建立出海大港的地方。考察历史，不难发现，月港是一个政策型的港口，它的崛起和繁荣，纯属阴差阳错。

元末，泉州因饱受战乱而衰落，但对内对外贸易的需求并不会因泉州港的衰落而终止，这种需求必然会刺激人们在另一个地方建设另一个“泉州港”，于是，距离泉州只有几十公里的月港闪亮登场了。

月港的出现，同时也和明代海禁政策密切相关。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了防止张士诚和方国珍残部与倭寇勾结，危害国家安全——当然，更主要的内在原因，在于小农意识对于开放的海洋的恐惧——从而实行了严厉的海禁。但是，福建沿海不仅有多年的海外贸易传统，而且由于地少人多，农耕不足生计，必须以舟为田，才能生存。这种情况下，即便冒着抓获后充军乃至斩首的风险，



● 随着时代变迁，如今的月港已不再像当年那么举足轻重，相反却有几分落寞。偌大的码头上，除了小商船和小渔船，便只有轮渡了。一个当地小的女孩手捧鲜花，等待即将靠岸的轮渡把她送回对岸的家，她显然不知道站立的地方，曾经有过千帆云集、万商影随的盛况。摄影 / 王宁

海上走私仍不绝如缕。对此，郑有国先生说：“明朝扼杀了一切民间海外贸易活动，把一切海外活动视为洪水猛兽，无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大环境的急剧变化，在所谓片板不许下海的禁令下，民间商人可以选择的就是私人海上贸易行为，以背叛的形式反抗这种制度。”

15 世纪，葡萄牙人打通新航道，并在占据马六甲后，与中国沿海接触。但是，葡萄牙人面对的乃是闭关锁国的海禁；1522 年，当葡萄牙人被驱逐出广州后，他们开始寻找沿海的偏僻小岛为基地。其中，最主要的基地是宁波附近的双屿和厦门南边的浯屿以及漳州的梅岭。在双屿和浯屿，不到一年的时

间，葡人就设立了行政机构，修建了 1000 多间房屋，常住人口达 3000 多，其中葡人就有 1200 人，俨然事实上的国际贸易网点。

如火如荼的走私招来了政府讨伐。朱纨就任浙江巡抚兼管福建海道、提督军务后，派兵围剿了双屿、浯屿和梅岭。在浯屿，一次就逮捕并处死葡商数名，闽商 90 余名。他还采纳俞大猷的建议，用上万根修长的松木钉入航道，封闭了 3 个港口。

朱纨的严厉打击，使从事海上贸易的闽商损失惨重，面临破产，福建的一些官宦世家，此前也大多在闽商中参股，或是充当保护伞而获利，因而，他们的利益也蒙受巨大损失。于是，福建当地官员和福建在京官员，纷

郑有国先生说：“明朝扼杀了一切民间海外贸易活动，无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大环境的急剧变化，在所谓片板不许下海的禁令下，民间商人可以选择的就是私人海上贸易行为，以背叛的形式反抗这种制度。”



从明代开始，漳州月港就是走私猖獗之地。直到今天，这里仍有走私者出没，图为被执法部门在漳州附近海域，查扣的一艘涉嫌走私汽车零部件的货船。摄影 / 郑宪

纷上疏弹劾朱纨，指斥他滥杀无辜。在勾心斗角之中，朱纨被撤职，于狱中自尽。

伴随着双屿、浯屿和梅岭废弃的，是明政府海禁的松弛，这样，四大走私港中硕果仅存的月港一枝独秀。此后，明政府为了管理月港，在月港设立了海澄县——这个县名，寄托了明政府的幻想：海疆澄清。但设县次年，就不得不开放海禁，准许往贩东西二洋。不过，这些出洋的商船，必须从月港出发，并在从月港到厦门的九龙江水道上，接受层层关卡的盘验。

如前所述，月港并不是一个适合的海外贸易港口，或者说，福建有更多的地方，比月港更适合开发为通洋港，但方便朝廷管理才是一锤定音的终极决定，至于商人们是否方

便，港口是否优良，则不在政府考虑之中。

这种半开放政策，给偏僻落后、原本只是芦荻丛中一二聚落的月港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巨变。短时间里，月港就因“居民数万家，方物之珍，家贮户藏，而东连日本，西接暹球，南通佛郎、彭亨诸国，其民无不曳绣摄珠者”，从而被称为小苏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烟草就是通过月港传入中国的。当年，月港的商人们在遥远的吕宋学会了种植烟草，并带回来在月港附近的石码种植。如同烟草一样，随着远航的商船来到中国，并从月港登陆的农作物还有甘薯。万历年间，一个叫陈振龙的福建人在吕宋经商时，把它带回福建。试种后，获得成功。很快，这种舶来物就由福建扩展到大江南北。

月港的繁荣持续了上百年，明末清初，郑成功、郑经父子与清军在闽南沿海对峙，拉锯战几近 40 年，月港惨遭池鱼之祸：清廷为了扼制郑氏，实行迁界政策，海澄沿海 30 里划为弃土，人民被迫迁往内地，繁华的月港从此一蹶不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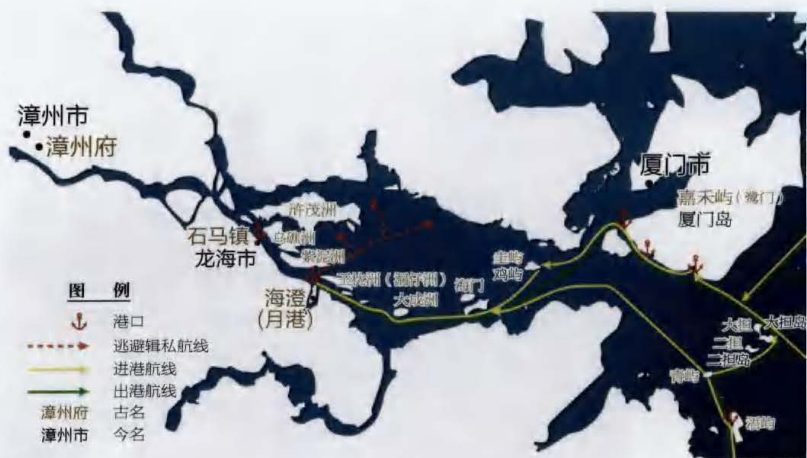
穿过豆巷，便来到月港码头，春汛之际，划出一道圆弧的九龙江大有“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气象。只是，港口已看不到那些远去的商船了，只有几叶小舟泊在无边的风雨里。

历史总是这样无情，当人们赞美郑和下西洋的壮丽时，无论如何不能想象世界大航海时代，我们有这种结局。我们是把海外贸易的大门定格在要沿着弯曲的内河盘旋一宿才能到达的内河港口。在月港，我感受到了历史的无奈。

厦门：通往未来的航程

从漳州到达厦门时，天色已晚，匆匆放下行李，我直奔当地所说的轮渡码头而去。眼前，有一线蔚蓝色的水，风乍起，水波荡漾。在我正对面，是一座修长的岛屿，岛上起伏着热带植物和红色的屋顶，那就是著名的鼓浪屿了。海风越来越劲，刮得脸发痛。路灯下，巨大的厦门港霓虹闪烁。林立的高楼，操着各地语言的游人，漫长的海湾，来来往往的游艇，这一切都说明，厦门是一座美丽的港口城市。次日，当我坐上快艇，绕过鼓浪屿和海沧大桥，来到真正的大海之上时，我也能看出，如此优越的自然条件，注定了厦门是不可多得的天然良港。

厦门原来是孤悬于海上的一個岛屿，上个世纪 50 年代才修建了一条海堤，把厦门岛与大陆连接在一起。四大港中，厦门港的历史最短，但与西方近代文明最近。当月港这个偏远之地也因半开放的海禁政策成为小苏杭时，厦门还不叫厦门，而是一个叫中卫所的类似于边防检查站的地方。它的责任，就是对那些从月港出来准备进入大海的商船做最后一次盘查。此消彼长是永恒的定律，



明代漳州月港位置图

当月港的商船尽数驶离，繁华事散，历史把机遇的接力棒顺手递给了厦门。从此，厦门一步步迎来了它风姿绰约的锦瑟年华。

与月港以及泉州港和福州港相比，厦门港的优势一目了然：它位于九龙江真正的出海口，江海相连，水深达 20 米，港口有鼓浪屿等一系列小岛作屏障，因此这里不仅航道不会淤积，而且避风条件良好。此外，由于九龙江的存在，厦门港所联系的经济腹地十分广阔。至于地理位置，按古人的说法，它“据海疆扼要，北连二浙，南按百粤，东望澎湖、台湾，外通九夷八蛮”。如此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宿命式地前定了厦门是不可多得的海上巨港，通往未来的航程，注定要从这样的港口启程。

四大港中，厦门港是名副其实的小弟弟。当其他三个兄长都已各擅繁华几百甚至上千年，厦门港才迈出第一步：如前所说，最初，它是作为月港的外港和关卡而存在的。清初，郑成功还没攻克台湾时，曾以厦门为基地，改名思明洲，厦门港于是跃升为与日本、吕宋、暹罗、交趾等国通商的重要对外贸易港。

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清政府开放海禁，在厦门设立闽海关，厦门从此成为我国对外交通贸易的四大港之一。同时，在 1684 至 1784 年共 100 年的时间里，厦门是与台湾对渡的唯一港口，两岸贸易必须通过厦门来实现，这种难得的机遇，使厦门独领风骚。



● 鸦片战争后，厦门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正式开放。至 20 世纪初，各国来厦门贸易频繁。图为当年厦门港的和平码头，虽然处在动荡时期，但仍然繁忙兴盛，出口的货物通往世界各地。供图 / 白桦

厦门与台湾虽然只有一水之隔，但两地的物产和生活生产需求品却有很大的互补，当时，厦门来往于台湾的商船有 1000 多艘，每日穿梭于台湾海峡。当时的记载是：“开洋市镇如厦门、广州等处，所积货物不下数百万。”到 18 世纪末，厦门港有洋行 8 家，

大小商行 30 余家，洋船和商船上千只。五口通商开埠之际，厦门已有人口 20 万，和当时的上海不相上下。航运的发展也促进了造船业的发展，“土、木、金、铜、铁诸工率自外来，船工大盛，安其业者，多移居焉”，厦门港“大小帆樯之集，远近贸易之都会也”，“据十闽之要会，通九译之番邦”。历史记载表明，在厦门 200 多年的兴盛期间，商船从台湾运来的是大米、食糖、食油和花生；从上海和宁波运来的是棉布、粉丝、皮毛和毡帽；从福州运来的是圆材和柑橘；从广州运来的是布料、羽纱、鞋和精工制品；从更远的南洋各地运来的则是海参、巴西杂木和一种用来制作桅杆与锚的硬木。厦门出口的是茶叶、砖、伞、陶器、铁质厨房用具，以及精美的神像。厦门港的地理优势和郑氏家族与日本、台湾及东南亚各国的渊源，都加速了厦门港的贸易量很快就跃居福建首位，在全国范围内，则略低于广州，排名第二。在远东地区，厦门港的经

清代厦门港位置图



“双重检测” 助推中国白酒向国际标准突破性迈进

——“水井坊酒率先执行国内、国际‘双重检测’专家论坛”隆重召开



论坛上，相关部门领导与行业权威专家齐聚一堂共襄盛举

2009年3月20日，一场以助推中国白酒质量检测技术向国际标准突破性迈进，缔造国际一流白酒品牌为议题的“水井坊酒率先执行国内、国际‘双重检测’专家论坛”在成都正式召开。与会领导、行业权威专家分别来自国家质检总局、国家工商总局、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中国酿酒工业协会、中国副食品流通协会、中糖集团、全国糖酒会办、省质监局、省食品工业协会、市质监局等政府部门和行业权威机构，此外还有来自苏格兰TCE（欧洲技术中心）的权威专家。

双重检测 提升中国白酒的国际地位

论坛上，领导、专家们分别从国内、国际质量检测技术、酿酒工艺、行业发展等方向探讨了水井坊酒率先执行国内、国际“双重检测”的细节和标准，明确肯定了水井坊严格执行国家标准和国际蒸馏酒标准“双重检测”对于确保产品品质的卓越如一，促进国际间的行业交流，推动产品出口，提升中国传统行业的国际地位等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记者从论坛上获知，水井坊每批次产品不仅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地理标志产品GB/T18624）的严格检测，而且从2006年11月起，水井坊产品按国际市场准入标准和食品安全的要求，在合作伙伴帝亚吉欧洋酒集团的协助下，送往苏格兰TCE（欧洲技术中心）严格检测，使中国白酒在质量安全和检测技术方面向国际标准突破性迈进。

加快进程 打入国际烈性酒主流渠道

“水井坊一直有个愿望，将水井坊品牌打造成为国际一流的白酒品牌，让中国白酒真正进入国际烈性酒主流消费渠道。这也是水井坊继承与弘扬中国传统白酒文化精髓的责任所在。”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建勇先生在会上表示，为了加快水井坊酒市场的国际化进程，全兴集团于2006年末，与全球最大烈性酒业公司、世界著名500强企业之一的帝亚吉欧集团开始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值此，水井坊酒拉开了向国际标准化迈进的序幕。

食品安全 彰显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感

论坛上，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质量认证培训中心主任沈烽先生表示，水井坊酒率先执行国内、国际

“双重检测”，这不仅是对国家质检工作的支持，也是水井坊对消费者负责的态度，充分体现了企业对社会的责任担当。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白酒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勇先生强调食品质量安全就是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水井坊严格执行国家相关质量检测标准，无论是产品品质还是质量管理水平等各方面都处于业内领先地位。同时，来自苏格兰的技术专家可恩先生也在会上介绍了水井坊酒执行国际检测的标准和程序。

传承历史 民族工业活文物不断创新

水井坊酒率先执行国内、国际“双重检测”，在保护传统酿制工艺与现代科技标准之间，水井坊寻求到新的制高点。中国著名白酒专家、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白酒专业委员会高级顾问沈怡方先生对此高度赞扬道：“我作为一名毕生从事中国白酒研究的专业工作者，对水井坊在传承中不断创新，把我国传统民族工业中的宝贵文化遗产发扬光大的做法深表赞赏和推崇。”据中国著名白酒专家、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赖登辉先生介绍，水井坊酒的高贵品质，源于企业对卓越生产技术永无止境的追求和对质量近乎苛刻的严格要求。

加速交流 中国造品牌迈向国际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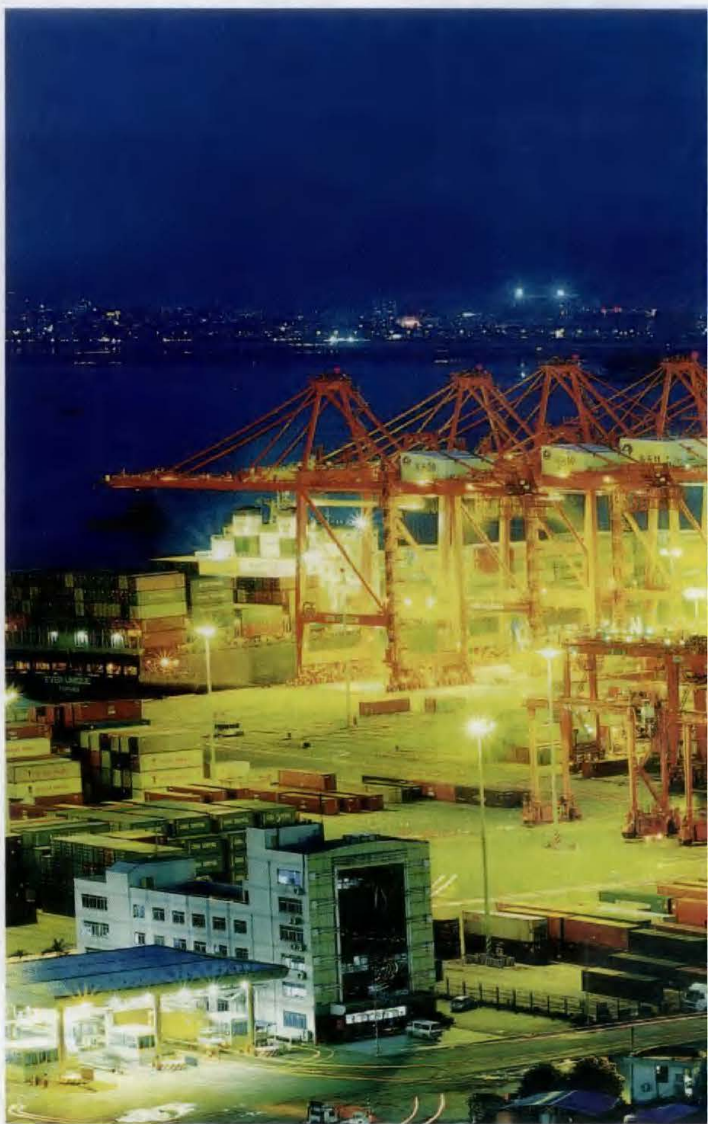
中国副食品流通协会会长、全国糖酒会办公室主任何继红女士代表历届糖酒会主办方发言，对水井坊在多次糖酒会上的出色表现表示高度赞扬。此次“双重检测”专家论坛的举办为参展糖酒会的其他企业提供了一个参考学习的机会，希望各企业借助糖酒会广阔的平台，加速行业内交流，使中国造品牌以高品质、高附加值的形象走向国际市场。

水井坊的高标准、严要求，确保了水井坊酒品质的卓越，同时也体现了水井坊企业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真正进入国际烈性酒主流消费的国际一流白酒品牌的决心与信心。各级领导及专家纷纷为水井坊率先执行“双重检测”的企业举措表示充分肯定，领导和专家们相信本次论坛一定会为中国白酒向国际标准突破性迈进带来深远影响。

济辐射能力远居于同时期的东京港、大阪港和马尼拉港之上，是名副其实的远东地区航运中心。成书于康熙年间的《海道针经》和《指南正法》，在记载中国沿海与海外各港口的航路时，已经不再像宋元时那样以泉州为圆点，而是以厦门或厦门港内的望山为起始。这个细节说明，厦门港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它继泉州港之后，成为又一个中国海上零公里。

1841年，当伯纳德乘坐“复仇女神号”来到厦门时，他对厦门的印象是：“海湾内及厦门城的景色十分美丽，当地多山，几条大河流入海湾，与内地交往便利。港口之优良超过了英国官兵的想象……其居民勤奋聪明，他们以移民和殖民倾向以及喜欢做生意而闻名，他们是台湾岛的主要移民，该岛与厦门隔海相望，沿岸绵延近200英里，同时他们大量移民到更远的海岛，甚至外国，例如爪哇、新加坡、马尼拉。”另一个叫阿隆的英国画家则惊叹：“从鼓浪屿高处看，简直不能想象还有比这个港口更宜人、更美丽和更生动的景色了。深深的海峡，云集的船只，就在我们的脚下，狭窄的岬角，形成了一个重要的郊区，除了一个大岛鼓浪屿阻截风浪，并在两侧各留下一条进入幽静海湾的通道外，还有几个岩石小岛点缀着从海上通往河流的水路。”

但是，和福州几乎如出一辙，在200多年的兴盛后，厦门也有过一段上百年的没落。其原因，也和海上航线的变迁有关。只不过，与福州相比，厦门的没落要缓一些，慢一些。1881年，厦门对外贸易总值仍有5063762海关两，但当初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甚至还要落后一些上海，早在12年前就已达到了48856574海关两。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茶叶出口地位的逐步丧失，厦门更加衰落。此时，厦门的进口货物几乎全是为了满足本地需求，对外贸易功能基本丧失，沦为



了一个典型的消费城市。1936年，厦门人口25万，与80年前相比，几乎没有增长。

厦门港迎来又一次黄金时代，是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厦门港是大陆与台湾之间最近的大港，两岸交流的活跃，为厦门港提供了华丽转身的大舞台。2006年1月，原分属厦门、漳州、招商局漳州开发区管辖的厦门湾内的8个港区实现合并，整合成新的厦门港。在2006年和2007年中国港口综合实力排名中，厦门港都雄踞前十强；在国际港口综合实力排名中，则由2004年的26位上升到22位。

凡到过厦门的人，无不被这座海滨城市的美丽所倾倒，而乘坐游船的游人都会看到一个叫做厦门国际邮轮中心的码头。它既是厦门港的一部分，也是厦门港的华彩段落：



停靠在这里的是美轮美奂的国际邮轮。作为中国内地最早接待国际邮轮的港口，厦门是第一个拥有定期国际邮轮航班的城市。世界邮轮经济从20世纪80年代兴起后，以每年8%的平均速度快速增长，统计数据表明，它能以1比40以上的高比例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共同发展。自上个世纪末期以降，厦门港接待国际邮轮游客量连续几年居中国大陆首位。为此，厦门建设了一个能接待目前世界最大邮轮的码头：厦金客运码头；并提出了打造世界邮轮母港的目标。

快艇渐渐驶向大海深处，从厦门湾外回望厦门港，一侧，是清朝时厦门与台湾对渡的老码头，一些小渔船正在作业；另一侧，是停泊着巨轮的集装箱码头，高大的龙门吊伸出

● 入夜的厦门港灯火辉煌，轻轻吹拂的海风中，这座天然良港的夜晚如同白天一样繁忙。从当年月港出海的盘验关卡到今天的国际知名巨港，厦门港经历了化蛹为蝶般的超越和蜕变。通往未来的航程，注定要从这样的地方开始。

长长的巨臂，下面是堆放得一望无际的集装箱；稍远处的海面上，一艘艘大型商船往来如梭。在厦门港，历史与现实就这么神奇地不期而遇了。在昨天即将消失的地方，未来的身影飘然而至，就像鲜活的生命一样，历史也遵循着新陈代谢的必然规律。□

责任编辑/易水 图片编辑/王彤 版式设计/介彬
审稿专家/福建省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 郑有国

中国帆船的建造与航海技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领先于西方，因而成为中国古代海洋文明成就的有力佐证之一。这其中，福船可谓功不可没，郑和下西洋中的海船大部分是福船。这种主要产自福建的船，到底有何长处，能在帆船年代的远洋中功绩显赫？

福船

领航中国风帆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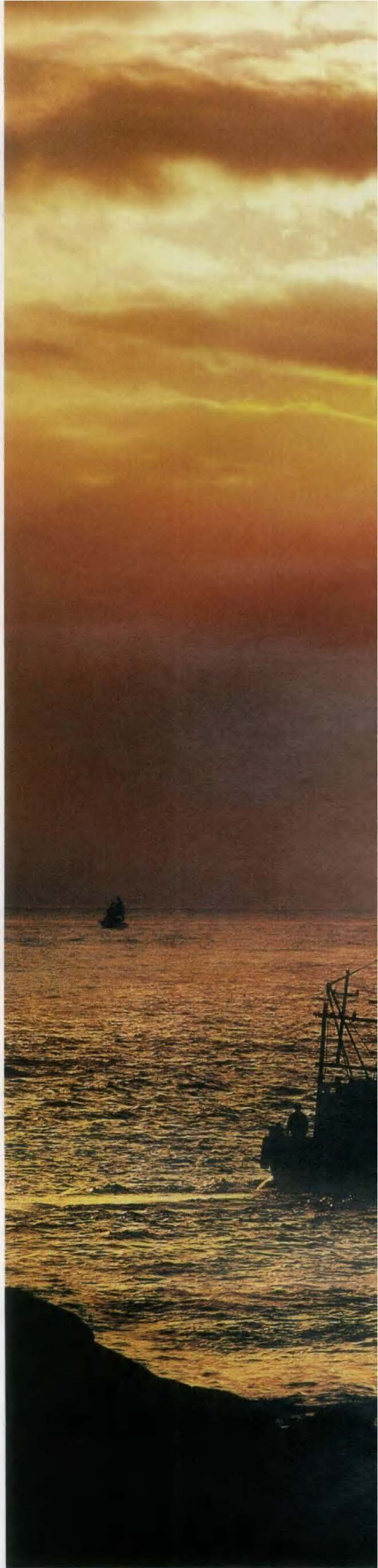
撰文/许路

中国帆船的存在，可以上溯到战国时期，而史籍上对中国帆船的描述，则到东汉才出现。

在欧洲的文献、字典、辞书中，“中国帆船”早已成为一个专门的名词，16世纪初最先来到东方的葡萄牙人称中国帆船为“junco”，其后滋衍而成荷兰文的“jonk”、法文的“jonque”和英文的“junk”，日本将英文“junk”翻译为戎克，日据台湾之后，把来往于台湾、厦门两岸的帆船也称为戎克船。这些词的发音都和闽南方言对船的读音——“chun”极为相似，有学者认为溯根寻源，就是来源于闽南话的“chun”。由此可见，福建帆船在海外影响深远，它是中国帆船的重要组成部分。

福船的前世今生

在我刚读小学的时候，那些来自福建诏安老家的大帆船时常停靠在厦门和平码头和海滨码头。父亲上船为船工看病，泡茶下棋，我则上窜下跳，捡拾货舱里散落的花生和蒜头。黄昏的橘色光线在缆绳上随海风跳跃，世界弥漫在淡淡鱼腥和有节奏的涛声中。这是福船留给我最亲切的记忆，后来它不断出现在梦境。我猜想自己小





○ 福建海岸线曲折，岛屿星罗棋布，又处于寒暖流交错的海区，潮差大、海流急、涌浪多，夏季常有台风登陆，台湾海峡被认为是世界海洋十大恶水之一。由于自然条件构成了复杂的港湾、航道和渔场情况，决定了适合这一海区的船型必须是尖底船型，以最大程度地提高船只的稳定性。图为泉州沿海的渔船，这些现代渔船中，帆的作用主要在于作业时止摇，用于助力的较少。摄影 / 何清和

宋代，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海外贸易也随之步入高峰，福建与广东成为海船建造中心，福州、兴化、泉州、漳州设有官船厂。



上○ 描绘的是 1644 年的大员(今台南市)港，这幅佚名荷兰画家的作品现藏于荷兰西菲士兰博物馆。画面中的右下角出现了迄今我们所找到最早的福建帆船写实彩绘，其余的帆船为荷兰帆船。
供图 / 许路

左○ 1995 年我国发行的古代航海船纪念金币中的册封舟，为清代出使琉球所使用的。明清两代出使琉球的册封舟大部分在福州建造和启航，是典型的福船。资料提供 / 许路

时候看到的帆船，极有可能是中国海岸线上最后一批福船。

福建拥有 3752 公里长的大陆海岸线和 1400 多个沿海岛屿，与台湾隔海相对，生活在闽地的古越人很早就驰骋于广阔的海洋。福建的丘陵地形和环绕省界的山脉并未能阻隔闽人与外省和海外的社会经济交往，海上航路让福建很方便地与外界连接起来，甚至因此走得比其他省份更远。加上福建境内多山，物产丰富，盛产造船所需的木材和桐油、蚘灰、藤、棕、麻、生漆等物料，民间就地取材，随处造船，沿江沿海各地造船业十分繁荣。福船就是对古

代从福建以及浙江南部、广东东部具有相似特征的海洋木帆船的通称。

2004 年 10 月，我有幸登上一艘名为“金华兴”号的传统木帆船，亲历了一次难忘的长距离外海航行。我们从福建漳州东山湾出发，九天八夜，330 海里，到达珠海香洲港。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我在遥想过去这条航道上福船曾经来来往往的热闹样子。

早在三国时期，吴国的航海活动就十分活跃，先后遣使南洋、登陆台湾和联合高丽。公元 269 年，吴国在建安郡所属侯官县(今福州)设置典船校尉，这是有记载的福建官办造船厂

之开始。吴国还在闽江口至浙江瓯江一带的沿海地区，建立了更大规模的造船基地，称温麻船屯，在数十年期间，建造了大量的海船，为福建的航海活动提供了充足的基础。

唐代的福州和泉州是南方的主要造船基地，造船技术有了明显的进步，《旧唐书》记载当时来往于福建与广东沿海之间的商船，最大的载重可达千石，即 50 至 60 吨。唐代中后期，由于中央集权逐渐失去对地方的控制，福建凭借舟楫之利，或从浙江买进粮米，或向登州、莱州运出海外奇货，唐末五代泉州刺史王延彬更借助海外贸易所得以资公用。

宋代，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海外贸易也随之步入高峰，福建与广东成为海船建造中心，福州、兴化（今莆田）、泉州、漳州设有官船厂。宋元祐二年（1087 年）在泉州设置市舶司，从南宋开始，远离战火的泉州逐渐超过明州和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港口。有关福建帆船的记载逐渐多了起来，历任北、南两朝的宋代全国漕运总管吕颐浩（1071—1139 年）下过这样的结论：“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为上，广东船次之，温明州船又次之。”

“金华兴”号在航行中，我们与多艘货轮和渔船相遇，看着对方船员一个个惊讶的神情，令我们感到幸福无比。魏军船长不时操起步话机对着靠得太近的船只喊叫：“前面的 XX 号请注意，这里是中国古帆船金华兴号，请你们让开！”这时，我体会到祖辈们的自豪与骄傲。

到了元代，蒙古大军先后对日本、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发动大规模的海上远征，其间福建领造了大量的战船。1292 年，福建平章政事史弼受令率五千军士从泉州后渚启航，远征爪哇（今印尼爪哇岛一带）。另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元代还曾在泉州组建一支 14 艘 4 桅海船组成的船队，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波斯。元代先后来到福建的外国旅行家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在其各自的游记



到了元代，蒙古大军先后对日本、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发动大规模的海上远征，其间福建领造了大量的战船。1292年，福建平章政事史弼受令率五千军士从泉州后渚启航，远征爪哇。



上○ 中国清代外海赶缯战船再现厦门，这艘名为“太平公主号”的仿古战船，是根据福建外海战船工料单等古籍记载，经国内帆船技术史学者破解，由泉州、漳州等地造船老师傅按照福建传统造船法式历时一年复原建造完成的。中国古代造船史上的几项重大发明，诸如船尾舵、水密隔舱、尖底造型和龙骨结构在赶缯战船上都能很清楚地看到。赶缯战船的彩绘，其图形及颜色主要依据福船宝典中的线描图和明清两代的画作，由民间画师描绘。摄影 / 何经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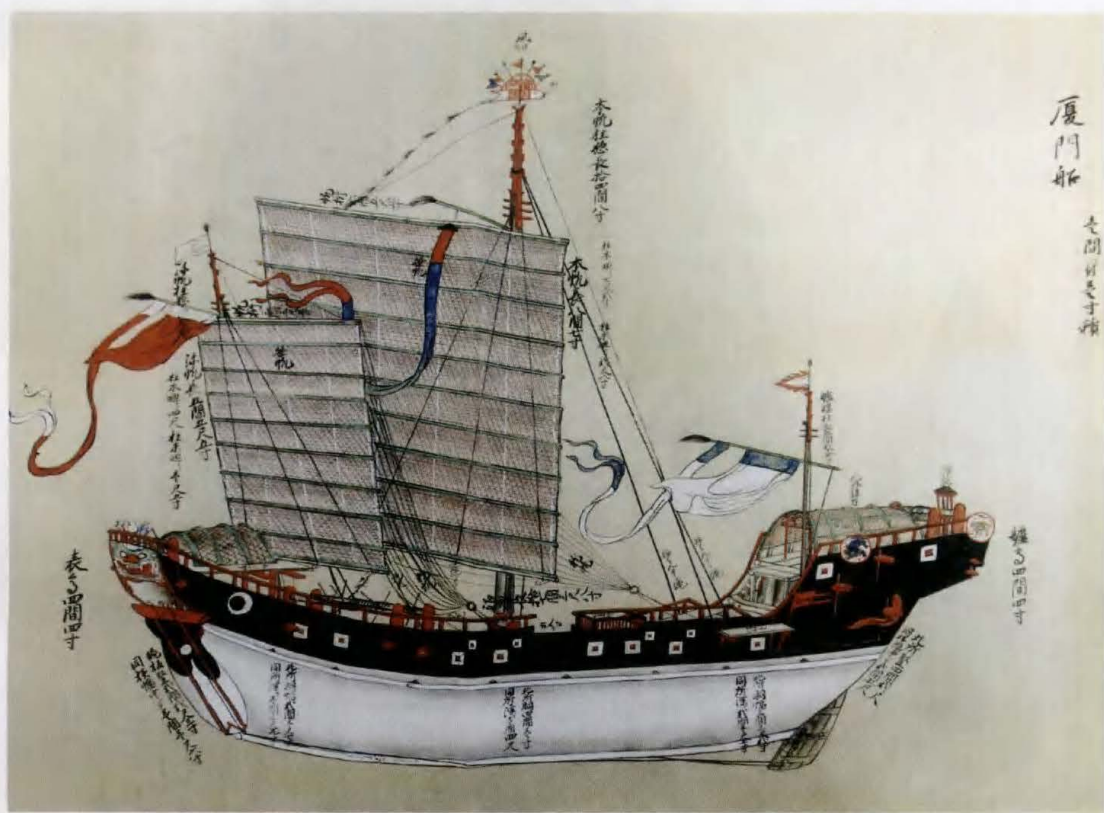
左○ 这艘仿古福建钓槽船目前陈列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从诞生地崇武县航行到泉州后渚港，落户到它博物馆的新家，这次航行，是它的第一次，也是它的最后一次。摄影 / 蒋长云

中对在印度看到的泉州制造的远洋海船皆有记述。这一时期前来中国的印度商船和阿拉伯商船，主要采用椰绳缝合船体，同福建商船相比，这种船体结构所能承载的重量要小许多。

明代福建造船业主要有官营、民营、官召商营三种形式。福州府城东南河口是官营造船厂的主要聚集地，郑和船队出使西洋诸国的部分海船就是由福建建造。福州又是明朝与琉球国（今日本冲绳县一带）交往的唯一口岸，历次出使琉球所用的册封舟，大部分在福州建造

和启航。目前所见最早出现“福船”称谓也是出自明代嘉靖至隆庆年间的《筹海图编》、《洗海近事》、《纪效新书》等一系列专论沿海防务的兵书。俞大猷在东南沿海一带领兵与倭寇及海盗作战期间，写下近一百八十篇，约十万言的书信、揭帖、手本和专论，其中对福船的类别、型号、尺度、应造数量、选用材料、所需银两、配备兵员、委派何人监造等细节皆有涉及。

但是，明代朝廷实行海禁政策，为禁绝民间海外贸易，严厉控制民船的大小，福建帆船



上○ 收藏于日本长崎县平户市松浦史料博物馆的《唐船图》中的厦门船。《唐船图》长 982 厘米，宽 57 厘米，藏青色纸装裱。图中绘有 12 艘船，其中 11 艘为包括台湾船在内的中国船，最后 1 艘为荷兰船。该系列图卷作于何时以及由何人所绘，目前皆不详。根据日本学者的考证，此图绘于 1720 年前后，比较真实地描绘了 18 世纪长崎港的画面。该图并非仅仅将船舶作为景物描绘，而更是一幅船体构造图，标记有主要部件名称、尺寸和比例。

摄影 / 何经泰

右○ 福船构造图。资料提供 / 许路



清初，郑成功与朝廷在福建沿海相持 40 年，双方水师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造船材料的争夺和建造外海战船的竞赛。



○ 惠安崇武的惠安女正在参与一艘福船的打造(上)。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福船的龙骨被系上了红绸。但是，这艘福船已经受到西式帆船的影响，具有肋骨结构，这是传统福船没有的。同安县吕厝村的村民正在举行“送王船”的庆典仪式，寓意送走瘟疫和灾害，这种送船下水的传统庆典活动早在宋代就已出现，至今在福建和台湾流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船在海峡两岸人民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右)。摄影 / 蒋长云



只得告别已经驰骋了5个多世纪的印度洋，仅余下零星走私商船在东南亚和东亚海域艰难营生，导致福建造船业及造船技术处于停滞状态。官方的战船也退回近岸巡防，船型趋向小型化，身长都未超过十丈（33米左右）。当16世纪初葡萄牙远征商船先后在马六甲、广州、闽浙沿海与中国帆船相遇时，其船只性能已经赶上了后者。

清初郑氏政权与朝廷在福建沿海相持40年，双方水师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造船材料的争夺和建造外海战船的竞赛。郑成功以闽北山区的木材资源大肆造船，其间还从日本采购桐油、麻、铁，从暹罗（泰国）进口木料或在暹罗就地造船。而始设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的福建水师仅有兵员3000人，因战船大小及数量皆远不如郑氏水师，在交战中处于劣势，只得重新实行海禁政策，把沿海居民迁离海岸，以阻止郑氏集团获得造船的资源。其后为了平定台湾，清朝水师大肆营造外海战船，并且从投清的郑氏降将不断获得战船，逐渐改变了双方水师的力量格局。清廷平定台湾后，曾在战事中使用的福建赶缯船、双篷船被额定为清朝水师的主力战船，分布沿海各省，其后又陆续在福州、漳州、台湾、泉州、厦门设立军工船厂，制造外海内河大小战船。

“金华兴”号进入南海海域后，一波接一波的横浪开始拍击着右舷，一次又一次，大帆船剧烈地摇摆起来，似乎桅杆都快要贴到水面了。每一次侧摇的极限，我想大伙一定都在担心要是船正不起来该怎么办，只是不敢说出口。19世纪中期，我们曾经为之骄傲的福船也遇到了历史的“狂风暴雨”。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闽、粤、江、浙水师修造的战船不敌外夷船坚炮利，战事失败。遂自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起，闽、粤地方开始仿英、美军舰改造外海战船，福州船政局第一艘木壳轮船“万年清”号于1869年建成试航，所有中式帆船则渐遭淘汰出清朝水师。1889年，我国第一艘钢质、钢甲型巡洋舰“龙威”号在福州船政局建成。在编入北洋海军序列后改名为“平远”，是参加中日甲午战争



中国三大帆船体系

背景知识

撰文 / 席龙飞
绘图 / 许路等

福船

福船是对古代浙江南部、福建及广东东部具有相似特征的海洋木帆船的通称。由于前代留存史料的欠缺，我们现在所说的福船是指宋代以后泛福建海域的商船、渔船、战船和外交使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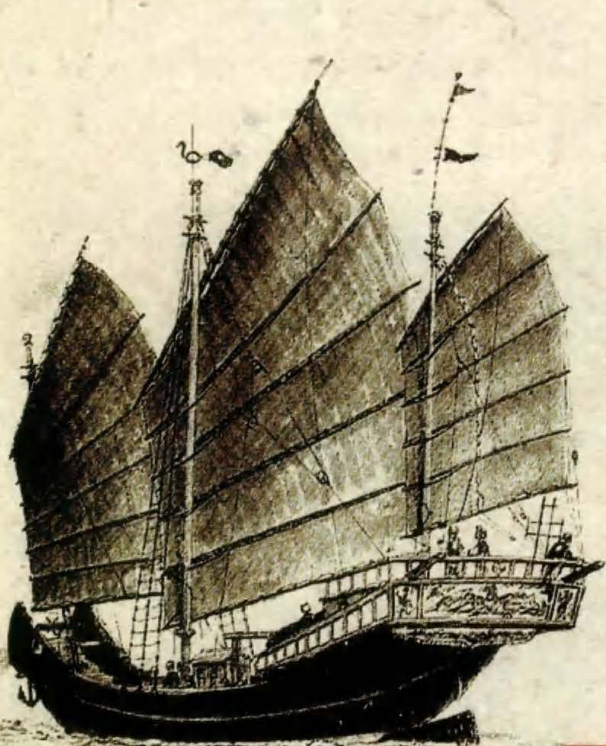
沙船

沙船是适用于江苏、山东沿海和渤海船种，它的特点是根据黄海、渤海的海况，古代先人所创造的一种适应近海海况航行的船种，沙船有文献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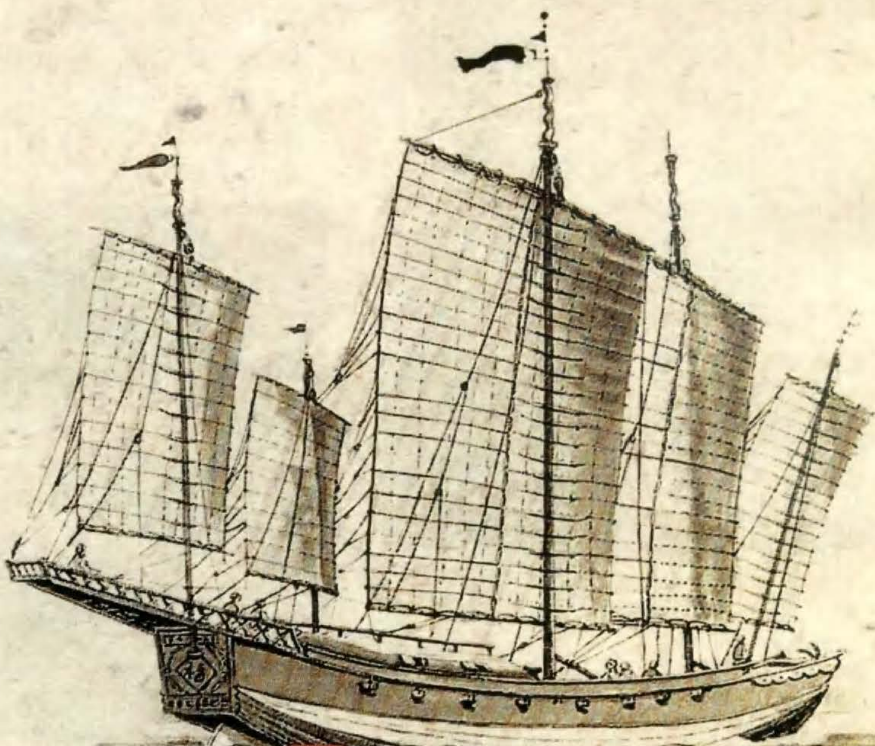
江苏沿海和山东半岛沿海有很多沙丘，当地人管这些沙丘叫“沙龙”，“大沙龙”宽度由几公里到十几公里不等，沙龙与沙龙之间有较深的沙槽分开，沙槽的水深在涨潮时约4-8米托水深，退潮时大部分沙龙的顶部均可露出水面。沙龙顶部涨潮时水深可达3-4米托水左右，平底沙船可以在沙面上航行。沙船是没有底龙骨的小平底船型，宽平艏、宽平艉、低船艏、艉上翘。为防止船底在浅水中航行时撞上石块、沉船和铁锚等等，沙船在船底左右各设方形硬竖的加强筋，高出船底150-200毫米，以保护船底面不受损坏。

广船

史料记载广东造海船始于南越国时期，也即是西汉时期。有学者认为珠海高栏岛上的岩画画有4条船，就应该是广船的起源，起码是春秋时期。广船是广东地区所造海船之总称。南海郡的番禺（今广州），自战国以来即是重要都会，也是造船重镇。南海、合浦以及其南的交趾、日南（今越南境内），是汉代向印度洋航行的口岸。诸地又盛产林木，是重要



广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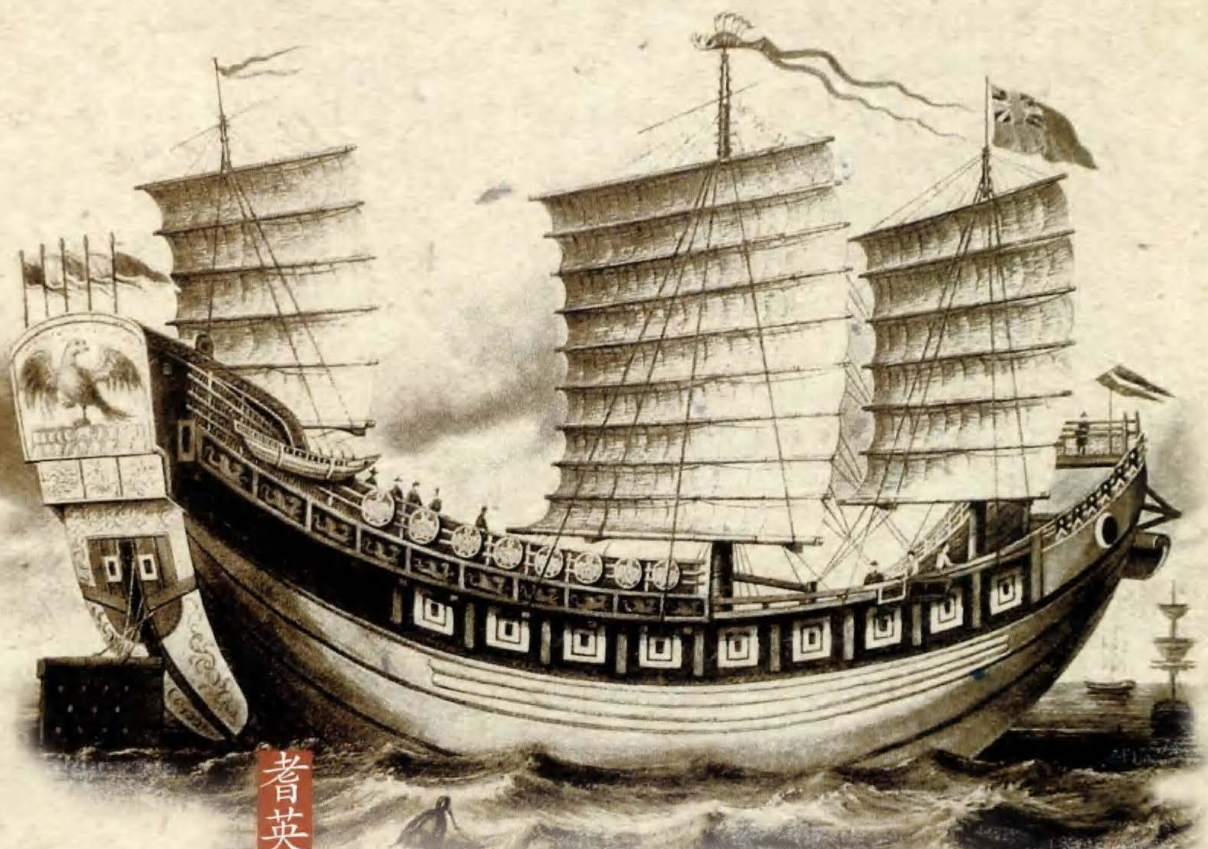


沙船

的造船地点。唐宋时期的广州、高州（今茂名）、琼州（今海口）、惠州、潮州等地的造船业兴盛。广船首尖体长、吃水较深、尾楼高耸、脊弧不高、耐浪性好，适于深水航行。广船的帆形如张开的折扇，与其他船型相比最具特点。为了减缓摇摆，广船在中线面处采用深过龙骨的中央插板，此中央插板也有抗横漂的作用。为了操舵的轻捷，广船的舵叶上开有许多菱形开孔，也称开孔舵。同样是尖底船，广船底与福船底不尽相同，“其制下窄上宽，状若两翼”，因此它是一种典型的尖底船。因其“底腹尖瘠”，故而“底尖不稳，见风即斜”，操驾略有不便。

从三大船型的概述中，我们了解到沙船“惟便于北洋，而不便于南洋”。因为沙船底平，不能破深水的大浪，适合航行在比南海浅的黄海和渤海。江苏和山东沿海多沙丘，沙船如果遇到退潮来不及到沙漕深水区，即使搁浅，也无大事，因为船底是平的，不会产生流沙，不会有什么危险。而福船、广船这样的尖底龙骨船，触沙面积小，搁浅时船身出现倾斜15 - 25度，碰到流沙沙面会很危险，如果流沙将龙骨一侧流成深槽，则会加大船体倾斜度。尖底船碰到这种情况时，船员要下船到沙面上，分立左右舷，把绳索放在龙骨下面，将绳子从艏龙骨开始向艉龙骨方向来回搓揉，不允许流沙在龙骨一侧流成深槽。

同样是尖底船，广船和福船的区别又在哪里？《明史·兵志》对广船的评价是：“广东船，（粤西）铁栗（力）木（是木质最坚硬的一种树）为之，视福船尤巨而坚。”戚继光指出：水战是斗船力不斗人力，广船与福船相撞则福船必碎，因为福船只用松杉而已。另一方面，《武备志》对广船的缺点也有客观评价：“广船若坏须用铁力木修理，难于其继。且其制下窄上宽，状若两翼，在里海则稳，在外海则动摇，此广船之利弊也。”广船虽然在战斗中有突出的优点，只因取材金贵，“难于其继”，也就是说，广船是用铁力木建造的，材料的奇缺限制了它的发展。



耆英号

注：耆英号船型及装饰为福船，但船舵为广船的多孔舵。

自宋代以后，历代重大海事活动或事件几乎都以福船为主体，我们在中国航海史上，到处可以看见福船的身影。

的主力战舰之一。很可惜，“平远”舰在甲午海战中受重创而被俘，因日本对“平远”舰的质量大为赞赏，后来成为日本的主力战舰之一。从此舰尾悬挂着日本海军旗的“平远”舰掉转炮口，对付起自己的祖国，这不能不说是那个时代积贫积弱的中国的一个悲哀。

清代中后期由于西方殖民者东侵和朝廷的限制，航行东洋和南洋的福建帆船为数已经不多。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年间福建漳州、厦门商人兴起到暹罗造船买米，两三个月时间就能造成一艘载重200吨的大船，其后当地华侨乃至暹罗国王都投资建造并拥有相同式样的中国帆船。

在帆船年代的“夕阳晚照”中，福船还创造了一系列辉煌业绩，才逐渐退出航海舞台：

1846年，耆英号（Keying）从香港航行至纽约，再到达伦敦。这艘广州建造47.8米长的三桅帆船虽然采用广东船式的多孔舵，船型及装饰则与福州运木船相同。

1913年，宁波号（Ningpo）帆船从上海远航至加利福尼亚海岸的San Pedro，这是一艘原名“景泰丰”的福州运木船。

1922年，厦门号（Amoy）帆船越过太平洋到达美国加利福尼亚海岸，船型是泉州白底船。

1955年，自由中国号从台湾基隆港出发，经停日本横滨后横渡太平洋，历时不到两个月抵达旧金山。这是一艘1939年福州建造的丹阳船。

可以说，自宋代以后，历代重大海事活动或事件几乎都以福船为主体，我们在中国航海史上，到处可以看见福船的身影。

福建帆船在退出海外航线之后，主要航行于台湾海峡和中国沿海南北航线。民国时期木

帆船有所增加，据1938年的统计，福建全省有28个主要船种共5487艘。而到了1989年，全省沿海运输木帆船只剩下233艘。

福船究竟是什么样子？

中国帆船的建造是一部根植于民间的生产技术发展史，留存下来的史料记载相对于其所凝聚的复杂技术和工艺，则显得无比苍白和缺失。

也许我们需要首先回顾中国古代帆船在世界造船史上的创造发明，不难从造船业方面印证“中国曾是地球上科技最发达的地方”这个观点。

重要的船舶推进工具——橹出现在汉代，由桨演变而来的。橹与风帆并用才能远航，远洋航行无风时，需要用橹。橹的发明曾被国外学者誉为“中国发明中最科学的一个”。

中国帆船的另一大发明是舵。文物和文献证明：我国在公元前后就使用了舵。在西方的船史著作里，他们说世界“最早”的舵出现在1242年，其证据就是德国埃尔滨城的一个徽记。两相比较，中国的舵比西方早了一千多年。

还有水密舱壁。西方的船有底板和舷侧板而无甲板，像北欧的维京船，俗称海盗船，直到11世纪还是无甲板的船。中国的船很早就有甲板，例如战国时期的船就有甲板。中国船不仅有底板、舷侧板，还有甲板，构成了封闭的空间。欧洲学者说：中国人发明水密舱壁，是受到竹子节（即竹子的横隔膜）的启发。欧洲没有竹子，所以难以有此发明。水密舱壁的作用有两个：一个是增加了船体的强度，另一个是增加了破舱后的安全性。因为中国船有很多舱壁，即使有几个船舱破洞进水，失去部分浮力，但全船仍不致于沉没。

龙骨结构是造船业中的一项重大发明，对



● 虽然福船风光不再，但福建依旧是今天中国南方重要的船舶生产基地。位于福州市的马尾造船厂，是福建省最大的修造船厂，创建于 1866 年，时称福建船政，是中国近代第一家专业造船厂，为当时远东地区之最。岁月悠悠，百年沧桑，目前，该厂能建造和修理 35000 吨级以下各类船舶。图为马尾造船厂的新船下水。摄影 / 王宁

世界船舶结构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代尖底海船甲板平整，船舷下削如刀，船的横断面为 V 形，尖底船下设置贯通首尾的龙骨，用来支撑船身，使船只更坚固，同时吃水深，抵御风浪能力十分强。

美国科技史学家罗伯特 K·G·坦普尔在《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船尾舵、罗盘、多重桅杆等改进航海和导航的技术，欧洲绝不会有导致地理大发现的航行，哥伦布也不可能远航到美洲，欧洲人也不可能建立那些殖民帝国。”

那么，古代的福建帆船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福建海岸线曲折、面临台湾海峡，处于寒暖流交错的海区，风向、风力都不稳定，夏、秋两季经常有台风登陆。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对船只的造型、性能、结构、用料和建造工艺提出特定的要求，由此形成了底型尖削、平艏

上昂、内凹艧封、船舷外倾、龙骨显著、尾舵深插、甲板梁拱大易排水、加装压舱石等共同特征。譬如，台湾海峡两个浪头的间距一般在 20 米，因此船只水线长要超过 20 米才能骑过两个浪，来往于台湾海峡的帆船长度一般要超过 25 米。否则，因为甲板易被海浪覆盖，船会很难操控。

1974 年 8 月在泉州后渚出土一艘南宋末年海船，残长 24.2 米，残宽 9.15 米，残深 1.98 米，船内有 12 道隔舱板，将船分成 13 舱。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中国古代沉船遗存，经考证为泉州建造往来于东南亚的三桅福建帆船。泉州宋船遗存的尖底造型与龙骨结构、水密隔舱结构、多重船底板、用于操纵尾舵升降的绞车等，代表了当时中国造船技术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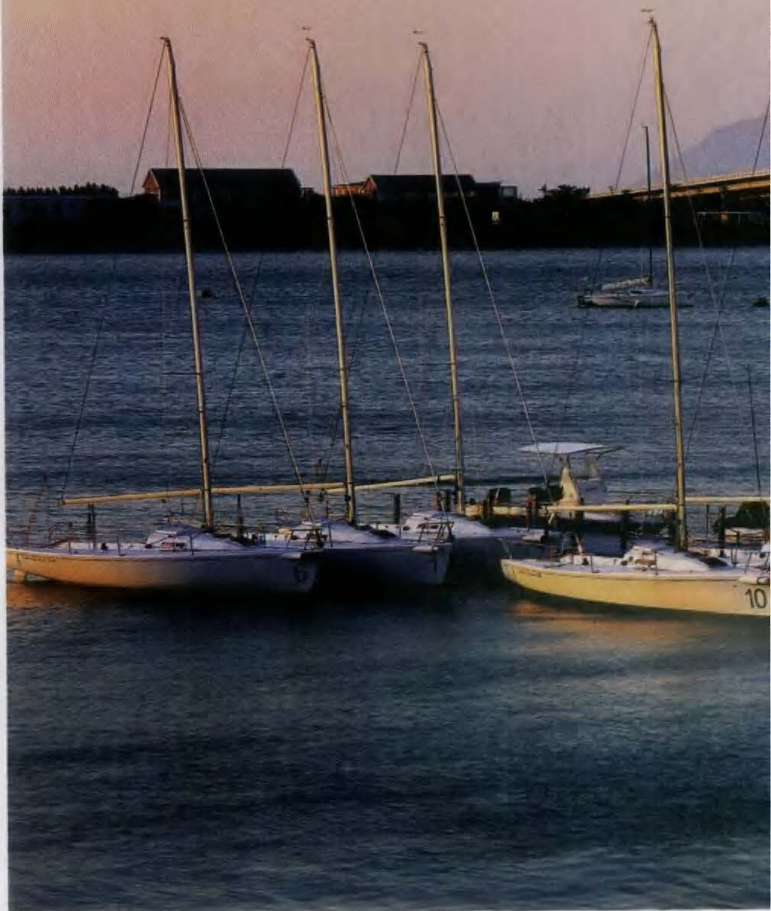
1976 年在韩国木浦新安郡发现一艘沉船，长约 28 米。所载瓷品主要是浙南瓯江流域龙

● 游艇产业是海洋经济的朝阳产业，现在成为了福建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新增长点。去年在北京举行的奢侈品博览会上，展出的游艇大部分都是福建制造的。福建在发展造船业上有着突出的优势，从古代的福船到今天的游艇，希望福建造船业能一直延续着它的辉煌。图为停泊在厦门五缘湾的游艇。摄影 / 朱庆福

泉瓷、景德镇瓷，还有闽江上游一些窑口的瓷器。据初步推断这是一艘元代由福州驶往日本的商船，因受风浪影响而漂到木浦的新安并沉没。其船体型线与泉州宋船颇为相似，用舌形榫头连接外板与舱壁的技术，与泉州船相一致。据武汉理工大学席龙飞教授的研究，新安船是典型的福建船。

席 龙飞教授还发现，这艘元代古船上有减摇设备（用于减轻船舶在行进过程中的摇摆）。新安船的右舷比较完整，在舷侧甲板下设有顶边水舱，在此水舱舷外多处开有上下两个大圆孔。当船向右舷倾斜时，甲板边会入水，水将充满顶边水舱。当船扶正并向左舷倾斜时，这水舱里的水将产生大约 50 吨米的力矩以阻扼倾斜，这正是当今船舶使用的被动式减摇水舱，在古代这是了不起的发明。

除了从出土文物看福船，欧洲人比较善于用图像和造型记载历史，到了明代，西方国家派往中国的使团随行画师、旅行家、雇员留下的作品，让我们有幸看到了同时期福建帆船的映像。1624 年荷兰人占领台湾，在大员（今台南市）设立据点。在一幅刊登于 1635 年最早描绘热兰遮城（今安平古堡）的版画中，城外的海面上有 7 艘大帆船，其中 2 艘是落下箴帆的福建海船。另一幅佚名荷兰画家绘制的 1644 年大员港图，画面中的右下角则出现了迄今我们所找到最早的一幅福建帆船写实彩绘。而一幅绘制于 1662 年前后的普罗文西亚城（今赤崁楼）和热兰遮城图，则



描绘了十几艘大小各异、行驶中或停泊着的福建帆船。

“一澳头师傅造一澳头船”

传说福建造船的鼻祖是古代江西南青乡的江流离，历代传统造船业荟集来自福、泉、漳等地的能工巧匠。学徒入行一般在十一二岁，一般都是以家族式及近亲、表亲相传，至少三年以后才能出师。开始只能做些边角或修补的活计，还不能独立执斧，经过数年的历练，从老师傅身上逐渐学到一些技术要诀，等到能制作安装龙骨、尾金、船舵、桅杆等重要部件，才算成为出色的师傅。

古代造船大多由造船师傅凭借自身的经验和代代相传的营造法式现场放样，没有精确的图纸和量度数据。传统造船业是一项要求严格却又相当辛苦的行当，学徒基本上都是来自无



力读书的贫困家庭子弟,造船师傅大都不识字,经验和法式都只印在脑中,仅靠言传身教。加上历来师傅们对赖以谋生的技术和手艺都不轻易外传,以致民间很少流传下来造船谱牒。

俗话说,“一澳头(闽南话“小港湾”的意思)师傅造一澳头船”,各地造船工匠以世袭经验和营造法式,在生产过程中经过反复的实践,形成了各自的特点,所以每个澳头都有自己特定形制的船型。

但相似的是,福建及浙南、粤东沿海的帆船船艏舷墙外侧安有一对大眼睛,亦称龙目,其大小形状都颇有讲究,有说“龙骨每长一丈配龙目长四寸”。有意思的是,不同的船配不同的眼睛,渔船的眼睛往下看,意在寻找鱼群;商船的眼睛朝前看,意在识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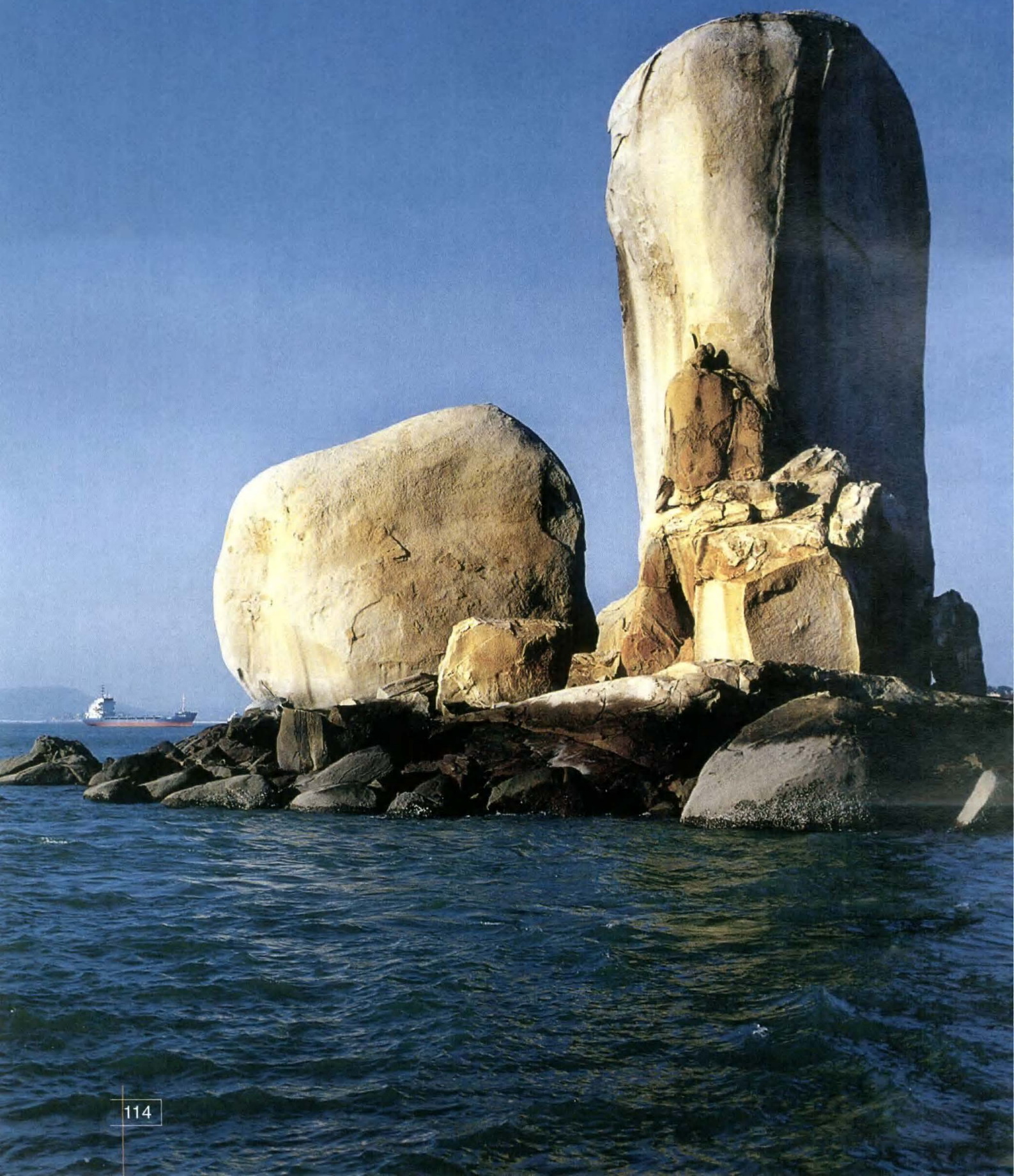
“安龙目”是在船体基本完工时,安装船眼睛的工序。船眼睛一般选用上好的樟木,由

造船工匠精制而成,龙目的钉位要套上红色小布条,用五根特制洁净的铁钉,不偏不倚,一次钉成,意为“龙目光彩”。安龙目要选吉日才能进行,开工前要备三牲燃放鞭炮,敬奉神明,事后还要包红包并宴请师傅。

另外,鳅鱼极(亦即民间所称的木龙、胡溜,原型是一种弹涂鱼)、木鸕(鸕是一种似鹭的水鸟)和妈祖塑像传说为护佑船只的三件宝物,妈祖塑像安放在船尾舱正中央的龛内,也有以纸符代替金身。

随着现代造船业的发展,福建帆船的旅程在上个世纪90年代走到了尽头,现在掌握传统造船技术的师傅也都在50岁以上。今天,虽然风帆船时代已经过去,但我们不能忘记福船作为一个时代的历史见证,以及它所代表的中国古代科技发展水平。■

责任编辑/杨嘉敏 图片编辑/吴敬 版式设计/李晟



福建海岛

山与海的装订线

撰文/朱磊 摄影/胡国钦 等

辽阔的海域与山岭遍布的陆地,让福建仿佛是一部打开的“山海经”。而众多的海岛,则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山与海交融的最前沿。火山与大海的纠缠,海蚀的巧夺天工,造就了美轮美奂的海岛;妈祖在岛上诞生,勇于向大海寻找梦想的福建人,在这里留下了众多海洋文明的烙印;连繁星般散落的无居民岛,也有动人的秘密。这条迷人的“装订线”,到底有多少精彩呢?

● 位于福建海坛岛西北处海面的“半洋石帆”是目前发现的全国最大的花岗岩球状风化海蚀柱。两块巨石分别高达33米和17米,如鼓起的风帆,而托起“船帆”的石岛恰如船身。这艘“不沉之舟”与福建人顽强而勇敢地奔向大海的历史,似乎构成了奇妙的呼应。

福

建是特别的。

在自山向海造访这方土地的旅程中，我时时有这样的感受。

“八山一水一分田”是这座“东南山国”的自我陈词，相比因田地不足而催生了徽商的“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皖南丘陵，福建的山更多了几分崎岖、封闭和高峻，天然形成了面向大海的封闭地形。

当我翻过山的那一页，读到海之篇章的时候，则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自古以来“闽在海中”的说法，和名扬天下的福船、下南洋、杰出的海外贸易历史一起，将海洋与福建如织锦般紧密交织，编织出了格外引人注目的海洋文明。

然而，读完这部“山海经”，我的目光却长久地落在山与海间那条生动的“装订线”上——福建有着大小 1400 多个岛屿，天然造就了众多深水良港、渔场和海上土地。它们像是大大小小的针脚，沿着中国最曲折的海岸线，装订出这部山与海的传奇。

这条“装订线”无疑是富有魅力的，它凭海临风，沿着柔肠百转般的海岸线，和着潮汐一路绵延。在这缠绵中，火山和大海的冲突，造就了神奇而独特的海岛；海浪、海风的神来之手则催生了甲天下的海蚀地貌。而最让人唏嘘的，则是福建海洋文明在明清海禁强烈压抑下的顽强发展，火花四溅般，在海岛上书写了崭新的篇章。“闽人开门是龙，关门是虫”，他们那无所畏惧奔向大海的历史，海岛是最真切的见证者。

海岛，海神妈祖的故乡

万顷碧涛中，小小的湄洲岛怎么看都不起眼。然而，每一个亲身踏上这座小岛的人却都能深深体会到它的“神性”——那高高耸立在山头的妈祖雕像，面带慈悲的微笑，似乎能望得见世上亿万信众的虔诚。她身旁那座壮丽的庙宇，正是世界上数千座妈祖庙的祖庙。

妈祖的出身是异常朴素的，她生前不过是北宋的一名普通女子，唤作林默娘，生于福建湄洲岛。28 岁那年，她在救助船只时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而神奇的是，逝世后，她不仅获得了虔诚的供奉，而且自宋至清代，先后得到了 14 个皇帝的 36 次敕封，从“夫人”、“天妃”到“天后”，成为崇高的海上保护神。著名的郑和下西洋，就是从祭拜妈祖开始的。

自然，这与时代大背景不可分割——宋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海交活动最为鼎盛的时期。福建泉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门户，“四海舶商，诸藩琛贡”，堪称东方第一大港。然而，漫长的海岸线上，为什么独独绵长如一片柳眉的湄洲岛获得了“祖庙”的荣耀呢？

一本厚厚的福建海洋志给我带来些许启发，书中写道，由于台湾海峡的“狭管效应”明显，并处于东亚季风区前沿，海坛岛、湄洲岛、东山岛等地都为全国沿海岛屿风力最强地区之列，最大波高甚至达到 16 米。无





● 漫长的地质年代里，火山数次的喷发，造就了包括牛头山、南碇岛、林进屿在内的福建漳州滨海火山遗迹。玄武岩柱状节理地貌是其中最壮观的景象，数万根整齐划一的多边石柱构成的黑宝石般的岩体镶嵌在海浪中，伴随着潮起潮落。

水和各种风化作用顺着节理透入，不断冲蚀剥蚀。斗转星移，方块状的岩体开始向圆滑的外形转变，形成各式各样的石蛋地形，节理扩大引起的崩落更增加了造型的奇妙。

疑，如此的巨浪和风暴，正是航海者恐惧的梦魇。湄洲岛地处东南海上交通要冲，船只必经之地，也是台风频发区。这汪洋中的小岛勇敢地迎向惊涛骇浪，神奇的是，它身后的湄洲湾却是一个三面环山的深水避风良港。湄洲岛横亘湾口，仿佛一道屏障，又如天然航标。

冥冥中，妈祖的命运便和这个小岛相连了。传说中，这位有着慈悲情怀的渔家姑娘熟知海洋。她一次次地在风暴中驾舟出海，拯救挣扎在厄运边缘的船只，将它们引向风平浪静的港湾，甚至在危急关头将自家屋舍燃成熊熊“灯塔”。纵然“以海为田”、“以舟为车”，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上，生死却悬于一线。于是林默娘终于在惊涛拍岸、千帆过尽的岁月里，化身为海神妈祖。在采访中，一位海岛人的话——“这

里的风浪大得很，要妈祖保佑的”让我对岛上如潮的朝拜人群和袅袅香火，有了更深的理解。

注定，这条山与海的装订线，是不平凡的。

海蚀地貌甲天下

暴躁的大海催生了妈祖的信仰，而强劲的海风及波浪、潮汐和海流也成为海洋地貌的雕刻大师，给福建带来了堪称“绚丽”的海岛。

“洋洋平潭，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载欣载瞩。”这是诗人陶渊明的名句。用在“海蚀地貌甲天下”的平潭，却有着奇妙的妥帖。

平潭县素有“千礁百屿”之称，有大小岛屿 126 座、岩礁 648 座。主岛海坛岛系福建省第一大岛，全国第五大岛。曾赴海坛岛考察的地貌专家杨逸畴告诉我，这里的礁岛主要由燕



左下○ 这朵美丽的“牡丹花”是大海在花岗岩上的杰作。海蚀层层剥蚀岩体，露出新鲜的核心部分。造就了花瓣繁复、含苞待放的巨大“花朵”。

右○ 林进岛上 16 个“莲叶”状的火山喷气口和几千平方米的铆钉状气孔柱群泄露了这片土地曾经灼热的秘密。无论是放射状的脉络，还是突出地表如钉子般的小石柱，都是火山喷发时的灼热气体“争先恐后”喷出地表所形成的。

山晚期的花岗岩所组成。新生代晚期岛屿曾一度沉沦海中，遭受海水侵蚀，直到第四纪中更新世以后才又隆升出海面。风大浪高潮差大，海洋动力作用强烈，造就了这一世界罕见的海蚀地貌博物馆。

这里有中国最大的一对花岗石海蚀柱。两块毗邻的巨石一高一低巍然屹立于汪洋大海之中，风平浪静时如巨船停泊，狂风骇浪时则似破浪前行，这就是海坛岛上的半洋石帆。巨型石人“海坛天神”头枕金色沙滩，脚抵东海碧波。漫步海岛，到处都能发现大海的鬼斧神工：有含苞待放的巨大“石牡丹”，由于岩壁覆盖的植物，它的“国色天香”常是绿盈盈的；海滩上，一头巨大的“海猪”正踏浪上岸；“仙人井”深达 43 米，底部有洞口与大海相通，海流猛烈撞击在崖壁上，浪花飞溅。

人们眼中的奇景，在地理学家眼中则是岩石与大海在漫长岁月中侵蚀与抗衡的结果。杨逸畴告诉我，菱格状节理构造破坏了花岗岩体的坚固性和不透水性。水和各种风化作用顺着节理透入，不断冲蚀剥蚀。斗转星移，方块状的岩体开始向圆滑的外形转变，形成各式各样的石蛋地形，节理扩大引起的崩落更增加了造型的奇妙。半洋石帆便是在强烈的球状风化中，一层层剥落后现出的新鲜核心部分。更神奇的是，不过相距几十海里，海峡对岸的台湾野柳也有大面积壮丽的海蚀造型地貌，蘑菇状的奇石布满了海滨，栩栩如生的“女王头”和“蜡烛台”最为著名。“大自然平等无偏地在海峡两岸



冲荡出一对世界级级别的海蚀奇观，可以说是地学研究上的一个罕见现象。”杨逸畴说。

大海不仅能雕刻石头，还会“造湖”呢，而且是福建省最大的一座淡水湖——海坛岛上的 36 脚湖。约在 5000 年前这里原是海湾，由于地壳抬升，海底泥沙和碎屑物因海浪浸涌和风力搬运在海湾内沉积，由湾口沙嘴逐步发展成拦湾沙坝，坝内成为潟湖。成湖之后，随着地壳隆升，湖面高出海面，丰富的降水成了湖水的主要补给来源，加之地下水渗入，雨季湖水外溢等诸种自然淡化作用，最终使咸水潟湖变成了淡水湖。湖水浸入周围的低山丘陵谷地，仿佛多脚的海星，得名 36 脚湖。清俞廷营诗曰：“波光如画碧如油，日落风清好泛舟。”大海还塑造了别具一格的海岛民居。走进渔村，就好像走进了一个石头的王国——石头路、石屋、石水缸、石花池，连屋顶的瓦上都压着无数石头。一句“比起砖块来，就地取材的石头更能抵抗潮湿而富含盐分的海风，房顶上的石块是防止大风把屋顶卷走”解答了我的疑问。

可以说，这条山与海的装订线上布满了神

奇的岛屿。大嵛山岛上的草场和“海上天湖”往往让人们误以为来到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塞外草原；东门屿则被称为“海上天然影棚”，电视剧《西游记》、《八仙过海》都曾在这里拍摄；火烧屿上布满如烈火烧过的彩色岩石；而大海催生的沙洲让东山岛成为有名的岛连岛，状似翩翩起舞的蝴蝶，有“蝶岛”之称。

火山与大海的纠缠

“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用这句诗来描写漳州滨海火山遗迹中的林进屿和南碇岛，似乎最为恰当。2000年，漳州滨海火山遗迹入选首批“国家地质公园”，与众多早已名闻天下的名山胜地比肩，这里果真是“天生丽质难自弃”吗？

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里，这里曾是一片恐怖地带。距今2644万年至410万年，在漳州滨海地区曾有过多达十几次的火山喷发，最终形成了世界罕见的火山地貌景观。在黑龙江五大连池，大自然奉上了熔岩堰塞湖、药泉湖、冷矿泉等礼物，而在这里，由于火山和大海的叠加，人们可以一览海蚀熔岩平台、鱼鳞石、发状石林、海蚀崖和海蚀柱等众多奇景。研究表明，漳州火山是陆地火山，曾生长过茂盛的森林。直到一万年前的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才将这里的火山和森林一起吞噬，把众多火山遗迹撒在了大海中，而林进屿和南碇岛则是揭开这秘密的钥匙。

远远望去，卧在浩瀚大海中面积不过0.16平方公里的南碇岛并无出色之处，而当船慢慢靠近，也不知是海上的剧烈风浪还是眼前的



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里，这里曾是一片恐怖地带。距今 2644 万年至 410 万年，在漳州滨海地区曾有过多达十几次的火山喷发，最终形成了世界罕见的火山地貌景观。

小岛，竟让我感到一阵阵袭来的眩晕感——它太美了！140 万根具有多边柱状节理的玄武岩柱，如守卫海洋的兵马俑般列队站立在悬崖处。而当我真的行走在这世界上最为巨大、密集的玄武岩石柱群中时，它却又呈现出柔美的一面。这片“熔岩发状石林”非常纯净，没有其他成分的岩石混入。犹如乌黑的瀑布般泻入大海。仿佛是由于千万年的海风吹拂，它们朝东北向扭动着。海浪拍打着岩柱，闪烁着乌金般的光泽。不禁让人畅想，它们是正在碧波中洗濯的火山女神的黛丝吧。

剧烈的火山喷发是如何形成这一根根石柱的？杨逸畴告诉我，这除了与岩浆喷出后冷却的速度、地形等有关外，跟熔岩的特性也有关系，如果所含化学成分均匀程度较高，便能在冷却过程中均匀地沿着中心等距离收缩和开裂，形成近似等边多面体的玄武石柱。岛周围还有数个海水冲蚀的洞穴，据穿行过洞穴的当地人说，深深的洞内也完全是纯粹的柱状玄武岩。这座火山岛，真正是表里如一。

而在林进屿，看到那钉着密密麻麻“铆钉”的岩石和脉络交错的火山喷气口群，总让我想起“海枯石烂”的词句。火山喷气口在喷发停止后，凝固的岩浆由于收缩产生开裂，形成了莲叶般的放射状冷凝固构造。而那些铆钉也是火山的杰作，由于这里岩层含水量较高，当喷出的熔岩覆盖于含水层之上，巨大的热量便引起蒸汽爆发，造就了大片无根喷气口群，并在大海的雕蚀下逐渐变成了铆钉的样子。伸手触摸它们，似乎仍能感受到当年那份冲破一切阻挡的炽热。

海岛，福建人顽强地拥抱大海的地方

海洋文明的浪潮中，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海岛无疑是最易被浸润的，鼓浪屿便是一个典型。这座面积仅 1.91 平方公里的小岛，有“万国建筑博览”之称。著名的华侨建筑八卦楼有着伊斯兰风格的红色圆顶，古希腊风格的石柱和线条，十字形通道的灵感则来自罗马教堂。

● 福建泉州，高大的观音雕像站立海边，迎着涌向海岸的人潮。她身后怪石嶙峋的众多岛礁昭示了海洋的暴躁和多彩，而那片浩瀚深远的蔚蓝色，却自古以来便对这方土地上的人们有着独特而巨大的吸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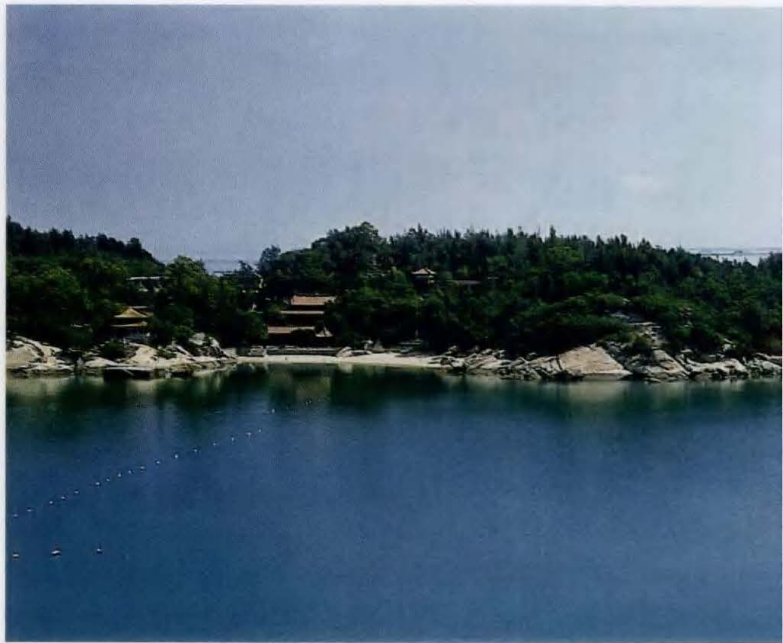
摄影 / 何清和



福建的海岛在漫长的“海禁”中成为了“特别地带”。由于原有的港口都被严查，而海岛地处偏僻，港汊曲折，进可攻，退可守，成为海商新的货物集散地、交易场所、仓储和补给基地。

这里还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幼儿园、最早的海底电缆和最早的保龄球馆等，成为时代的先锋。鼓浪屿的发展或许与租界关系密切，而在我不断深入的探访和研究中，关于福建海岛的一个疑问却日益炽烈起来——它们的发展有着奇特的时间段，开发始于唐、宋，发展与繁荣却在明清，而这也正是漫长而严酷的“海禁”时期。当我向福州大学的苏文菁教授提出这个问题时，她回答得不假思索让我有些吃惊——正是因为海禁，海岛才得到了迅速发展的动力。

历史上，福建人轰轰烈烈的下南洋与海上贸易，让人们对这方土地上的“海洋执著”印象深刻，他们往往以求生存为原动力，坚韧顽



强，不可阻挡。即便是在明清两朝的高压“海禁”下，在民间，海洋文明的惯性仍以各种扭曲而坚韧的形式生长着。私人海上贸易在层层禁锢下非但没有消亡，反而日益发展壮大。

海岛，这条山与海的装订线，在这样的时代里闪烁出了独特的光华。

由于海岛的良田稀少，农业收益微薄，因此自然形成了“其民半逐工商为生”的生存模式。然而，独特的海防战略位置却注定了朝廷的谨慎态度。自明洪武二年(1369年)，规定“片板不许下海”，仅洪武年间就连续发布六次禁海令，步步升级。然而，“闽地斥卤晓确，田不供食，以海为生，以津舶为家者十而九也”。无以为生的人们铤而走险，海禁越严而“通番之念愈炽”，海洋经济以非法的、民间的方式开始崛起，渐渐一些豪门巨室也纷纷加入，海上私人贸易禁而不绝——“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

福建的海岛在这样的时代中成为了“特别

● 海坛岛上茂密绵延的海防林守卫着一方宁静的海湾。它们是海岛生态的守护者，多由相思树等耐旱、抗风、生长迅速的树种组成，让曾经风沙成灾、不堪居住的海岛变成了美丽的家园。摄影 / 黄海



地带”。由于原有的港口都被严查，海商们只好在朝廷势力鞭长莫及的港湾岛屿开辟新的贸易中心，并为了对抗官军的捕杀而武装起来，集海寇、海商为一身。海岛地处偏僻，港汊曲折，进可攻，退可守，成为海商新的货物集散地、交易场所、仓储和补给基地。如铜山的走马溪，在嘉靖十五年（1536年）已经成为沿海商船活动的集散地。即便是在朝廷将岛民内迁时期，这些岛屿却因海上贸易不仅未见萧条，甚至还“乃搭棚赞地，铺板而陈所置之货，甚为清雅”，俨然井井有条的集市。沿海贫民也有不少冒险重回海岛，寻求生存和财富。历数历史上有名的福建海岛走私贸易港，即有走马溪、浯屿、大担、金门、海坛等几十处。史料记载，海上私商的双桅大船曾在这些港口间频繁往来，一片繁忙。

然而，海岛上的海商贸易，是与海寇活动交替发展的，并夹杂着外来侵略者骚扰海疆的事件。朝廷日益不能容忍，终于调集大军进行了围堵和捕杀。然而，经过如此的巨大波折，

也迫使明政府对海洋经济有了新的认识和政策。《明世宗实录》中记载道：“闽人滨海而居，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自通番禁严，而附近海洋鱼贩，一切不通，故民贫而盗愈起。”并作出了重要的政策调整，于隆庆元年（1567年）开放漳州月港，“准贩东西二洋”。一时之间“寇转而为商”，私人海外贸易进入一段全盛时期。及至清初，郑成功占据了福建众多海岛，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以此为基地展开了堪称繁荣的海上贸易。

福船名闻天下，与海禁中凋敝的官营造船业相比，民营造船业不仅在海岛的建造历史更为悠久，生命力也更为顽强。漳州龙溪篙屿等地，“地险民犷，素以航海通番为生。其间豪富之家，往往藏匿无赖，私造巨舟”。私人海上贸易需求所带来的丰厚造船利益，更是刺激了民营造船业的发展。一条船即可“得银三四百两”，而成本不过八九十两银子。所以，“人冒死以往，不能禁也”。清初，福建海岛多为郑氏等反清势力所占据，更是“公然放木下海直到

琅琦(岛)贼所,打造战船……散顿巨木数千株于南屿、董屿诸港”。此外,海岛的渔业发展,也在海禁高压下不断冲破藩篱,向着远洋捕捞发展,海产养殖也随之发展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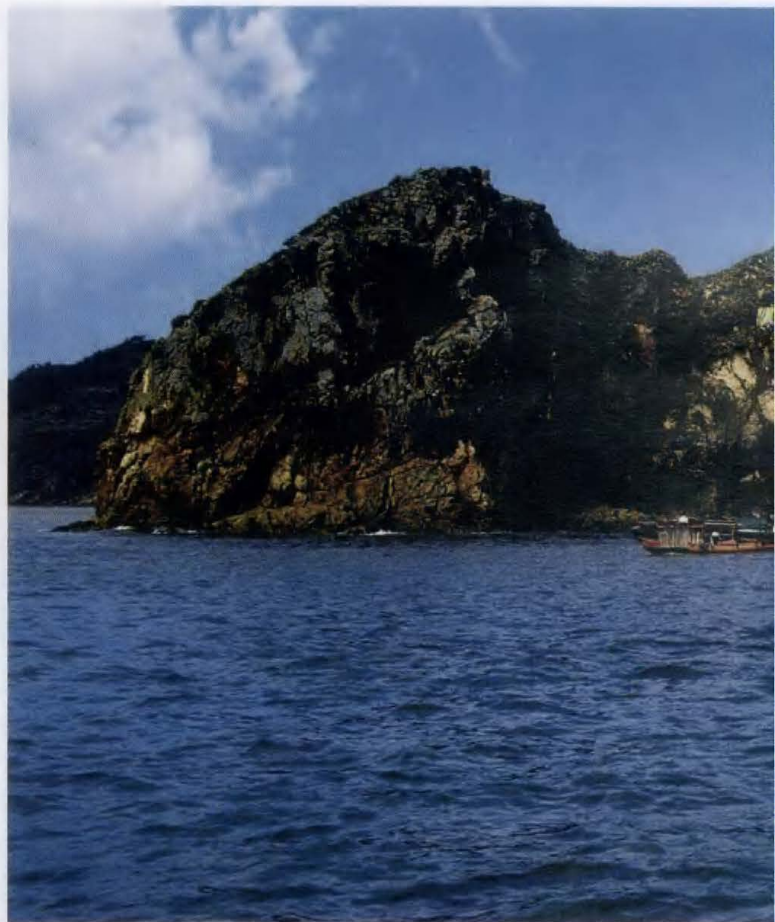
在对大海的禁锢中,福建的海洋文明却在岛屿上找到了新的支点,与岛屿自身的优良条件不可分割。福建海岛拥有得天独厚的港口资源,平潭有港湾、澳口 283 个,东山岛亦有东山湾、后鸿港、铜钵港等诸多港口,连小小的南日岛西寨港亦“深广可泊巨舟”。海岛居民均习水性,“恬波涛而轻生死”,连年轻女子也能“驾稽、点篙、持舵上下如猿猱然”。正是在海岛基地的支持下,明清时期的福建海商得以在海禁、虚岛、迁界等诸多打压下顽强地发展起来,成为当时主导中国海外贸易的一支奇兵。

海岛开发,生态的忧思

踏上今日的福建海岛,特别是一些中大型岛屿,心底会时时浮现两个字——“富饶”。鼓浪屿历史上便有“锦绣烟花自一洲,无边风景似杭州”的赞誉。海坛岛码头熙熙攘攘,林网内果林成片,海边巨大的风力发电机隆隆作响,还有位于世界前列的潮汐电站。至于海岛周边的海产养殖,更是红红火火。然而,福建林业厅的黄海却告诉我,就在几十年前,福建的许多海岛却曾是风沙肆虐、不堪居住的艰苦之地。根据史料记载,在宋末后,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增加,不少海岛的森林植被遭受到严重破坏,“山皆童”,农作物减产甚至绝收。据《平潭县志》记载,平潭曾一夜之间被流沙埋没了 18 个村庄和大片田地。东山岛也有数次大规模饥荒的记载。严峻的生态危机下,从上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海岛上开始大规模植树造林。海防林带来了明显的益处,林网内风速变小,大风日数大幅下降,蒸发降低,流动沙丘也大部分得到了固定。

然而,大中型的有居民岛在海岛中毕竟屈指可数,散步在浩渺碧海中的,绝大多数是面积很小的无居民岛。它们的生态环境,又是什

么样的情景呢? 2008 年底,国家海洋局出台“海十条”,提出“鼓励外资和社会资金参与无居民海岛的开发”,一度沉寂的无居民岛开发再次提上桌面。



繁星般散入大海的无居民岛令人充满想象,除了旅游之外,还有房地产、岛上养殖、种植、港口开发和物流仓库等种种设想和实践。然而,无居民岛大多面积狭小、资源单一,大部分岩石裸露,土壤、植被多不发育,生态环境极为脆弱,甚至一个小小的餐厅也会给海岛及周边岸滩造成严重的污染。实际上,在过去曾经尝试过的无人岛开发中,就出现过滥砍乱伐海岛森林,乱采岛礁,过度捕捞的情况。盲目上马更让无人岛上出现了烂尾工程。

鸟类保护是林业局管，海岛开发则是海洋局管，福建有一千多个无居民岛，而海岛上究竟有多少鸟类资源？相关资料却几乎是一片空白，这才是最大的危机。



海岛生态的恶化曾让海岛居民深受其害，而如果无居民岛的生态被盲目开发所破坏，受到最大伤害的，却是另一群美丽的海岛生灵——鸟类。

一位环保人士告诉我，福建海岛正处在候鸟的迁徙路线上，不少无居民岛既是它们休息的客栈，也是生活和繁衍的快乐老家，特别是黄嘴白鹭、岩鹭等鸥科鸟类赖以繁衍后代的不二选择。而“无人海岛的原始生态系统一旦遭到破坏，很难逆转”。

厦门观鸟会会长江航东说，他们曾花费了1年多的时间，调查了50多个无居民岛，发现至少有一半是海洋鸟类的繁殖和栖息地，其中不乏濒危鸟类，如被称为“神话之鸟”的黑

嘴端凤头燕鸥和黄嘴白鹭。“它们和大陆上的鸟不同，对人类的干扰和生态环境的变化非常敏感。日屿曾经是迄今发现的中国黄嘴白鹭最大的繁殖地，但由于工人在2008年夏天的繁殖季上岛安装航标灯，砍伐了大面积灌木，加上灯塔发出的光热，这个繁衍地遭到了严重破坏，鸟类数量急剧减少。实际上，别说大兴土木，即便是微小的干扰，也可能让它们丧失家园。”他忧心忡忡地说，“鸟类保护是林业局管，海岛开发则是海洋局管，福建有一千多个无居民岛，而海岛上究竟有多少鸟类资源？相关资料却几乎是一片空白，这才是最大的危机。”

责任编辑/陈惊鸿 图片编辑/吴敬 版式设计/李晟
审稿专家/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杨逸畴

下南洋的闽南人

撰文/高伟浓 泓莹 曾筱霞 摄影/马宏杰 等

在沙捞越垦荒的中国人，亲眼看到有的同伴被老虎撕成了碎片，他们开始学着当地的土著人把木屋下面建成高脚干栏，以躲避猛兽的攻击。不过六七寸长的大蝎子和成群结队的野猪，以及莫名其妙的热病瘟疫，还是让这群跋山涉水走入雨林讨生活的人不寒而栗……在过去的100多年间，数以十万计远走南洋的闽南人，在义无反顾地朝着梦想的家园进发时，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故事？

“外公在闽南乡下时，是个小剃头匠，有一次不小心得罪了地头蛇，他一害怕，揣了一抔家乡的泥土，跑到了厦门港，刚好碰上本家的黄仲涵带着一支船队准备到星洲（新加坡）去垦荒，外公跟着他就上了船。80吨的三桅青头船，舱底装满了货，100多个后生不得不挤在甲板上。海浪一打，松木龙骨吱吱作响，当时外公吓得面色苍白。”

六十多岁的周菡坐在厦门的家里，一边跟我比画他的外祖父、著名印尼糖王黄奕住当初出海的情况，一边嘱咐我有空一定到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的三宝垄看看，他们最近刚刚找到黄奕住在海外的另一个妻子蔡缙娘的后代，但是他们难过地发现，远在印尼的亲人既不懂汉语也不懂英文，在音讯隔绝多年之后，彼此已经无法沟通。

这是近代下南洋历史给闽南人心中留下的最清晰的伤痕。在奔赴雅加达之前，我曾专门拜谒过闽南的黄姓宗祠、厦门历史悠久的江夏堂，当年的印尼糖王黄仲涵和黄奕住的名字赫然在目。巧合的是，当我循着印尼



的华文报纸，一下子摸到了泗水的江夏堂时，发现这里竟然还保留着跟闽南一样的黄姓宗祠。在每月固定的时间里，黄姓的后人都会来到这里参加宗亲聚会，如果碰到从中国境内过来的闽南人，他们也会主动向来人提起祖先漂洋过海那段历史。

◎ 在东南亚的福建会馆里，通常供奉着妈祖。妈祖原来是福建的地方神，从宋末元初一直到 18 世纪，妈祖都是跟海商有关的，后来她随着福建移民被带到国外，成为华人精神世界里最重要的凝聚力，也维系着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妈祖信仰被移到海外之后，也有功能泛化的问题，除了被当作海神之外，有些华人聚集区也把妈祖当作财神来供奉，每到节日都会到会馆朝拜。





● 在下南洋的大潮中移民新加坡的华人，对子女的教育十分重视。地位显赫的福建移民还捐资兴学建立了新加坡最早的华人学校，其中就包括陈金声 1854 年创立、并维持了百年之久的萃英书院。作为开埠初期华族社会的育英场所，萃英书院和崇文阁等一样，性质类似中国的学塾，请教师在一个公众地方设塾，招收那些家境贫寒的子弟入学，所学课程大多是四书五经等中国的传统文化，另外还学书法、珠算。供图 / 陈世哲

到婆罗洲垦荒的黄姓人

在近代下南洋的黄姓人群中，出现了著名的黄乃裳。黄乃裳曾经在 1898 年参加过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他在京积极参与变法并多次上书，因而被清政府立案追究，于是他匆匆逃回福建，开始寻找新的出路。之后，他从一个叫力捷三的朋友那里听到马来亚以及周遭地带富饶却未垦辟的情况，决定到海外去寻找一块地旷人稀之地，开荒生产。1899 年，50 岁的黄乃裳来到新加坡停留了一年，寻找可以开垦的土地。

不过当时的新加坡对闽南人并不像沙撈越那样宽松，他们有一项规定，专门是针对“唐山客”的，也就是从中国来的闽南人。他们首先要被运送到南部的圣约翰岛检疫站，不分男女脱光衣服喷药消毒。这对中国人来说无疑是奇耻大辱，因为中国妇女除了在自己丈夫面前裸露身体之外，是绝对不能在外人面前暴露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黄乃裳选择留在了婆罗洲西北部的沙撈越。沙撈越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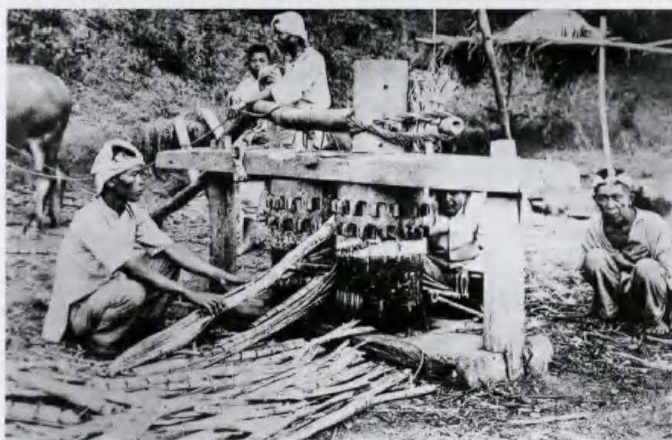
马来语，意思是：把王位让给你。明万历年间，婆罗国（在婆罗洲）的“国王”就是福建人。传说当年一群福建人随郑和下西洋时，被更早来到这里的一伙福建人“截留”下来当了首领。黄乃裳到那里的时候，发现那里早就有华侨居住，但大多属经商与采矿，在河汊密布、雨水充沛而又交通便捷的地方，大部分土地还没有被开垦。拉让河是沙撈越的最大河流，全长 500 多公里。黄乃裳对拉让河沿江几个地方进行了细致的考察，最后终于选定了诗巫（今作泗务）当作垦荒地。随后，他回到国内，动员亲朋好友和乡亲跟他漂流到诗巫，垦荒造田。根据历史记载，通过亲朋介绍，黄乃裳先后带出去了 1118 人。他们分别来自闽清、闽侯、永泰、古田、屏南、福清等地。有时候是一个村庄的男人全部随行，都带着农具、种子，最后还有人携妻拖子，举家一道南来，在诗巫的新珠山建立了大本营，垦荒种植。

当时，早些到南洋的华侨，有的已经组织了一帮人，自己当垦荒的主管，华侨叫他们“港主”。有些港主还承包了辖地的鸦片、

从中国来的闽南人，首先要被运送到南部的圣约翰岛检疫站，不分男女脱光衣服喷药消毒。这对中国人来说无疑是奇耻大辱，因为中国妇女除了在自己丈夫面前裸露身体之外，是绝对不能在外人面前暴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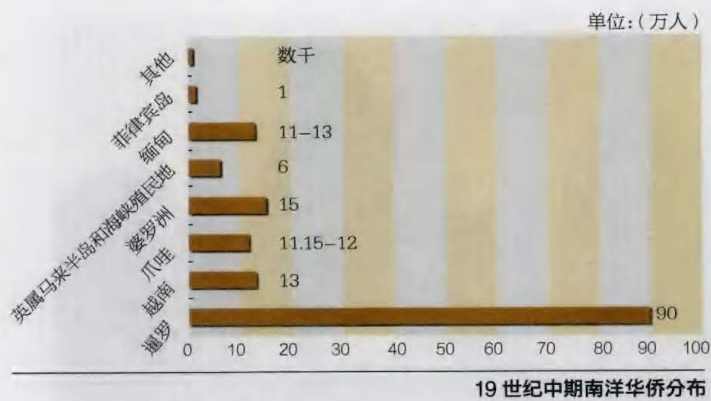
赌博、酒和当铺的税收。鸦片、赌博是当时华人社会的严重公害，为此不知有多少人命丧黄泉，倾家荡产。很多华人“港主”却因为承包了这些而富得流油。沙撈越政府也不例外，他们频频向各埠推销鸦片，以此增加税收。但黄乃裳平素最为痛恨的，就是吸食鸦片和赌博。他坚决反对在垦场内开赌和贩卖鸦片，最后跟当地土王闹了矛盾，直到被沙王借故赶走。

垦农们到了诗巫，搭起了临时简易住屋——亚答厝（共6座，每座5大间）。诗巫一带湿气很重，因此住房也要向当地土著学习，土著人住的房子叫长屋，离地高一二丈，下面是空地，一根根瘦长的木桩支着上面的“鸟巢”。一般是二三十家连在一起，像一列“火车”。建筑材料不是竹就是木，全部来自附近的森林。一般栋梁椽柱用木料，其他地方多用竹料，连地板都用竹片铺成，如果再讲究一点，就铺上棕片。各家的卧室、厨房用竹片隔开，屋顶则用亚答叶覆盖。户外还有简陋的阳台，可以晒谷子，也可以举行各种仪式。长屋地板下方的空地，则饲养牲畜。垦农的临时住屋高出地面三尺，建屋的材料全都就地取材。屋顶盖的是亚答叶，其余全都用木材做成。垦农们住在房里搭起的大通铺中，如果某人带有家眷，就在房间用“加正”（当地用泥巴、棕叶制成的大帘子）隔开成前后两间，后间也有个小门。至于地板，只用小原木捆绑铺成，高低不平，中间还有许多空隙。男人还不要紧，最麻烦的是缠足女人的小脚，一不小心就在空隙中陷下去，被夹在里头，痛得



● 最初到南洋的移民，大都人生地不熟，食宿都成问题。有些投亲靠友过去的，就在熟人家搭伙，住在亚答厝搭建的吊脚屋里。会些手艺的人，就到街头摆咖啡摊和修鞋摊谋生（上供图/陈世哲）。不会手艺的，通常到胶林里割胶、打杂，或者垦荒种地（中供图/陈世哲）。垦农们种植的农作物包括稻谷、蔬菜和甘蔗，到了甘蔗收获的季节，大家要一起“搭帮”，用简易的机器加工甘蔗。（下供图/朱庆福）

有的开始学着当地的土著人，把木屋下面建成高脚干栏屋，蟒蛇们充其量只能在木屋下面兜转，爬不到房间里来，不过六七寸长的大蝎子，却冷不丁就钻到蚊帐里面来咬人，害得垦农们不寒而栗。



国别	人数 (万)	籍贯	人数 (万)
印度支那三国	29	潮州	180
暹罗	250	福建	120
缅甸	19	广肇	80
马来亚	250	客家	70
印尼	81	海南	40
菲律宾	13	其他	20
其他	1	合计	510
合计	510		

20 世纪 20 年代东南亚华侨数量、分布与籍贯

● 到 17 世纪初，东南亚各贸易中心华侨总数约为 10 万人，籍贯以闽人为主，大概占 70—80%，到 19 世纪中期，东南亚各地的中国移民及其后裔数量超过 150 万，闽人约占 52 万。东南亚华侨在 20 世纪 20 年代已有 500 多万，至 2007 年，东南亚华侨华人约 3300 多万，其中约 1000 万是福建籍。

资料来源 / 庄国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

嗷嗷叫不说，伤筋损骨也是司空见惯。垦农在临时住屋后面另搭有厨房，架了七八口大锅，还有很多小锅，但还是不够用，初期，要两三家合用一口锅。1902 年夏天，垦农居住的地方遭遇大风，6 座大屋全部成为一地散木，只好另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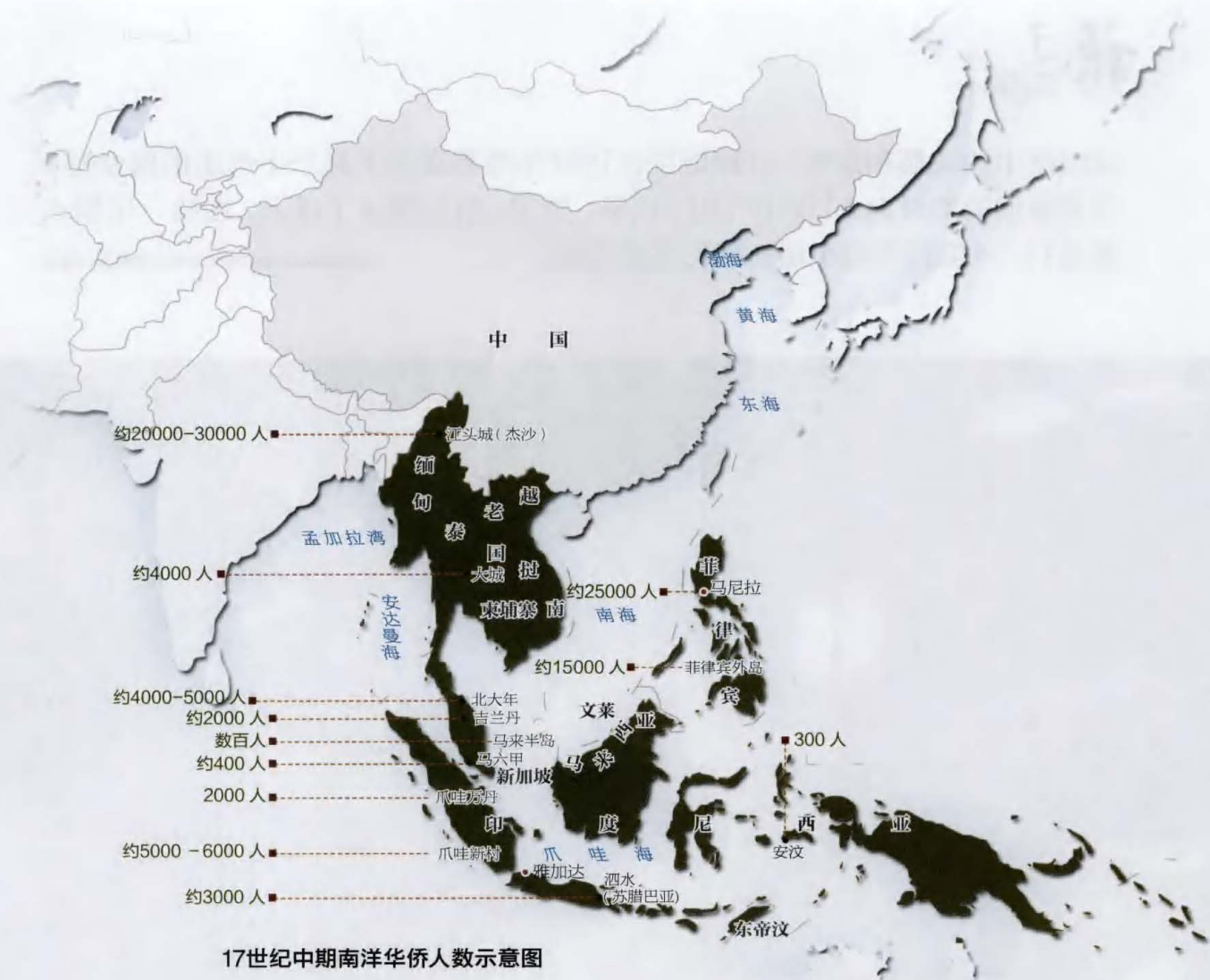
黄乃裳自己住的，也是租来的一间木屋，他带着职员住在那里。由于操劳过度，1901 年冬天他得了胃病，一直到次年秋，情况越

来越严重，病发时疼痛难熬，每天仅靠几片面包、一点牛奶和两三根香蕉硬撑。好在最后终于熬了过来，不过让黄乃裳和垦农们最头疼的，是野兽和恶劣的气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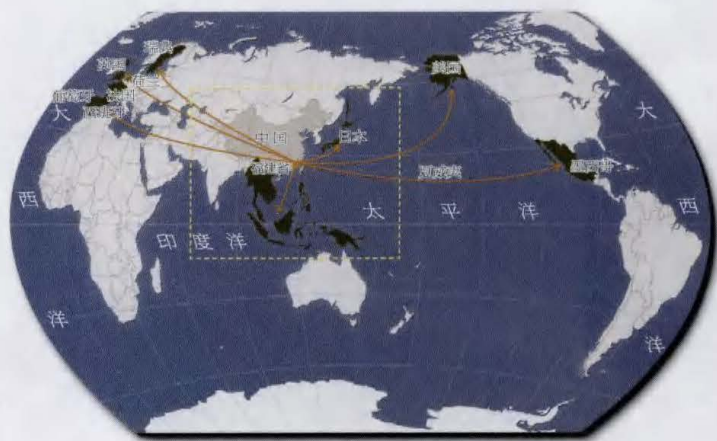
刚到诗巫时，垦农们常常受到老虎等猛兽的侵扰，一些同胞还真的被老虎撕成碎片，有比较害怕的垦农就再也不敢待下去了，一走了之。有的开始学着当地的土著人，把木屋下面建成高脚干栏屋，蟒蛇们充其量只能在木屋下面兜转，爬不到房间里来，不过六七寸长的大蝎子，却冷不丁就钻到蚊帐里面来咬人，害得垦农们不寒而栗。再就是野猪，虽然很少拿垦民们的生命开玩笑，但却跟垦民们含辛茹苦种出来的庄稼过不去，它们经常成群结队地开进庄稼地里，饱餐一顿后摇着尾巴扬长而去。

诗巫的气候酷热奇湿，生活上也非常难熬。每顿饭菜都必须吃完，否则放一两个时辰就发馊了。垦农干着活，一天必须冲凉三四次，还不能午睡，否则很容易染上热病。我曾经看到过这么一组辛酸的数字：1901 年 2 月到 1903 年 5 月的 28 个月中，“新福州”垦场的垦农死亡 71 人，其中 1901 年死于痢疾 11 人；1902 年夏，南洋群岛霍乱流行，仅沙捞越一地就死亡近万，包括垦农 14 人；其余不是热病而死，就是过劳不治，失足溺死等。那时节，垦场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今日去埋人，明日给人埋。”

苦难总是在虎视眈眈地偷窥着每一个人，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和沼泽地上，蛇虫滋生，疟疾横行，有时终于清理出一小块可以耕作的空地了，便种上稻谷，但到头来很可能颗粒无收。因为所有的土中不仅遍布着石子，而且到处都是松木的根茎，土壤稀松，加上几乎不可能进行灌溉，种下去的庄稼很难生长。即使生长起来，有时候也会被大雨淹死。不



● 南洋的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包括当今东盟十国在内的广大区域，而广义的南洋还包含当今的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附近的太平洋诸岛。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历史上从中国沿海到东南亚形成了几次移民高潮。自清乾隆朝以来，安南、缅北的银矿铜矿、婆罗洲金矿、马来半岛锡矿，都是华侨开采。爪哇甘蔗和马来半岛胡椒种植园，也是由华侨承包的。越南南圻、暹南的垦荒辟田，华侨也是主力。到清末，华侨已达400万之众，九成以上聚居南洋。北美、澳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华侨约有30多万。印尼华侨、新马华侨和缅甸华侨中间籍者最多，菲律宾的华侨有九成是闽南人，其中半数来自晋江。资料来源 / 庄国土承担的《清史国家工程·华侨志》



近代福建人下南洋和现代移民示意图

仅如此，老鼠、麻雀、野猪和野鹿还经常光顾，糟践已经播种的稻谷、蔬菜等农作物。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有不少人打了退堂鼓。有的回到了国内，有的转往新加坡、苏门答腊另谋出路，剩下来的人则开始转种橡胶、胡椒。据后来被誉为诗巫第二港主的刘家洙在他写的《侨南记》中回忆说，他们好不容易熬过了5年，才有收获。事实上，能够这样摘到成功

果实的，毕竟还是少数，还有不少人客死他乡。更多下南洋的福建人，则融入了当地。在那个年代，出洋的华侨中，家有一妻，外有一妻甚至多妻是普遍现象。像我在厦门遇到的周茵，她的外祖母王时就是印尼糖王黄奕住在唐山明媒正娶的妻室，在丈夫远洋的时候，她们侍奉着公婆，替远隔重洋的夫君尽孝道，其中酸甜苦辣，唯有她们自己知道。

回国途中的颠簸和恐惧，让阿嬷现在还对车船等交通工具产生严重的眩晕感。当初他们的船驶向“七洲洋”时，风暴、黑潮、暗云都压了过来，连续一星期不见天日，风浪将整艘小船折腾得破败不堪。





大量的华人涌入东南亚后，对当地的生产、生活以及经济、文化建设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方面，许多华人在侨居国从事海外贸易，形成了沟通中国与海外贸易的商业网络，另一方面，华人大量发掘中国传统文化，整理出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存。比如会安“叶同源”青花瓷店的华侨老板手中捧着的这只福建师傅烧制的高腰越南式青花瓷器（左），还有从沉船里打捞出来的铜钱（上），这些铜钱原本是装在瓷器里的，随着瓷器一起被打捞出来，后来瓷器碎了，里面的铜钱还保持着胶合的形状。

特殊的侨眷

我在厦门的时候，就曾经遇到这样一个侨眷，她是我一个同事的阿嬷（闽南语中称呼“奶奶”和“外婆”）。同村的人一直叫她“番婆”，这是闽南语中对具有海外血统的人的称呼。这位阿嬷是中缅混血儿，她的父亲是下南洋的华人，而母亲却是缅甸当地女子。她有着充满异国风情的容貌：深陷的双眼、高高的鹰钩鼻、宽厚的嘴唇。

上世纪40年代，日本侵占了缅甸。为了逃难，14岁的阿嬷跟着哥哥和父亲回到了故乡厦门，而她已经成家的大哥、二哥就留在缅甸继续经营家族的金店生意，另外一个兄弟去了马来西亚求学。回国途中的颠簸和恐惧，让阿嬷现在还对车船等交通工具产生严重的眩晕感。当初他们的船驶向“七洲洋”时，风暴、黑潮、暗云都压了过来，连续一星期不见天日。风暴将整艘小船折腾得破败不堪，海船上备用的棺材木料，都被拆下来修补船舱。根据郑和下西洋的相关史料，“七洲洋”是指中国海南岛东南海面上，即今西沙群岛海域，古代是下南洋的必经之路，以凶险闻名。《星槎胜览》一书曾提出航行南海“上怕七洲，下怕昆仑”，“七洲水急，昆仑风狂；针迷舵失，人船莫存”。

对于当时在海船上的经历，阿嬷的回忆只有“天翻地覆”这四个字。与他们同船的林小姐熬不住，生病了，船上简

很多闽南女人从新婚之夜就没有见过自己的丈夫。可是万一丈夫在海上发生什么意外，无法回来，那么新娘还是会以媳妇的身份照顾这个家庭。



在福建人聚集的会安，有一间叫“叶同春”的老字号瓷器店，里面收藏着大量青花瓷，它们都是店主祖上传下来的，或者是从民间收购和海里打捞上来的，既有漳州的也有潮州的。店主的祖宗牌位就供奉在店里，显示出他们所经营的古董和文化都是跟华人有关。

陋的医疗设备根本没有办法应付，就在海船开出“七洲洋”不久，林家的小姐妹就离开了人世，但是原本在海船上备下的棺材已经没有了，热带的天气又不允许尸体过长时间存放，一船的人最后给林家的小姐妹选择了水葬。她的尸身被白布包裹着，永远地沉入了大海。阿嬷在海洋上完成了与好友的道别，她记得那个小姐妹的怀里抱着一尊妈祖像，大人说这能保佑她的灵魂回到故乡。

阿嬷离开缅甸回国后就没有再回去，同事的家里放着唯一一张阿嬷年轻时代的照片，三十几岁的阿嬷梳着两条大辫子，坐得笔直。可是她丈夫的位置却是空的，他在出洋不久就客死他乡，那时候阿嬷刚 28 岁。由于

尸骨无法运回大陆，和祖祖辈辈客死他乡的福建人一样，阿嬷偷偷地在夜里请道士为自己的丈夫举办了一场“引水魂”的仪式。村子里的人相信，死在海外的亲人一定是希望魂归故里，通过做法事，能够在妈祖婆的指引下，将亲人的灵魂成功地带回家乡。

我曾经目睹过“引水魂”的仪式，一家人扶着空空的棺材，请道士在海边做法事，海边还停留着刻意用白纸叠成的纸船和纸飞机，希望死者的灵魂能够坐船或者坐飞机回到自己的故乡。有些还会把死者生前的衣服套在竹竿上，在海边祭坛上点燃香火，这是指示游子回家的标志。在闽南，从古到今，许多村子里的男人总是找机会和途径出洋闯荡。成

功了衣锦还乡，留下一座座宏伟张扬的红砖大厝，失败了或许连掩埋尸骨的地方都没有。一副空棺、一尊牌位或许是最后见证自己存在过的唯一痕迹了。

在很多村子里，成寡妇的不止一个，有的在结婚当天，因为新郎在“番瀝”（闽南语的海外，主要指东南亚一代），赶不及回来，就由大公鸡代替新郎踢轿门，完成庄重的拜堂典礼，所以很多闽南女人从新婚之夜就没有见过自己的丈夫。可是万一丈夫在海上发生什么意外，无法回来，那么新娘还是会以媳妇的身份照顾这个家庭。

除了留守的闽南女子之外，在当时下南洋的闽南人中间，也有女人。然而在19世纪中叶以前，女人出洋仍然是破天荒和不可思议的。清朝政府历来禁止妇女出洋，一旦抓获，定究重罪。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正月，有一个叫王界的闽南人带着太太到了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竟引起全城轰动。不过船返程后，不知是谁将“王太太”下洋的事泄露出去，当局大惊失色。下令从严查处，致使数人受到株连，丢掉了脑袋。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当年黄乃裳带到诗巫去的闽南老乡当中，有女人是无可置疑，因为就在那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下，诗巫垦场里还有20个婴儿呱呱坠地，让人在大自然的冷酷中多了一份对生命的期冀和礼赞。

只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侨生

我不知道在印尼泗水江夏堂见到的黄姓家族中，有没有那些当初在丛林里诞生的婴儿的后人，但是我见识到了黄姓家族的新生力量，其中有一个叫黄毓顺的印尼第三代侨生，他的祖父在上世纪初从泉州晋江来到了印尼。他听祖父说起，那时已经有小火轮了，不过走一趟南洋仍然需要在风口浪尖上颠簸整整一个星期。闽南人戏谑下南洋漂泊是“浮脚桶”，形象地道出其间的艰辛与风险。

黄毓顺的父亲是在印尼出生的，随后，他的父亲又按照闽南的传统，回到故乡娶亲，然后把太太带到了印尼。黄毓顺和弟弟都是

在印尼出生的，从鼓浪屿来的一位华侨银行家和房地产商告诉我，黄毓顺只读了3年华文学校，生意却做得很大。参加完黄姓宗亲聚会之后，黄毓顺驾驶着他那部顶级配置的凌志车，带夫人一起陪我们从泗水到另一个城市去参观他的企业。碧油油的热带村落间，错落有致地嵌着华侨经营的各式企业。

“这是非常肥沃的土地，掉一根木头都能长出一片森林来。”黄毓顺说。

黄毓顺小时候在华文学校读书，后来学校被印尼政府下令关闭，他不愿意读印尼文学校，就开始像父亲一样做小生意。黄毓顺做的是些小点心，每天挑到市场上卖，慢慢积攒了一点钱，黄毓顺又开始贩卖粉状饲料，在1976年，黄毓顺用赚到的钱给家里添了一台电视机。

现在黄毓顺已经成为当地侨民心中最厉害的角色，他在印尼境内有4个公司，一天要生产1500吨饲料。在华人聚集区，他还新盖了一幢占地1000多平方米的三层楼，依山傍水，前面就是茵绿如梦的高尔夫球场。内部装修用的全部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材料，他还特地在楼内安装了一部昂贵的电梯，说是母亲年龄大了，上下楼不方便。

黄毓顺告诉我，他准备在2009年9月9日9点搬进新家，以求全家长久平安。离开故土这么久，他的祈福心理竟然还跟我们在国内见到的一样，这让我觉得很惊讶。从这点来说，他的身上还保留着华人最清晰的印迹。黄毓顺的太太是客家人，可是不会说汉语，他们的女儿，学习成绩在全印尼是数一数二的，不过被夫妇俩送到了中国上海去读书。黄毓顺反复跟我强调：“我要求我的孩子既通英语，更要懂中文，一定要懂！”

黄毓顺的话让我很感慨，《闽都记》说，明朝永乐年间，有来自福州的人到马六甲定居。这群人分别姓阮、芮、朴、樊、郝。他们到了当地后，纷纷娶当地女子为妻。于是，第二代以后，中国人的血液便越来越稀释，第三代后便连自己的本姓也不会写了，只剩下发音。后人把他们的发音记录下来，便成了远、

两位美丽的华侨少女主持庆典，庆典非常热闹，满耳尾音绵长的越南语。她们偶尔也说中文，不过听起来疙疙瘩瘩的。当地的侨民说，不到不得已，他们不说中文，想说，但不会说。





○ 在东南亚华侨的移民历史上，由于受到侨民所在国政策和法规上的限制，华人大多致力于商业和艺术的发展，积累了巨大的财富，比如在印尼，有一种说法是华人的商业机构几乎“掌握了90%以上的经济命脉”。在今天华人第三代侨生中，动辄花费上千万修建私人别墅的也不乏其人（上）。不过，在印尼的华人参政还是会受到约束，华侨内心希望的，是大家能够选出一个一直对华人友好的总统。（左）

裔、瓢、盆、哮这些姓。而在福建人云集的越南古镇会安，即使是闽南人也不说闽南话了，所有人都说越南语，在会安福建会馆庆祝六姓王爷的宝典上，两位美丽的华侨少女主持庆典，庆典非常热闹，满耳尾音绵长的越南语。她们偶尔也说汉语，不过听起来疙疙瘩瘩的。当地的侨民说，不到不得已，他们不说汉语，想说，但不会说。

后来我专门就侨民不会说汉语的事情请教了会安“叶同源”的叶松家，叶先生告诉我，1911年之后，会安有兴华、培英、养正和育智四所用4种方言教学的华文小学，后来统一成普通话教学，所以他们这一代人都会说普通话、会写汉字。“不过，现在大部分都走了，到国外去了，”他伤感地摇摇头，“非常时期华文学校不让办，没有走的当然也就不会说了。”

叶松家的祖父是国民党元老，他的父亲叶传英是会安著名的抗日十三烈士之一，但这个曾经资助过辛亥革命的显赫家族，后裔基本上都到美国去了，如今在会安只留下3位老人，靠外汇生活。他们静静地守着一楼古玩字画，还有明清时期民窑青花瓷。“叶同源”是会安著名的老字号，如今已经不做生意了，正门两侧透明的玻璃柜里，陈列着琳琅满目的古陶瓷，一些是祖上的珍藏，一些是他们后来收购的。

跟我在其他华侨家庭见到的一样，那些年代久远的高脚瓷缸和细长的青花瓷墩，应该是他们珍藏的唯一一个关于中国的记忆了。也许他们的后代永远不会说汉语，但他们会提醒孩子们记得，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责任编辑/王杰 图片编辑/王彤 版式设计/介彬

福建沿海漫长的海岸线、众多的海岛和独特的地理环境及气候，使这里成为了南来北往的鸟儿的栖息地，有的鸟在这里过冬，有的鸟在这里繁殖，有的鸟干脆留在这里。福建虽然位于大陆的边缘，但是在水鸟迁徙的这个世界里，却是个不折不扣的中心。这篇报道的文字和图片都来自于福建的观鸟爱好者。



福建沿海 那些南来北往的鸟儿

撰文/江航东 摄影/陈林 等



○ 闽江河口湿地地处闽江下游，濒临东海，湿地内又有多块沙滩、泥滩等多样性生态环境，加上丰富的食物资源，使这里成了鸟类良好的停歇地和重要的越冬地。“数丛莎草群鸥落，万顷江田一鹭飞”构成闽江口湿地上一幅幅令人流连忘返的优美画卷。

中国的五种“全球性极危”鸟类中，有两种都出现在了福建的闽江河口

一千里的闽江，从武夷山脉流出，穿过半个福建进入大海。这条福建第一大河在进入福州辖区后，江面豁然开阔，水流趋于平缓，河流和大海的交界处便是闽江口湿地，这里仅面积超过 3000 亩的湿地就有 6 块：鳔鱼滩、马航洲及毗邻的滩洲、蝙蝠洲、浮岐洲、浦下洲、新垵洲。

闽江口湿地既是目前福建省最大的湿地，也是亚太地区候鸟迁徙途中重要的一处栖息地和中转站。

每年的 3 月中旬，刚进入春天，准备在闽江口繁殖的夏候鸟们，诸如池鹭、白鹭、牛背鹭就开始零星赶到这里。4 月中旬，大量的鸟类开始到来，然后便开始在这片湿地筑巢繁殖。8 月起，它们便逐渐离开这里南下。

转眼到了 10 月，南下的队伍刚拖拖拉拉走完，冬候鸟就从北方成群结队地飞来，闽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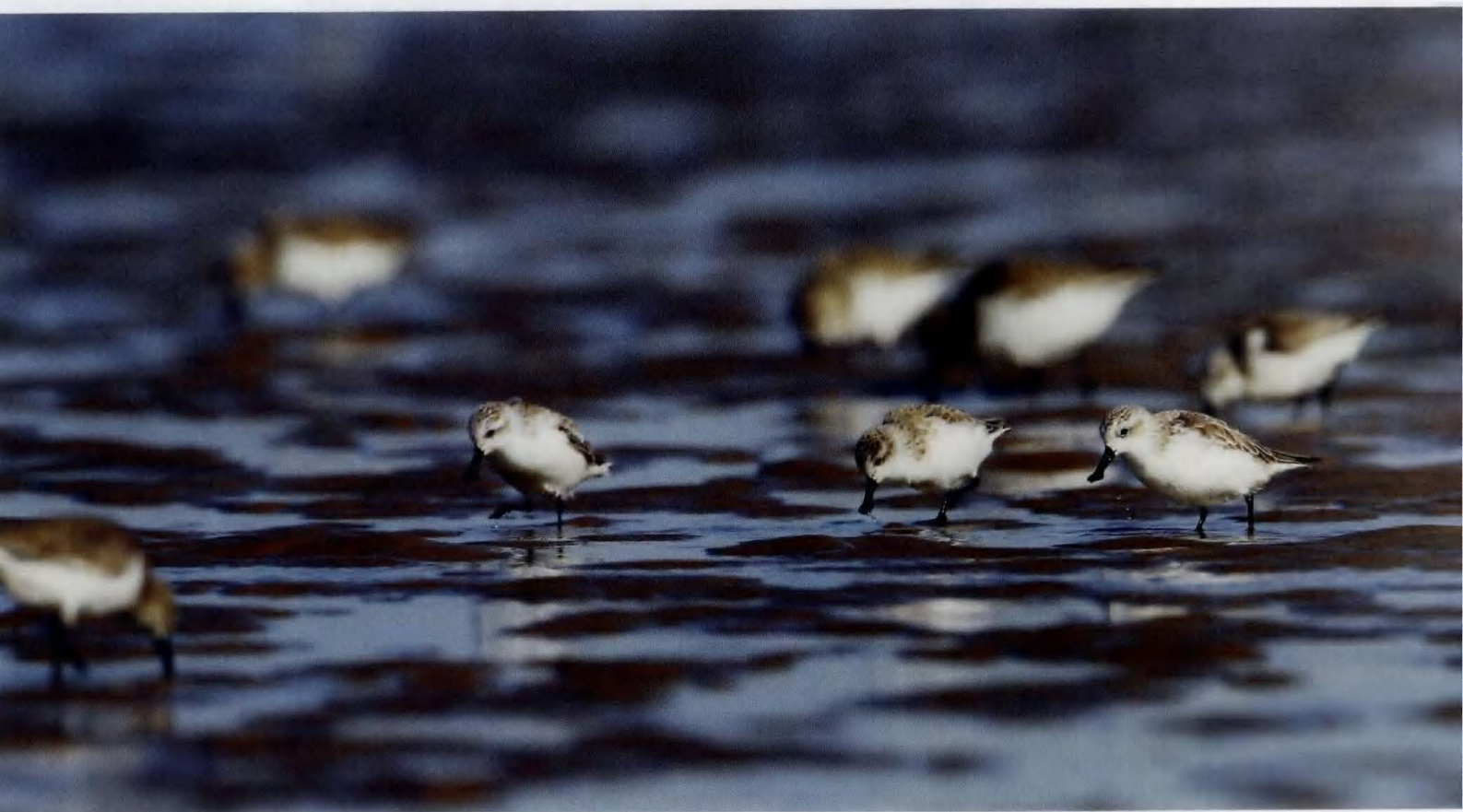
口的冬候鸟有 105 种之多，它们中的绝大部分要在这里逗留五六个月的时间，以躲避北方寒冷的冬季。

除了候鸟，还有 34 种留鸟长期留居在这片湿地和周边水域，日复一日地在湿地水域上空、沿岸、草丛、滩涂和农田里觅食。

2004 年 8 月 8 日，在闽江河口的鳔鱼滩上栖息的上千只鸟中，2 只属于“全球性极危”等级的、被称为“神话之鸟”的黑嘴端凤头燕鸥被发现。

黑嘴端凤头燕鸥又叫中华凤头燕鸥，是鸥科鸟类中最稀少的一种，也是目前世界上最濒危的鸟种之一。自 1863 年被命名以来，到 2000 年，人类对其一共只有 6 次确切的观察记录，而从 1937 年到 2000 年间，一次关于它的记录都没有。因为它实在是太稀少而神秘了，所以被学者专家称为“神话之鸟”。

上海科技馆有 1 只黑嘴端凤头燕鸥标本采集于 1913 年，采集地是福州（闽江口就隶



在中国,唯有闽江口湿地一个地方现存有 2 种极危鸟种。更难得的是,近年来,这两种极危物种在闽江口的数量比较稳定。

右○ 众多珍稀鸟种的频繁出没,使观鸟者在辛苦之余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兴奋。

左下○ 全球性极危鸟类勺嘴鹬在福建闽江口湿地觅食,这种只有 15 厘米大小的鸟,每年冬季,就从俄罗斯境内的北冰洋苔原地带的繁殖地飞行数千公里,到南亚和东南亚的沿海过冬。人们对勺嘴鹬的了解非常少,关于它们像汤勺一样的嘴的用途,至今还是个谜。



属于福州管辖),也就是说,近 100 年来,一个被认为数量不足 50 只的物种,一个没有确切繁殖记录的物种,却一直在闽江口周围顽强地延续着它们的基因。

还是 2004 年,另外一种“极危”的鸟类——勺嘴鹬也在福建被观测到。

在此前后,很多其他罕见的鸟种也不断出现在闽江口:其中全球性濒危(EN)鸟种有东方白鹳、黑脸琵鹭;全球性易危(VU)鸟种有鸿雁、卷羽鹈鹕、黄嘴白鹭、花脸鸭、黑嘴鸥和遗鸥。这片不大的河口地带,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成为了众多鸟类的天堂。

所谓“极危”“易危”,都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对于“受威胁”物种的一种定级,根据“受威胁”程度,由高到低分别为:极危、濒危、易危与近危。比“极危”还稀少的就是野外灭绝了。最新确定的“全球性极危”鸟类,中国共有 5 种:白鹳、白背兀鹫、黑嘴端凤头燕鸥、黄喉噪鹛与勺嘴鹬。

在中国,唯有闽江口湿地一个保护区现存有 2 种极危鸟种。更难得的是,近年来,这两种极危物种在闽江口的数量比较稳定。

闽江口湿地濒危水鸟之所以多,与其特殊的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官方公布的资料,闽江口湿地保护区的面积有 30 多平方公里,保护区外围是面积更大的湿地。这片地区包含有河口水域、潮间带沙滩、红树林沼泽等 7 种湿地类型,不同类型的湿地为不同的鸟类提供了适合的栖息地。

飞临闽江口的黑嘴端凤头燕鸥来自于马祖列岛,这是它在中国的一个重要繁殖地,另一个繁殖地为浙江的韭山列岛。但是,在浙江,并没有黑嘴端凤头燕鸥于繁殖期在海岸湿地活动的现象,其原因,我想就是缘于闽江口湿地有潮间带沙滩。

根据 5 年来的持续观察,我们发现黑嘴端凤头燕鸥喜欢在沙滩上休息、追逐求偶、洗澡,很少见其在泥滩上活动。

那些南来北往的鸟儿，停留在福建海边

每年冬季，沿着中国东部曲折的海岸线，三四只或者十几只黑脸琵鹭夹杂在其他很多候鸟中间，飞往福建越冬。这种全球性濒危的鸟喜欢滩涂和鱼塘，所以，整个冬季，从福建北部的霞浦到南部的漳浦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

闽江口的水鸟是福建海岸水鸟的一个缩影，俯瞰福建省，翻开福建鸟类的历史记录，我们会发现，在全球濒危鸟类评估的权威报告——国际鸟盟红皮书（2007年）中，分布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受威胁水鸟共有27种，福建曾记录过其中的24种，近年来仍有记录的有13种。

福建海岸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濒危鸟种？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水鸟中的大多数种类是迁徙鸟种，而人类又对鸟类迁徙的原因所知甚少，不足以揭开鸟类迁徙规律的成因。

我们只能从福建的地理、气候特点以及人类常年对鸟类迁徙的观察总结出的固有规律来解释。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水鸟高度依赖于湿地生活，因此，湿地的面积大小和类型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可承载的水鸟数量和种类。

根 据福建省政府最新公布的数据，福建省海岸线长度为3752公里，沿海直线长度约500公里，曲折率为全国第一；福建省有海岛1400多个，为全国第二。如此曲折的海岸线和众多的岛屿，构成了复杂的海岸地形。根据专家的分析，福建的海岸有基岩海岸、沙质海岸、红土海岸、淤泥质海岸、生物海岸、河口海岸和人工海岸7个基本类型。

弯弯曲曲的海岸线自然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海湾，不同的海岸类型使这些海湾表现为不同类型的海岸湿地，这又能够为不同的鸟类提供栖息环境。

除了环境，气候也是影响鸟类分布的重要因素。福建省地处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带，在动物地理区属于华中区东部丘陵亚区和华南区闽广沿海亚区交错地带，西北有武夷山脉阻挡寒风，东南有海风调节，温暖湿润为气候的显著特色，莆田的木兰溪以南几乎全年无霜。

温暖的气候为水鸟越冬提供了很好的气候条件，福建省的濒危水鸟中，绝大多数是冬候鸟就是很好的例证。如全球极危的勺嘴鹬，以往人们一直认为它们只是迁徙的时候经过福建，但是近年来的观察证明它们就是在福建越冬，这一新的认识对于勺嘴鹬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

另一方面，那些依赖于热带和亚热带海岛繁殖的燕鸥中的绝大多数，包括黑枕燕鸥、粉红燕鸥、褐翅燕鸥等，在我国近海以北纬



● 闽江口地区丰富的鱼类资源为栖息在此的鸟类提供了充足的食物。闽江口海域因大量河水注入海中带来大量无机盐和有机物质，河床水浅而坡度平缓，又是冷暖洋流的交汇之处，便成了鱼类繁殖、越冬、洄游的必经之地。摄影 / 施和平



31 度为繁殖的北界，这些燕鸥构成了福建海岸岛屿繁殖鸟类的主力，是夏季福建沿海岛屿上最常见、数量最多的鸟种。因此，福建无论冬候鸟还是夏候鸟都非常丰富。

气候条件在决定鸟类分布范围的同时，还在微观上影响着鸟类繁殖的成功率，进而影响其种群数量。黑嘴端凤头燕鸥选择在福建沿海繁殖，可以在繁殖初期（5 月—6 月）躲过台风的影响，因为影响福建的台风以 7 月—8 月最

多，强度最强，此时雏鸟已经初长成，具备了初步抵御风暴的能力。但是，2006 年气候反常，台风 5 月初就直奔闽江口——马祖列岛附近，紧随其后又有多个台风光临福建中北部地区。结果，当年 9 月中旬还有观鸟者在闽江口拍到黑嘴端凤头燕鸥喂亚成鸟的照片，这样的亚成鸟的成活几率肯定大大降低，因为依据往年马祖列岛的观察记录，9 月份它们就要迁徙南下了。



● 2008年7月20日，一只黑嘴端凤头燕鸥的嘴尖卡着一个塑料套的照片引起全球鸟类爱好者的关注，鸟友们心痛地叫它“小管”。据推测，应该是小管在捉鱼时，不幸把嘴尖扎进了漂浮于水面的塑料套。上图中的那只黑尾鸥以为小管嘴里是食物，上来抢食。右页的组图是小管戴着塑料套在沐浴。

通过给鸟类佩戴脚旗和卫星发射器等手段，人们发现了几条重要的鸟类迁徙线路，其中有一条东亚—澳洲的线路，大量水鸟年复一年地沿着这条线路往返于南部的越冬地和北部的繁殖地之间，福建正好处于这一迁徙路线上。更重要的是，从台湾海峡南端的喇叭口向南，鸟类就将开始跨洋飞行，这就意味着许多迁徙的鸟在向北迁徙时，以福建作为跨洋飞行后的首选降落站；向南迁徙时，则以福建作为跨洋飞行前的短暂停息地。

当然，鸟类选择栖息地一定是综合上述多个因素的结果，并随着栖息地环境的变化和气候的变化而作出改变。

保护和破坏同在，所有鸟类家园的命运

保护鸟类和鸟类生存环境的呼吁越来越强烈的同时，建设、发展和破坏也随着推土机

的移动向着海边的湿地逼近了。

人类的活动，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生活垃圾，都会对鸟类的生存造成巨大影响。2008年7月20日，一只黑嘴端凤头燕鸥的嘴尖卡着一个塑料套的照片引起全球鸟类爱好者的关注，鸟友们心痛地叫它“小管”。

据推测，燕鸥捕鱼时是一边低飞一边把嘴伸入水中，小管很可能是在捉鱼时，不幸把嘴尖扎进了漂浮于水面的塑料套，燕鸥完全靠嘴捕鱼，塑料套把小管的嘴卡得无法完全闭合。专家起初认为，小管的嘴已难以完成捕鱼动作，存活的天数恐怕难以超过7天。

小管的消息传出后，有人翻出7月10日的照片，发现当时就已经有一只黑嘴端凤头燕鸥嘴上套着塑料套，显然，其被套的时间还要往前推10天。

此事立即引起海峡两岸鸟类保护部门和志愿者的极大关注，台湾方面制订了在马祖列

黑嘴端凤头燕鸥是目前世界上最濒危的鸟种之一。自 1863 年被命名以来，到 2000 年，人类对其一共只有 6 次确切的观察记录，而从 1937 年到 2000 年间，一次关于它的记录都没有。因为它实在是太稀少而神秘了，所以被学者专家称为“神话之鸟”。

岛捕捉小管的方案，派出专业人士一连几天出海观察，准备伺机登岛捕捉小管。人们起初以为，已经过去至少 10 天了，小管很可能已奄奄一息，无法动弹了。可是救援人员登岛后，小管却飞得很好，怎么也抓不到，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小管的身边还有一只健康状况良好的雏鸟。

于是问题来了：小管是如何捕鱼的？即使

小管能勉强维持自己的生命，那只雏鸟如何养活？几乎与此同时，观鸟者在闽江口湿地发现了小管，而且一连几天都在闽江口湿地活动，看来小管不仅能飞，还能每天往返于马祖列岛和闽江口之间，健康状况还是不错的。

鉴于此，救援队中止了捕捉小管的计划，而改为密切观察。福州的志愿者和福建的政府主管部门安排人员轮流到闽江口监测小管



“数丛莎草群鸥落，万顷江田一鹭飞”，优雅的水鸟构成闽江口湿地上一幅幅令人流连忘返的优美画卷。

的动向。根据马祖方面8月初的最后一次观察，小管依然健康。此后，再也没有人见到嘴上套着塑料套的黑嘴端凤头燕鸥了。所有关心小管的人们在网络上讨论，认为小管应该一直能够捕鱼，那只雏鸟则有可能靠另一只亲鸟，或者由其他成鸟哺育；后期的观察发现小管嘴上的塑料套开始破损，因此，有人乐观地推测那个塑料套已经破碎脱落，也就认不出哪只是原来的小管了。有趣的是，网友们大多赞成这些乐观地猜想，祝福这些数量本已极少的鸟儿顺利完成生命的延续，踏上南下的旅途。

1981年和1986年，我国分别与日本及澳大利亚政府签订了保护候鸟协议，要保护的200多种候鸟中绝大部分都在福建有栖息纪录。

“数丛莎草群鸥落，万顷江田一鹭飞”，优雅的水鸟构成闽江口湿地上一幅幅令人流连忘返的优美画卷。伴随着濒危鸟种不断被发现的喜讯，政府主管部门也越来越重视湿地保护工作，在社会各界的呼吁和努力下，专门出台了《福建沿海湿地保护和恢复规划(2006—2015年)》，闽江口湿地从2004年的县级保护区到2008年升级为省级保护区，并于2006年夏季成功阻止了投资商在闽江口湿地的核心区——鳝鱼滩的养殖业开发。

但是各地对湿地的开发速度并没有减缓，虽然一些点得到了保护，但是更多的湿地正被道路、厂房逐渐蚕食。

就在闽江口一带，由于围垦造地，使闽江河口段湿地不断减少，南来北往的鸟类数量也大大减少。尤其令人担忧的是，长乐市计划在鳝鱼滩边上修建滨江大道，而草洲、马航洲已被福州一家开发商修建“华夏世纪园”。这两个项目一旦建成，将使每年飞经这里的候鸟失去立足之地。

白额燕鸥一般就把卵产在沙滩上，游客和旅游经营者可以轻易发现巢的位置，白额燕鸥对靠近的人类不仅不躲不隐蔽，反而会扑向人的头顶反复俯冲，在人身边不停飞舞，企图将人赶走，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而且，修筑堤坝防洪围垦也破坏了湿地原有的蓄洪功能，在以前，洪水来后，乌龙江（闽江在福州境内的一个分支）水落得很快，现在洪水淹没时间长多了。除了不合理开发，乱捕滥猎也对鸟类生存造成严重威胁。

比湿地保护更严峻的是对海岛的保护。那些在海岛繁殖的燕鸥、黑尾鸥、黄嘴白鹭，一般选择小型的岛礁作为繁殖地，对人为

● 鸟类的生活没有天堂，为了满足人们亲水、近水的生活需求，整个福建沿海各地近年来兴起了一股修建沿海大通道的热潮，海岸边的房地产、休闲旅游纷纷上马，大大加快了湿地变土地的速度。适合鸟类生活的环境已经越来越少。摄影 / 朱荔潮



干扰非常敏感，只要人在岛上走动，燕鸥就不会停止飞行，它们的巢就会暴露在岩石、灌丛之上，十分显眼。黑尾鸥、黄嘴白鹭的卵有鸭蛋那么大，常常成为人的盘中餐。据台山列岛的居民描述，人们最多时曾在台山列岛一次收获 500 公斤鸟蛋，如果这些蛋属于最大的黑尾鸥的话，估计也相当于 7000 枚！2004 年 5 月，厦门观鸟会在漳浦菜屿列岛发现了 40 只黄嘴白鹭和 10 多个巢，巢中一共有几十枚青色的蛋。可是半个月后再度登岛，却不见 1 枚蛋，40 只黄嘴白鹭只剩 6 只，虽然这 6 只黄嘴白鹭通过补蛋完成了繁殖，可

是此后 4 年，菜屿列岛的黄嘴白鹭数量再也没有超过 2004 年的数量。

另外，捕鱼业的迅猛发展也对海洋鸟类的生存造成很大影响。众所周知，20 多年来我国近海鱼类及水生物资源由于过量捕捞，几近枯竭。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湿地和重要的海鸟繁殖海岛来说，建设与保护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人与鸟类和谐相处，不仅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更亟待实际的行动。□

责任编辑/李申 图片编辑/吴敬 版式设计/李晟





作为中国人,没有人不知道台湾海峡和台湾,但如果把台湾这个词语和“埋冤”这个词语联系起来,可能是大部分人所不能理解的。“埋冤”闽南话的读音与“台湾”的闽南话读音是一样的。被世人称为“宝岛”的台湾和“埋冤”这个词语居然有内在的相通,似乎不可思议。而恰恰“埋冤”的发音和内涵上,反映了台湾在开发之初的艰辛。遥想当年,许多福建人带着理想、怀着一腔热血横渡海峡登岛开发,凶吉难卜,但即使有无数人成为冤魂埋葬在台湾岛上,也仍然有人前赴后继。毕竟这道海峡、这个岛屿给人以希望,既充满了诱惑的魅力,也充满了陷阱与危机。回溯数百年的历史,它的确是个欢喜地又是一个是非场。



● 厦金两地如今以友好的面目相对而望。曾经的干戈化为了和平协作的玉帛。大陆的游客往往要求在旅游船最接近金门岛上的标语处留影，把历史上的“是非场”蒙上欢喜的面纱。

台湾海峡 是非场or欢喜地？

撰文/卢志明 颜艺芬 摄影/何经泰 等

闽人前赴后继去“埋冤”岛求生

自古以来，在台湾海峡弄潮的大多数是福建人，他们穿波越浪，走洋如适市，历史可以追溯得非常久远。最近我们有幸看到福建南部东山岛上有关南岛语族考古的新发现，考古发现用事实说明了早在史前文明时期，东山岛上的南岛语族人就凭借这个岛屿在大洋上蛙跳式地迁徙和传衍，他们似乎轻而易举地越过台湾海峡，留迹台湾岛上后，又“跳”往远处。

那么，中原的汉人，又是如何弄潮这流逝不息的海峡呢？明代著名史学家何乔远的《闽书》明确载道：“永嘉二年（西晋，公元308年），中原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所谓以林、黄、陈、郑、詹、邱、何、胡是也。”随后，唐朝的陈元光、王审知又带众多姓氏入闽。有人认为，这些来自中原河洛一带的汉人，辗转进入闽南后，面对着台湾海峡，是不会把这道海峡视为不可逾越的鸿沟的。历史也证明，最终就是入闽的汉人大量地横渡海峡，往台湾岛开发。因此在台湾岛上，许多人认为自己就是河洛人（闽南人），在台湾岛上通行的闽南话也被认为是河洛话。现在的台湾岛上，闽南人是最庞大的族群，此外，还有许多祖籍是福建的客家人。在闽南，有一种古乐，称为南音，它音调委婉，节奏缓慢，很有古风雅韵。在台湾，也同样有这种音乐，他们雅其名为汉唐古乐，用闽南话演唱。

但历史给人的不是宁静而是纷争和战事。河洛人入闽后，这道海峡成了一般百姓逃避战火和纷争、另求生路的一条通道。到了元代，澎湖列岛上已有了朝廷的行政机构，在岛上设有巡检司，随后，到了明代末年，这道海峡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波澜，“颜思齐开台，郑成功复台”的历史大剧在这里拉开了帷幕。这出历史大剧的最先出场者名叫颜思齐，他导演了台湾海峡的第一次移民潮。史书上说他是福建海澄人。

我们来到福建南部沿海的一个古老村庄，这个村庄叫做青礁村，原是漳州古海澄县的一个边远村庄，现在已属厦门市管辖。在这个古村里，一个颜氏宗祠遗址发掘的现场，其宏大的规模让我们感到震撼，这个建于明代末年的颜氏宗祠所花费的财力又从何而来呢？村委颜有能先生很自豪地告诉我们，历史上的开台王颜思齐就是他们的族人，他经营海商贸易发家，根据祖辈讲，当时建这个祠堂，他给予了许多捐助。而颜思齐又怎么与移民潮挂上了钩呢？我们继续在这个开台王出生地的古村寻找线索。连横先生的祖父连横编撰的《台湾通史·颜思齐郑芝龙列传》记载：“思齐，福建海澄人，字振泉。雄健，精武艺。遭宦家之辱，愤杀其仆，逃日本为缝工。数年，家渐富，仗义疏财，众信倚之。”随后，颜思齐凭着个人的威望与魅力，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带有武装的海上商船队，并与当时同样是武装海商的郑芝龙等人义结金兰。但他们毕竟不是安于本分的人，在一次与日本方面发生冲突之后，急而出走，进入台湾海峡，登上了台湾岛。而这时，还是“蛮荒之地”的台湾岛，民众不多，土地肥沃，山川秀美，区域广袤。这不仅可作为躲避是非的场所，更可以在这里施展宏图做一番事业。

这一年是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于是，颜思齐妥善处理好了与原住民的关系，开始了做一番事业的构划。而开疆辟土施展宏图，需要大量的人力。他的兄弟们都来自福建沿海，老家山多地少、灾乱频仍，开辟台湾的前景无疑给人以巨大的诱惑，况且颜思齐还给愿意来的老乡以优惠的条件，来台者发给银两。这时，福建沿海南部的许多民众响应了颜思齐的号召，登台开发，这就是“颜思齐开台”的序幕。

从这时开始，海峡浪涛起伏的频率比以

往增强了很多。1627年，福建大旱，1630年福建再一次大旱，闽南一带特别严重。这时，已经接替颜思齐成为了首领的郑芝龙，向福建巡抚熊文灿建议了一个解决灾民问题的妙招：用船舶送居民往台湾开垦，每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让民众在台湾岛垦荒自食其力。这一招果然奏效。这期间，漳泉民众赴台湾岛开发者达数万人。有人说，这是中国官方第一次有计划地大规模向台湾移民。这时，台湾岛的确给人以一种欢喜地的感觉，到处充满了生机，人们在这里建起了村落，营造了自己的新家园，中国人的根已经深深地扎在了台湾岛上。

但随后的危机也不断产生，在移民过程中，台湾海峡的风浪难测，船只倾覆，北回归线穿岛而过，岛上气候炎热，瘴气弥漫，开发的条件十分艰苦，许多开发者魂断台湾。当时留下了民谣：“劝君切莫过台湾，台湾恰似鬼门关，千个人去无人转，知生知死谁都难。”台湾——埋冤，其名形成由此可知，连横先生《台湾通史》更阐明：“台湾原名‘埋冤’，为漳、泉人所号。明代漳、泉人入台者，每为天气所虐，居者辄病死，不得归，故以埋冤名之。”

收复台湾与“禁海令”的是非纠葛

当台湾开发的成效初见端倪，我国的北方却是战火连连，这时在大洋的另一端，荷兰殖民扩张的舰船也开始驶进了台湾海峡。他们在台湾岛上筑城建寨，奴役民众。面对强盗入侵，当然不能任其横行。1661年，台湾海峡再一次掀起汹涌的波涛。

福建沿海一位被南明王室封为延平郡王的青年郑成功，以福建沿海南部的厦门和金门两岛为基地，率领精兵两万五千人发起了收复台湾的战役。在台湾从事文化工作的秦

河洛人入闽后，这道海峡成了一般百姓逃避战火和纷争、另求生路的一条通道。到了明代末年，这道海峡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波澜，“颜思齐开台，郑成功复台”的历史大剧在这里拉开了帷幕。



泉州沿海渔民在石蚶江口放“王爷船”，让小船顺着潮流漂到台湾鹿港。“王爷”是蚶江的地方神，蚶江历史上有大批移民定居在台湾鹿港，因此，鹿港的“王爷”是从蚶江“分香”过去的。每年春季，蚶江人看准海潮流向放小船，一旦鹿港人收到了王爷船，就会欢庆仰神。摄影师 / 陈世哲

风先生，向我们提供了一张 17 世纪由荷兰人绘制的郑成功发兵攻打台湾热兰遮堡（现在的安平古堡）的图画，在这张图画上，荷兰人诚实地展现了郑军威武雄壮的军容。经过 7 个月的战斗，1662 年 2 月，荷兰人投降了，郑成功收复了台湾。“郑成功复台”这个事件的意义大大超过了台湾海峡的范围，因为在此前，号称海上霸王的荷兰人鲜有失败的纪录。

郑氏政权进入台湾岛之后，即着手系统

地传播中华文化。郑成功的部下陈永华，在台南兴建了第一座孔庙，至今称为“全台首学”，随后，大陆的饱学之士不断地受聘入台任教，中华文明礼仪之邦的教化，在台湾有序地推行。中国人的善良好礼之风，在一个刚开发的岛屿上，渐成风气。难怪，在清代，英国旅行者把在台湾感受到中国人对外国旅行者的友善奉茶的印记绘成图画，刊登在《伦敦画报》上。

但海峡的波涛并没有就此平息，1644 年，

延平郡王的陵墓就在覆船山下。船是台湾海峡上的交通工具，看来，这位大帝还颇有远虑，虽然推崇郑成功的孤忠，但终究不愿台湾海峡再生事端。因此，让这位英雄长眠在一个“船翻覆了”的山下。



● 台湾人对自己的迁徙历史是非常重视的，他们时常遥拜海峡对岸的人神祖先。王审知是五代时期在福建建立闽国的中原人，被誉为“开闽王”，福建王氏以“开闽第一”为荣。图为2008年1月在金门岛上举办的福建王氏宗亲会与金门王氏宗亲会的交流活动。被奉为“八闽人祖”的王审知，千年来首次被金门王氏的后裔所祭拜。

中国北方的战争有了一个最终的结果。清王朝代替了明王朝，而这时，隔着台湾海峡的台湾岛，还竖着大明的旗帜，本来就是中国领土的台湾，当然不能弃之于大清的皇权之外。但大清王朝起初的做法却是很强悍的，下令闽粤居民内迁三十里，企图以经济封锁台湾，逼垮台湾的郑氏当局。禁海令一下，反而造成了闽粤沿海许多民众的流离失所。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中又有一大批人东渡依附郑氏。台湾海峡的是非又多了起来。在这个历史时刻，有一个福建人担当了让台湾回归版图的重要任务。这个人就是福建泉州晋江人，名叫施琅，他原是郑成功的部下，后投奔清朝，但朝廷还是托予了底定台湾的重任。

在厦门同安区有一个高大的石牌坊，据说这个石牌坊是当地现存石牌坊中最高大的，牌坊中的一块石匾，镌刻着四个大字“绩光铜柱”，它的意义是很深刻的。汉代名将马援，因为平定边疆，人们立铜柱纪念他，而这位施琅因为用和平手段让台湾归入大清版图，其功绩当然可以与马援的铜柱齐光。不过，当时，海岛上人心不平，是非纠缠到底是坚守为大明尽忠的气节还是国家一统重要，各有己见。在这种情况下，登上台湾岛的施琅却做了一件颇有看头的事。他特地跑到当时在台南的老上级郑成功的墓前大哭一场，说道，自己与郑成功原本情同手足，后来，各为其主，是非纠缠难以说清。但国家一统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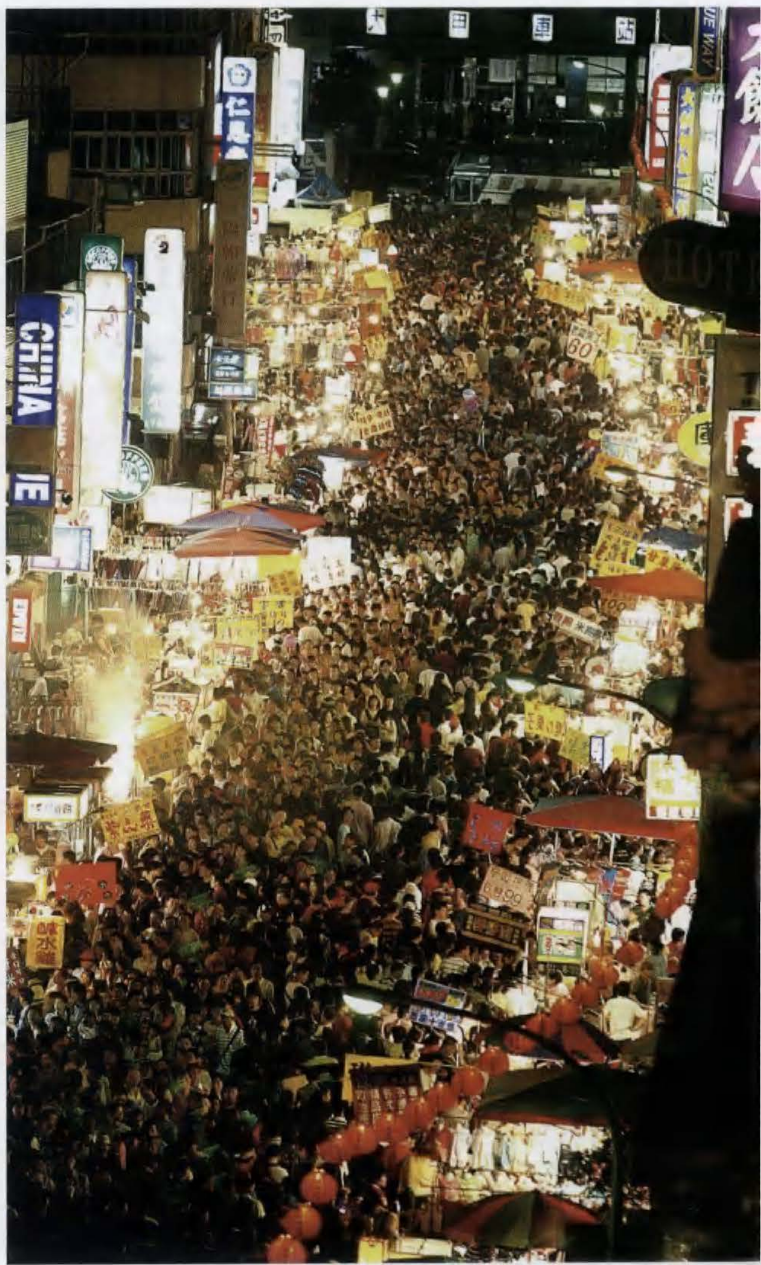
是最重要的事，这一哭倒是让许多人折服了，台湾顺利地归入了大清的版图。

但对于郑成功要怎么定论呢？当时朝廷的最高决策者康熙皇帝一番对郑成功的评价非常中肯，说他是“明之忠臣，非朕之乱臣贼子”，并允许郑成功“叶落归根”，恩准他的陵墓从台南归葬福建南安。当郑成功从台湾迁葬福建祖地南安时，康熙皇帝亲撰挽联：“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当我们寻访到南安郑成功陵墓时，看到那真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延平郡王的陵墓就在一座弧形的山脚下，一问这个山名，却颇让人寻味，这座山名为覆船山。船是台湾海峡上的交通工具，看来，这位大帝还颇有远虑，虽然推崇郑成功的孤忠，但终究不愿台湾海峡再生事端。因此，让这位英雄长眠在一个“船颠覆了”的山下。

从“一口对渡”到“协济台湾省” 看海峡政局的起落

台湾海峡的是非，并没有因为台湾归入版图而厘清。历史的聚焦点慢慢移向了福建省与台湾有着非常重要关系的岛屿，这个岛屿并不大，只有约 130 平方公里，但它却是历史上大陆与台湾往来的最重要窗口。它就是厦门岛，现在是厦门市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这个岛的东北部，有一个古码头叫做五通，现在五通一带的海岸已开发了许多新码头，其中，还有一个专门与金门岛通航的海空连运码头，古码头就在离这个新码头不远的凤头社。

古码头原有一块路亭碑，是清代乾隆年间一位名叫奇宠格的满族官员立的。碑记里说当时这个码头是通往台湾的唯一官道，官商来往频繁，官员和商人在这里常受日晒雨



● 妈祖能镇海安澜，保佑开拓者安抵彼岸。因此，历史上台湾岛所有渡口几乎都有妈祖的庙宇。台中大甲的镇澜宫就是台湾著名的妈祖宫庙。随着历史的前进，台湾岛上妈祖信仰成了台湾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大甲镇澜宫里每年举行的妈祖巡境在台湾被视为是对族群历史、开发历程的一种展现和回顾。最近，福建的妈祖也起驾越过海峡“巡安”，进一步牵系了两岸亲情。
摄影 / Udndata

淋之苦，因此，他和一些官员捐“廉俸”修了这个路亭。

自从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台湾归入版图以来，朝廷虽然取消了海禁，却只允许在台湾海峡间进行捕鱼贸易，仍然严格限制

当海峡政局的波涛巨大地跌宕起伏之际，有一条民间贸易的脉动也在海峡里缓缓流淌。在大陆一些官方文件和记录中，一直没有见到“郊行”这个词汇。而它却在两岸民间的经贸往来中，风风火火了几百年。

海峡两岸的民间往来。1684年，朝廷在台湾设府，隶属福建省，称为福建省台湾府。同时设台厦兵备道，几十年间，台湾和厦门同属台厦兵备道管辖。台厦道同时负责管理厦门和台湾两个行政区，具有管理军事、教育、财政、司法等职能。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台厦兵备道在厦门岛上和台湾岛上各设“办公地点”。据说，道台为了妥善处理两个行政区的事务，半年在厦门办公，半年在台湾办公，因此，厦台两地都有“台厦道”。

台湾设府之初，朝廷对台湾是严加管制

的，只允许厦门一口与台湾鹿耳门对渡，这一规定从康熙二十三年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一直没有变化，整整延续了100年。在这100年间，所有到台湾上任的官员以及朝廷与台湾的公文往来，都要经过厦门岛。一位名叫洪卜仁的福建省文史研究员向我们讲述了当时这个唯一通台口岸驿道的路线走向。官员和公文从北京、福州、泉州至同安后，从同安一个叫刘五店的码头渡海到厦门岛的五通码头登岸，然后穿过厦门岛，到岛另一端的水仙宫码头上船扬帆渡过台湾海峡，最后，在台南

● 台湾汉族中近900万人有泉州血统，因此泉台之间民间的往来十分频繁。图为端午节期间，泉台两岸民间相约，在海上过“泼水节”，尽情表达人间情谊。摄影 / 陈世哲





台湾名人祖籍地图（供图／海峡两岸文化馆）

登岸。这条驿道在海峡两岸都留有遗迹，五通古码头至今尚存，而台南的接官亭旧迹也在。

限制两岸往来毕竟不是根本方法，乾隆四十九年，朝廷终于增加开放了蚶江、五虎门等两岸对渡口岸，对民间往来和商贸往来的管制也放松了。但几年之后，一波又起，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台湾爆发了林爽文起义，朝廷从厦门出兵，平息了这一事端。乾隆皇帝反复思索，一心想让台湾长治久安，亲自撰写了碑文，记述这件事，并把御制的石碑镌刻成两套，一套安放在台南，一套安放在厦门。

此时的台湾早已不完全是朝廷的一种负担，一年三熟、四熟的台湾大米，成了补给大陆军饷的重要来源。台湾向大陆输送物资有了个专用名词，叫“台运”。当时，厦门的水仙宫码头成了台运最重要的码头之一。打开道光年间由兴泉永道周凯总纂的《厦门志》，里面有一卷是专门谈台运的：“台湾内地一大仓储也。当其初辟，地气滋厚，为从古未经开垦之土，三熟四熟不齐。”当时，台湾的大米，除了大部分供应闽省守军，每年还要给守军的家眷八万五千二百九十七担。可见其数量之大。在此期间，朝廷对台湾眷顾的目光渐渐增多了。

在厦门的鼓浪屿，现在有一座由台商洪明章开办的海峡两岸文化馆。在这个展馆里，有一镇馆之宝，是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对一位曾经任“福建台湾府彰化县训导”的福清举人邱德孚父母进行的敕封，圣旨中提到了邱德孚“驱驰奉敕”、“奉职无愆”，故而对养育他的父亲邱锡畴、母亲黄氏进行表彰，因此制匾张扬。匾中提到的邱得孚是原台湾府彰化县训导，在清代，训导是从八品或九品的小官，主管教育，而乾隆皇帝对

这样一位在边陲任过职的小官如此“厚爱”，将其父封为“修职佐郎”，其母封为“八品太孺人”。这两个官衔都比训导的官衔高，可见当时清朝统一版图后，朝廷对在台湾任职官员的重视。

当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正朝着有序方向发展的时候，这块欢喜地再次经历了是非之争，确切地说是又一场捍卫领土之争。

1871年，由于船民的事，日本派兵攻打台湾。1883年，中法两国因越南问题爆发战争，法国陆军挺军越北，同时，海军在台湾海峡的闽台两岸不断挑起战争。炮击基隆，甚至攻陷基隆、占领澎湖。鉴于各种原因和为了加强台湾的防御，朝廷接受了有关官员的建议，于1887年，升格台湾为行省，朝廷曾经对台湾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这时，岛上已有男丁250多万人，户数50多万户，由于当时岛上还有一些隐匿人口，所以当时官方这个数字应该是保守的数字。

台湾建省之初，首任巡抚刘铭传被称为“福建台湾巡抚”。这说明当时台湾与福建的关系仍密不可分，无论人才还是经费，福建省都要给予协济。福建常年向台湾协济饷银44万两白银。从1886年到1890年，5年内，福建省协济饷银220万两，为台湾建省初期的财政支出提供了有力的支援。刘铭传在任6年，推行“新政”，建筑铁路，把各种先进的设施引进台湾，使得台湾成为当时中国最进步的省份之一。

当台湾省的发展受到朝廷的重视因而面临一个良好契机的时候，一场更大的风暴已经在酝酿之中。与我国近邻的日本，经过明

福建人对家族的忠诚是他们移民习惯的一个印记。族谱是记载一姓一族世系及重要人物事迹的书，福建谢氏源流研究室多年调查、发掘、整理谢氏族谱 401 部之多（右上图），谢氏族人谢聪明先生根据同治元年（1862 年）谢氏族谱及现在谢氏的情况编写了一幅 40 米长的海沧石塘谢氏世系表，编辑过程中发现，台湾知名人士谢长廷的祖籍地就在海沧的石塘，右下图为谢氏世系表中谢长廷家族那条支脉由于迁往台湾而中断的细节。

摄影 / 王宁



治维新之后，国力增强，军国主义势力也抬头了，向外扩张的野心急剧膨胀。富饶的台湾岛似乎成了悬在他们嘴边的一块肥肉，恨不得立即把它咽下。台湾建省后的 7 年，甲午战争爆发，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就是日本实现了它对中国领土台湾的侵略企图，这也是历来充满希望和危机的台湾岛遭遇的一场最大的劫难。

终于在 1945 年，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时候，台湾也得到了光复。但台湾海峡的是非纠葛很快就再一次急剧地演化：随着大陆的解放，海峡两岸形成了对峙的局面。

几十年的对峙转向和平之后，人们对这个欢喜地与是非场都寄予了否极泰来的厚望。平心回溯历史，人们猛然醒悟，这道海峡中滚滚的浪涛其实也是不竭的财富之源。

“台湾钱，淹脚趾”

尽管历史的长河使台湾海峡充满风霜血汗，而每每同时又乍现出了斑斓与璀璨。就因为有了这道充满是非的海峡，才能在泛舟其上时另辟机遇与梦想。人们这种感觉由迷离渐至清晰。当海峡政局的波涛巨大地跌宕起伏之际，有一条民间贸易的脉动也在海峡里缓缓流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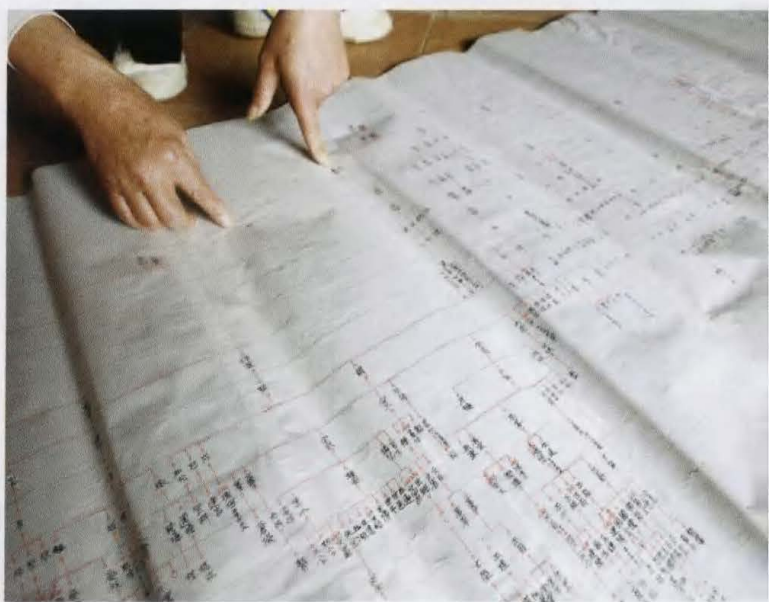
当时最佳的经营模式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隔着台湾海峡，一种特殊的贸易机构在闽台两地产生了，这种商贸机构称为郊行或行郊。

在汉字的标准字义里，“郊”字和“商”字并没联系，因此，在大陆历史上的一些官方文件和记录中，一直没有见到“郊行”这个词汇。而它却在两岸民间的经贸往来中，风风火火了几百年。

郊行以两岸互有固定对接的贸易机构为特征。“郊行”的划分以经营地区和经营行业的分类为主，例如“南郊”、“北郊”、“糖郊”、“米郊”、“纸郊”等等。据说当时台湾岛上有很多野生鹿，人们得到鹿的肉和皮后，制成商品，通过专门的郊行贩运至大陆各港口；米、麦、糖、茶等物品，同样有各相关的郊行进行贸易。郊商回程时，会到漳州购买丝线、漳沙、剪绒、纸料、烟、布、草席、砖瓦、小杉

福建人对水有一种特殊的理解，认为水即是财，水能生财，台湾海峡的海水也不例外。当大量福建移民把台湾岛上的财富开发出来之后，最直接和最大的贸易对象就是找到海峡西岸的贸易伙伴。

早期，台湾的大宗特产是大米、糖、樟脑、鹿肉等。这些特产在海峡西岸有着庞大的消费群体，特产一到达彼岸，就可变成金钱。对这些特产的经营，使台湾形成了很多特色行业，这时台湾也出现了一句闽南话的俚语：“台湾钱，淹脚趾。”意思是利用台湾特产进行两岸贸易，要赚钱太容易了！贸易的兴盛繁荣使两岸的商人有意识地携起手来，利用



台湾海峡的是非，并没有因为台湾归入版图而厘清。历史的聚焦点慢慢移向了福建省与台湾有着非常重要关系的岛屿，这个岛屿并不大，只有约 130 平方公里，但它却是历史上大陆与台湾往来的最重要窗口。





福建省厦门市与金门县位置示意图

料、鼎铛、雨伞等日常生活用品和建筑材料，以及当地所产的芦柑、青果、柿饼等特产；到泉州则主要采买当地的瓷器、纸张；到兴化采买杉板、砖瓦等；有的郊商还到福州载运大小杉料、干笋、香菇以及建宁的茶叶等。

海峡两岸的许多郊行还把行进的足迹延伸到了大陆内部及海外的东南亚等地区。当时有一种往来于两岸的商船叫“透北船”，同时也兼做北方各口岸的贸易，主要运输台湾特产。台湾南部生产的米和糖，经鹿耳门由“透北船”运到厦门，其中的米主要销往福建各缺米地区，而糖则仍直接由“透北船”运往华中、华北、上海、宁波一带销售。两岸郊商

○ 金门岛上当初为了防备解放军登陆而修建的拒马枪已被海水侵蚀得锈迹斑斑，退潮时露出海面的阵列无声地陈述着历史（左图）。“金门钢刀”因其原材料取自厦金炮战时从大陆打过来的炮弹而富有传奇色彩，再加上质量上乘，因此销量很好。（下图）摄影 / 崔建楠



虽然郊商的发展随着日本的侵台而式微和消亡，两岸的经贸往来也随着 1949 年之后人为的分离和对峙而停止了一段时间。但是就像台湾海峡的潮水一样，当每次低潮之后，下一轮的涨潮可能更加汹涌。



○ 金门作为前线时期所修筑的军事工事，如今纷纷成了旅游观光的目的地。图为金门岛开凿的当初停泊作战舰艇用的隧洞。摄影 / 张耀生

所到之处，促进了当地该类匮乏商品的解决，刺激了其他商贸的发展，也开拓了两岸郊商的行商路线和范围。

早在清雍正年间，两岸郊行的经营就已经很红火了。现在的台湾台南，还存在着一座典型的闽南红砖民居老厝称为“石鼎美”，它位于台南西门路二段二百二十五巷四号，“石”是主人的姓，“鼎美”是他们家族的族号，“石鼎美”也是当时的商号。这是一个由郊行发家的家族，最先的创办者是石时荣。生活在乾隆时代，因为他对郊行的经营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而又对台湾的公益事业慷慨捐助，因此，朝廷授予四品顶戴花，使他成了台湾第一位红顶商人。

石时荣的祖地在厦门岛上一个古老的客

家村庄，称为坂美村。我们特往坂美村追寻踪迹。古村里现在仍有一座保留相对完好的古宅——大夫第，现在仍然居住着石氏后人。说起这座古宅的来历，它竟然与隔海的“石鼎美”有关，它是石时荣在台湾发家之后，不忘祖地，用 13000 两白银在坂美兴建起来的。

在距大夫第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处郊行的遗址，主人也姓石，老屋是一处占地 3000 多平方米的“九十九间”古厝。现在还有一位石家后人住在这里，更确切地说她是石家的媳妇，名叫林清凤，她对家史和郊行的历史了如指掌。她说，历史上台湾郊商的生意遍及两岸，甚至许多郊行商人两岸互各有家。郊行的生意非常大宗，获利非常丰厚，他们这一家族曾经拥有好几个郊行的商号和 72 艘的

运输船。林清凤的大官(闽南话,丈夫的父亲)石日华,生活在晚清至民国,见证了家族郊行的兴衰。当时,他家郊行的商品之中,就有鹿肉,年轻时的石日华就非常喜欢吃鹿肉,身材长得特别魁梧,还练就了一身好武艺。在光绪年间,中了武举人,给家族带来了荣耀。可是,举人并无俸禄,经济还是靠郊行,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强占台湾,郊行的生意急转直下。强撑到民国初年,已是非常惨淡。随着抗战的爆发,本来就奄奄一息的郊行终于清盘(破产)了。石家的经历也许就是两岸郊行的一个缩影。

虽然郊商的发展随着日本的侵台而式微和消亡,两岸的经贸往来也随着1949年之后人为的分离和对峙而停止了一段时间。但是就像台湾海峡的潮水一样,当每次低潮之后,下一轮的涨潮可能更加汹涌。

亲情成为平息波涛的调和剂

2009年5月18日将在厦门市文化艺术中心举办海峡两岸族谱联展,届时将有2000套涉及30个姓氏的族谱展出,族谱主要来源于闽南地区、台湾和金门。一幅40米长的族谱也将登台亮相,它就是海沧石塘谢氏世系表,是谢氏族人谢聪明先生根据同治元年(1862年)谢氏族谱及现在谢氏的情况进行编写的。身为厦门市姓氏源流研究会顾问的龚老说,通过这次对谢氏历代族谱的挖掘,竟意外发现台湾知名人士谢长廷的祖籍地就在海沧的石塘。

据谢氏族谱记载,石塘的一些谢氏族人于明嘉靖年间迁到漳州的东山岛,康熙年间,又有谢氏族人从东山播迁到台湾的基隆。此前,有人认为,谢长廷的祖籍地在东山,那是因为东山只是石塘谢氏的传衍点,谢长廷家族最

● 厦门环岛路旁边的海滩上,躺着一些当年建设新城市时推倒的碉堡,有的碉堡还是日据时期修的,有的是海峡两岸对峙时期修的,这些碉堡在今天的遗存,更加彰显了和平时期的美好。摄影/阮小榕



寻根谒祖已经成为一股涌动不息的热流，而且逐渐向下一代传递。福建人有一个习惯，在经商时，喜欢与有亲戚关系有老乡关系的人交往。这种现象在台湾海峡的两岸经贸中常有所体现。



福建人有一个习惯，在经商时，喜欢与有亲戚关系有老乡关系的人交往。这种现象在台湾海峡的两岸经贸中常有所体现。早在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强占台湾时，台湾的爱国志士就慨然西渡归国，台湾板桥林家和雾峰林家两大望族的林尔嘉、林祖密以及台湾才女邱韵香等一批台湾志士，回到祖地后，都为当地的经济建设和文化作出了贡献。如林尔嘉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出任厦门保商局兼商会总理，大力提倡兴办地方实业，创办电灯电话公司，督办漳厦铁路，并担任福建省矿务议员，还在龙溪上房创建农场。邱韵香完

早的根就在石塘。这一幅40米长的谢氏世系表对闽南的谢氏和台湾谢氏的渊源关系做了一个梳理，方便台湾的宗亲前来寻根认祖。这次族谱展中还将邀请30个姓氏中的300名台湾宗亲代表前来参加，海峡两岸宗亲恳谈也将同时进行，海峡两岸宗亲共聚一堂，畅叙亲谊，对宗亲来说，也是一项人伦乐事。

除了谢长廷的祖籍在福建外，台湾的许多知名人士的祖籍也都在福建。台胞洪明章先生在鼓浪屿开办的海峡两岸文化馆内，就向我们展示了一张台湾名人祖籍图。图上密密麻麻的人名，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台湾知名人士，他们的根都在福建，他们当中也有许多人已经回到福建来寻根谒祖。

寻根谒祖已经成为一股涌动不息的热流，而且逐渐向下一代传递，向台湾的年轻一代转移。在平常的来闽探亲中，往往会是一代带着年轻的一代，一起回来看看福建的祖地。更有许多台商把自己的子女送到福建的高等院校就读。至于赴台旅游，现在也成为福建人的寻常事。

左上 ● 两岸的关系越来越朝好的方向发展了，台湾地区领导人回福建祖地祭祖的活动也多有开展。图为2000年时吴伯雄作为首位中国国民党政要回到大陆祭祖时在厦门环岛路用望远镜观看金门岛的情景。吴伯雄当时说：“38年前我在金门当兵，没想到今天我从厦门看到了金门。”摄影/朱庆福

右 ● 其实，大陆离金门岛最近的地方是泉州晋江的一个半岛——围头岛，天气晴好时，目视就可看到对面的金门岛。摄影/陈世哲



成《绣英阁诗抄》多与台湾诗人唱和。这都表现出台湾爱国志士对祖地的贡献。

而现在，许多台商寻寻觅觅，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家、自己的根。当他们知道了自己根之所在，他们总会发扬主人翁的精神为故里的发展尽心尽力，到家乡来投资成为他们理想的选择。

厦门翔安的大嶝镇，是一个距离金门岛非常近的岛屿，早在金门解除戒严之初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地的民众就知道金门缺乏蔬菜，他们用小船载着蔬菜来到金门岛的沙滩边上，把一捆一捆的菜摆放在沙滩上，贴上每捆菜的价钱，然后匆匆回到船上，等着金门的民众把菜取走，把钱留在沙滩上。他们收了钱之后又匆匆地上船回程。他们的心中很清楚，这样做是有风险的，说是违法也不为过的。

现在，两岸的民间贸易要活跃和广泛得多了，已经有了许多合法途径可循。现在整个福建都成了台商在祖国大陆投资最密集的区域之一。当然，台商也到长江三角洲和其他地方投资，在那边投资的规模和项目也相当大，有人探究这其中原因时认为，某些台商对台湾海峡还没有签订综合性经济合作协议心有疑虑。但海峡两岸朝着和平、互信、争取双赢的大势已经不可逆转。多数台商并不把历史上的“福建前线”作为投资的一种顾虑，他们在福建以外的大型投资基本上是因地制宜的考虑。

眺望台湾海峡，它仍然是波涛滚滚不息，历史积累起来的恩怨是非、瓜葛纠缠不可能一下子就波平浪息，但愿海峡两岸割舍不断的亲情成为平息波涛的调和剂。□

责任编辑/刘晶 图片编辑/王彤 版式设计/介彬



● 经过三年半的修筑，厦门岛与大陆之间的十里长堤终于竣工了，1956年12月7日，鹰厦铁路挺进厦门市，为当时中国东南部地区最重要铁路干线画了结束符。



讲述 福建前线故事

口述/龚洁 采访/颜艺芬 摄影/李开聪 等

从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到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为止，海峡两岸一直处于战争状态。这场战争的主要阵地就是相距不远的金门岛和厦门岛，两地“各显神通”，不来硬的，专门用软的，看到底谁的“软件”更厉害，更能获得民心。厦门文史专家龚洁先生当时是市委第一书记的秘书，也是厦门对敌斗争办公室的成员（厦门对敌斗争办公室当时是中共厦门市委海防部下属的一个秘密组织），对海峡两岸处于对峙局面的那段历史甚是了解。他为我们讲述了那段时间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投敌金门 投诚厦门

大陆和台湾之间不管是广播对广播的相互“吹嘘”，还是糖衣炮弹的相互诱使，都让海峡两岸对各自的彼岸心存向往。于是，有些大陆的民众就想方设法偷渡金门，我们称他们为“投敌分子”；同样地，台湾的民众也费尽心思偷渡大陆，我们称他们为“投诚分子”，同样是偷渡，称呼各异，这就是国共对峙时期海峡两岸所演绎的偷渡史。当年“偷渡”的方式主要有驾驶飞机和泅水两种，如果泅水的话，大陆这边一定要从厦门走，台湾那边一定要从金门出发。于是当年，全国各地想泅水偷渡台湾的人，便都到厦门来了。

龚老说，当时厦门白城和椰风寨一带的海域树木茂盛、地形隐秘，成了偷渡金门的首选之地。当初偷渡的人很少借助船这样的

海上交通工具，而是在腰间系上三条充足了气的自行车轮胎，借助车胎的浮力铤而走险。这两处海域的潮汐呈螺旋形流动，懂得潮汐规律的人，会利用潮汐的走向，轻易游到金门。然而不巧的是，偷渡的人往往不懂潮汐，被海水冲回大陆的占多数，他们一上岸就会被当地的边防派出所抓去问话。

除了可以从厦门岛内的白城和椰风寨等海域偷渡到金门，还可以选择从鼓浪屿海域偷渡。龚老告诉我们，厦门鼓浪屿灯泡厂的一个工人就是从鼓浪屿菽庄花园九曲桥后面的海域偷渡到金门的。当时九曲桥靠近海边的地方有一个很深的石洞，偷渡的人就躲在石洞里面，观察潮汐的涨落，瞅准时机就下海。据龚老所言，在这里偷渡成功的有两三个人。后来，厦门的部队就派一个排驻扎在菽庄花园附近的黄奕柱的观海别墅，观海别

如果溺水的话，大陆这边一定要从厦门走，台湾那边一定要从金门出发。于是当年，全国各地想溺水偷渡台湾的人，便都到厦门来了。然而偷渡的人往往不懂潮汐，被海水冲回大陆的占多数。

墅内有一个观海亭则被改造为部队站岗放哨的地方。龚老说，士兵站在观海亭上，对海边的状况可以说是一览无遗。后来，想在这里偷渡的都被抓住了。

偷渡的人中，有军人也有平民。龚老说，1967年，有两个姓郭的兄弟偷渡成功了，他们

到达金门后，按规矩交代大陆这边的情况。关于中共的、厦门的、文化大革命的，有问必答。国民党承诺交代之后就送他们到国外留学，国民党后来也兑现了自己的诺言。龚老说，当时国民党情报部门还专门找了一个作家，把郭氏两兄弟所说的内容编成一本书，叫做《天仇》。



在海峡两岸对峙的日子里，两岸的攻心战进行得如火如荼。利用季风风向放飞风筝是当时常用的宣传手段。左页图为1957年厦门前沿的女民兵们向金门岛放风筝的场景，风筝上的标语是号召蒋军官兵弃暗投明、回归祖国。除此之外，大量的宣传品则被两岸分别向对方定点飞行、定时爆破的热气球撒播下来。上图为台商洪明章收藏的当年的宣传单。摄影/徐健

厦门打炮，金门方面也进行回击，海峡两岸你来我往，进行实弹攻击。20世纪60年代，实弹打炮渐渐地减少了，后来则是用宣传弹代替炮弹，海峡两岸的“火力”逐渐减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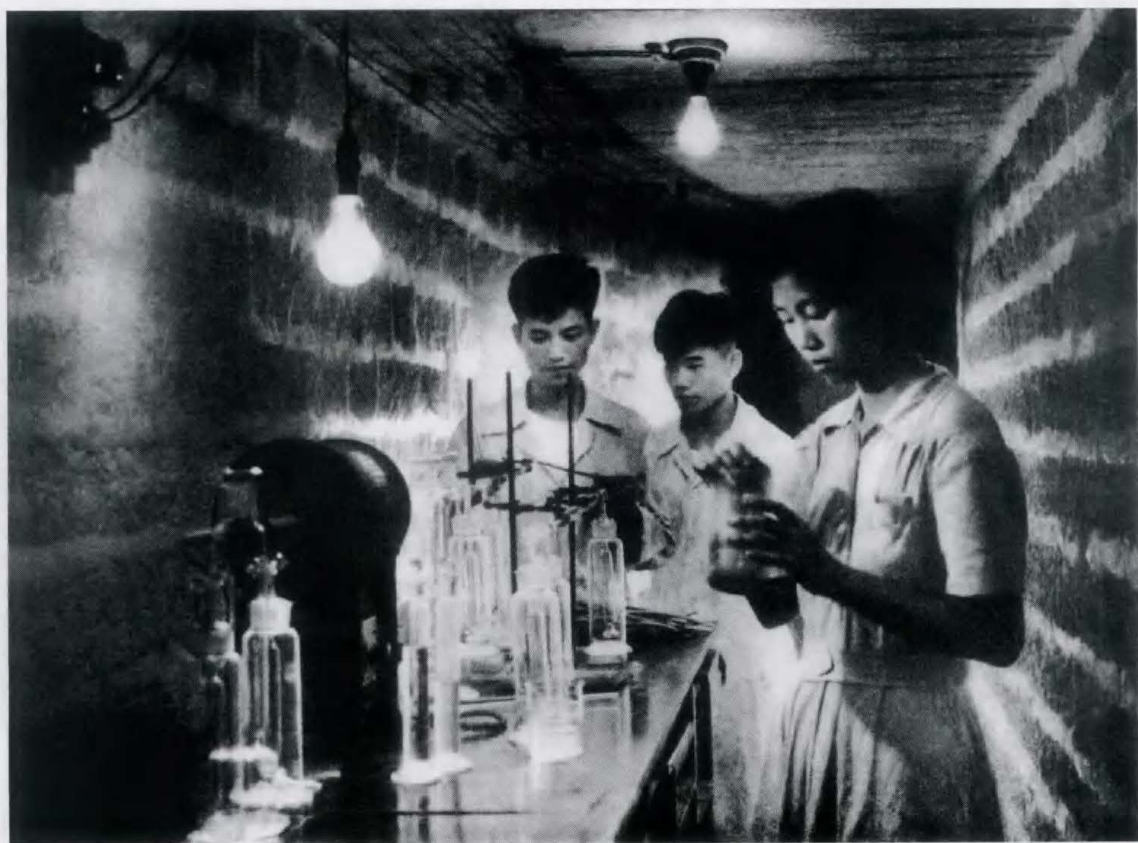
龚老说，厦门有些渔民出海打鱼的时候碰到国民党的船只，国民党就用大钩勾住渔船，把渔民强行带到台湾。据说这些渔民到台湾之后，虽然也受到国民党的“优待”，但毕竟他们的家在大陆，上有老下有小，那种思乡思亲的滋味是一种精神上的煎熬。

龚老回忆，有个四川人跑到厦门想偷渡到金门，但由于不熟悉海路，只顾拼命地在海上游呀游，结果没游到金门，却游到鼓浪屿。或许因为是四川人，对厦门不熟悉，鼓浪屿也不认识，于是，就以为自己到了金门岛，上了岸，看到鼓浪屿岛上一排排欧式风格的别墅，心里暗想，国民党所说的金门遍地是黄金，果然不假，于是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大喊：“国民党万岁。”这一喊倒是引

来了解放军，把他逮住了。

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金门也有人偷渡来大陆，大陆称他们为投诚分子。龚老说那是发生在1958年，也就是大陆炮击金门的时候，金门小担岛上驻扎着一个班，这个班的班长只身带着一块木板，游到厦门。这个班长一上岸就被厦门的解放军发现了，还没等士兵询问，他就哭喊着说：“别打了，金门那边的士兵已经没水喝，没东西吃了，也没力气了，你们就直接过去就行了。”他把金门岛上有多少士兵，多少武器都一五一十地交代了。对于投诚分子，中共也给予较好的待遇，据龚老所言，中共把这位班长安排在厦门杏林的一家工厂工作。

刚开始，国民党对偷渡金门岛的人相当





● 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了炮击金门战役，从此开始了为时21年的厦金两地相互打炮的历史。上图为1960年国民党“中央社”刊发的金门岛上国民党军队向炮膛里填炮弹的照片。金厦两地因此修建了无数防空工事，左页图为厦门大学的学生在地道里做实验的场景。

欢迎，来者不拒，来一个收一个。后来，偷渡工具“鸟枪换炮”了，不再用自行车轮胎了，而是换成小船，而且还装上马达，偷渡成功的几率就大大提高了。但是，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之后，偷渡金门的人就都被送回来了，国民党也不再接收偷渡的大陆人了。

厦金打炮 由真到假

1958年8月23日，为了惩罚国民党军队的挑衅与骚扰，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奉命炮击国民党金门防卫部队和炮兵阵地。厦门与金门因地缘上的相近，炮击也最激烈。厦门打炮，金门方面也进行回击，海峡两岸你来我往，进行实弹攻击。20世纪60年代，实弹打炮渐渐地减少了，后来则是用宣传弹代替炮弹，海峡两岸的“火力”逐渐减弱。

1979年1月1日，大陆宣布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

1958年8月23日，解放军炮击金门，刚开始的时候，炮打得非常激烈，金门的国民党军死伤严重。龚老说，一个月之后，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共方面下令不打人，只打防御工事。炮击金门进行了一个多月，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队快到弹尽粮绝的地步了。蒋介石企图通过美国军舰的护航向金门输送物资，但大陆一看美军护航，就炮击蒋军军舰，这一招其实是“杀鸡儆猴”，美国军舰看到蒋军军舰被击沉了，便连忙逃窜，气得蒋军咬牙切齿，直骂“美国混蛋”，龚老笑着说。同年的10月份，大陆宣布从10月6日起，以7天为限，停止炮击，让国民党自由地补给金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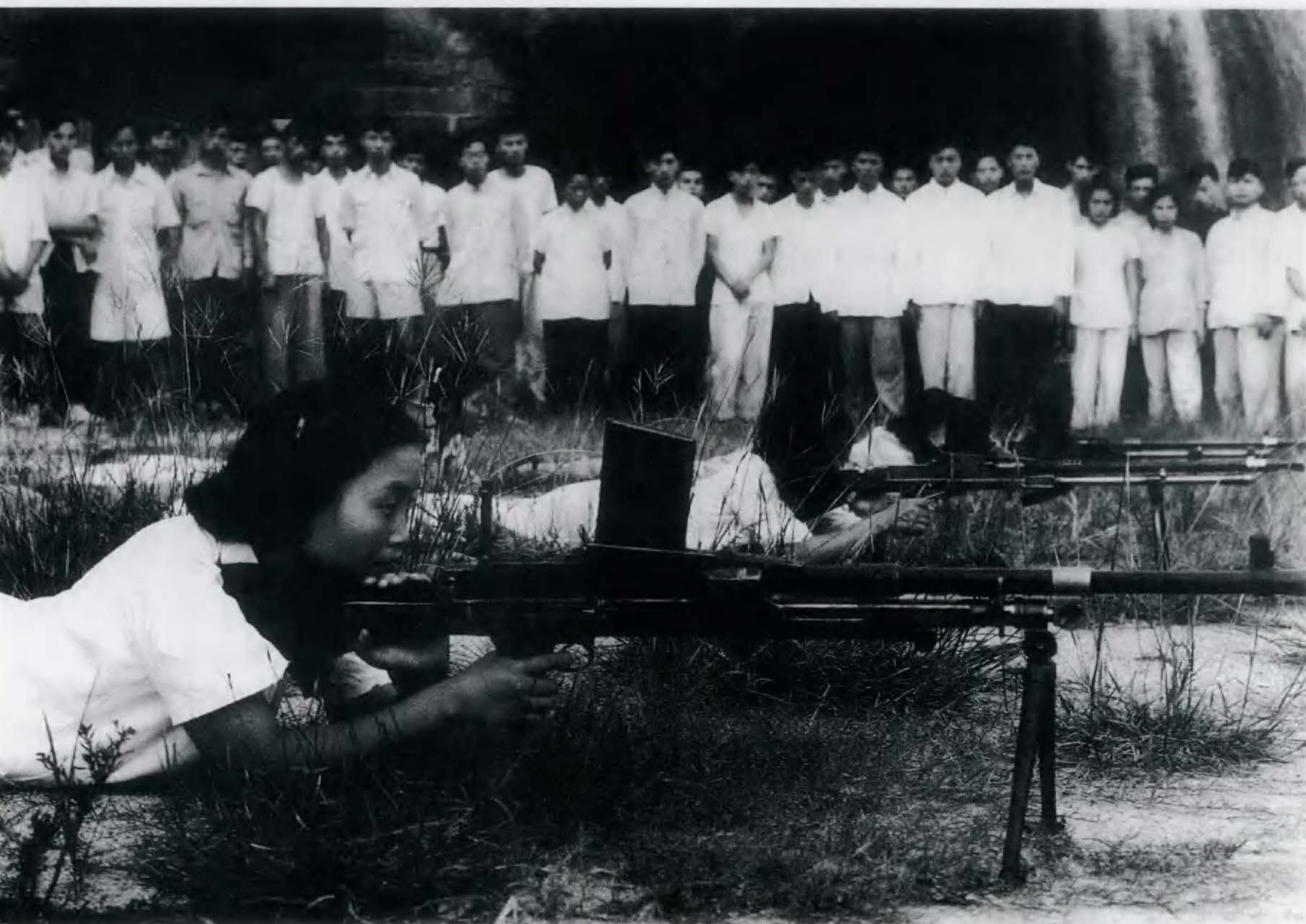
所需的生活用品，但以没有美军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大陆当时的态度十分坚决，“如果发现美军军舰护航，立即开炮”，龚老说这是传达的原话。大陆最初以7天为限，后来又延迟了两个星期，到了10月底，大陆军队宣布，“双日不打，单日打”，海峡两岸的炮击进入了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阶段。龚老说，到了1959年，厦门要对金门打炮，都要首先用广播声明要打炮了。龚老大约记得当年广播的内容：“国民党的官兵兄弟们，我们要打炮了，要打在xx地方，你们赶快避开，躲起来！”金门的官兵听到了，就躲进防空洞。大陆打炮，金门不甘示弱，也疯狂向厦门打炮，他们有时也会用广播：“共军兄弟们，我们要打炮了，你们赶紧躲起来。”不过，金门方面也会经常搞突然袭击，不事先通知。

起初，海峡两岸打炮是动真格的，后来，则改为打宣传弹。龚老说，当时，宣传弹一

爆炸，里面就有很多宣传单。据龚老回忆，当时，他看到一张大陆的宣传单大概是这么写的：“国民党飞行员徐廷泽驾驶飞机到厦门投诚，奖励他黄金，让他在军队里当军官……”，总之，说尽了投诚之后的一切好处，诱惑力十足，其实这也是心理战的一种。国民党的宣传单也是极力宣传台湾的民众过上了怎样的好日子。

两岸广播 你来我往

1953年3月5日，厦门对金门广播组成立，位于厦门角屿岛（现位于厦门市翔安区大嶝镇）。而金门则成立马山广播站与厦门相抗衡，厦金两岸从此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攻心战”。厦门市岛内还设有广播山广播站、胡里山广播站和何厝香山广播站。厦门对金门广播的全称为“前线厦门对敌有线广播站”，到20世纪70年代末，两岸形势较为缓和，就



刚开始的时候,大陆称蒋介石军队为“蒋匪”,台湾则称中共军队为“共匪”,接下来,则是以“蒋军”和“共军”互称,再后来就称“国民党官兵们”和“共产党官兵们”,最后则以“国民党官兵弟兄们”和“共产党官兵弟兄们”相称。



● 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建于 1958 年 8 月对金门的炮战中,之前只有隶属于 31 军的对金门的前沿有线广播站,通过大喇叭播音,颇具战地特色。福建前线广播电台是无线广播,总台设在福州。巧得很,上图中的女播音员吴郁是我们编辑部尹杰的婆婆(供图/吴郁)!而与此同时,厦门人民也进入了全民皆兵的战备状态。(左图)

去掉“对敌”二字,1985 年厦门对金门的有线广播正式宣布停播,金门随后也停止了对厦门的有线广播。

龚老说,厦金之间的广播,那可有意思了,就像民间在唱对台戏一般,你来我往。刚开始的时候,厦金两岸广播对骂是经常有的事情,大陆称蒋介石军队为“蒋匪”,台湾则称中共军队为“共匪”,接下来,则是以“蒋军”和“共军”互称,再后来就称“国民党官兵们”和“共产党官兵们”,最后则以“国民党官兵弟兄们”和“共产党官兵弟兄们”相称。随着相互称呼的改变,广播的内容也由硬变软,采用情感战。龚老告诉我们,有一次,是这么广播的:“xx

(小名)哥哥,你还记得村口的那棵榕树吗?你还记得榕树下的那两头老黄牛吗?你还经常爬到牛背上去,你还记得吗?”就是通过广播这种情真意切的话来俘获金门官兵的心,让他们有想家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心理攻击战。当时,有些国民党官兵听到类似这样的广播,还会情不自禁地落泪,龚老说。厦门的广播总是恰到好处地利用各种天时地利,遇到节日,就专门广播一些亲人的喊话。龚老说,记得有一年新年,广播一位母亲对金门儿子的喊话。其中说道:“儿呀!新年围炉的时候,总是在桌上放一个空碗,放一双筷子,代表着你回来和我们过年呀……”。金门的官兵听到这样的话,能不想家吗?金门广播的内容则

是夸耀他们在台湾过得如何地幸福。总之是遵循一条规则：尽量抬高自己，贬低对方。

小八路接电线 以假乱真

提到《英雄小八路》这部电影，肯定会勾起许多人童年的回忆，它的主题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后来被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至今不时在我们的耳边响起。《英雄小八路》里面小英雄的原型就生活在厦门。龚老告诉我们，1958年8月23日，炮战打响，禾山第四中心小学（现厦门市何厝小学）位处炮战前沿，学校的何明全、黄水发、黄友春、何大年、何佳汝、何锦治、何亚猪（后改名何亚朱）、郭胜源、何亚美、黄火旺、林淑月、黄网友、何星赞等13名英勇的少先队队员坚决要求留下来支援前线。于是，他们小小的年纪就在炮火中自觉承担各种任务，与前线的战士们一起经历枪林弹雨。他们的事迹也得到了认可和表彰，团市委于1958年9月

10日授予他们一面锦旗，锦旗上以“前线少年支前大队”为开头，中间还有“英雄小八路”五个大字。“英雄小八路”这个名称从此广为人知。这些小八路后来大部分都在厦门三中就读，当时，三中的一位名叫王添成的老师就把他们的事迹写成话剧，名字叫《英雄学校，英雄人》，后来改为《英雄小八路》。上海戏剧学院的陈耘教授在王添成老师剧本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创造，写出八场话剧《英雄小八路》。上海电影剧作家周郁辉又将话剧改编为同名电影剧本，1960年在厦门开拍，成为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爱国影片《英雄小八路》。

龚老说，《英雄小八路》是由一个活生生的事迹作为素材的，在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影片起到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作用，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英雄小八路》里面所描述的小八路的事迹，大部分都是真实的，比如帮解放军叔叔洗衣服、修道路等等。但有一件事情是必须澄清的，那就是小八路接电话



《英雄小八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后来被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至今还不时在我们的耳边响起。《英雄小八路》里面小英雄的原型就生活在厦门。



福建前线的子弟兵们不时地能感受来自中央的慰问。上图为 1972 年，歌唱家李谷一随中央乐团到厦门前沿各岛慰问演出的情景。海峡东岸的前线官兵们也会受到同样的关爱，左图为 1981 年台湾当红歌星邓丽君在金门岛上慰问演出的照片。摄影 / 郭尧龄

线是不符合实际的。人体的电阻很大，电话的电流根本无法通过，电话也就不能接通。龚老说，他起初也没觉察到这一点，还给小学生讲过小八路接电话线这个故事，后来，觉得不对了，从此就不再说这个故事了。当年身为小八路的何明全也说，很多人问他电

流通过身体是什么感觉，他也一直向好奇的人们解释，那不是真的。龚老说，文学的虚构是可以的，但《英雄小八路》反映的是真实故事，不能以假乱真，有必要说明这个故事是假的，纯属虚构。□

责任编辑/刘晶 图片编辑/王彤 版式设计/介彤

天翼套餐：

一样的消费，不一样的感觉

四海漫游享从容

从容“漫游”中国甚至全球，超越时空，尽情畅游缤纷互联网海洋。“长市漫”一价资费、接收免费、优质的客服，尽管四海为家，却可随地享受管家般的贴心与惬意。

宽带信号：“永不消逝的电波”

移动网络和热点区域的无线局域网，最高速率可高达11Mbps每秒，信号极佳，即使在高速和磁悬浮上也能保持不掉线。

天翼娱乐我最炫

随时随地看电影、听音乐、玩游戏，写博客，尽赏最Hi的动漫海报，最In的时尚资讯；当然，更可随时Q到心中的她。



重立价值标杆 志在续写传奇 新凯美瑞惊艳登场

导入丰田全球划时代最新技术G-BOOK智能副驾系统



2009年2月，广州，车市价值标杆车型——新凯美瑞惊艳登场。

第六代凯美瑞本次改款无疑是最为震撼的一次改款变型，配置、技术、外形、价格等全面革新，彰显其作为丰田全球战略车型的厚重地位。

新凯美瑞9个型号产品的市场指导价格区间为18.98万元~27.38万元（除240V G-BOOK等级外），目前已在全国的广汽丰田销售店同步发售。此外，5月增加导入的顶级车型上装载有丰田最新技术的G-BOOK智能副驾，其先进技术超越目前所有中高级车。

“你好，色彩”

——佳能2009年春季新品发布会在京举行

2009年2月18日，佳能（中国）有限公司全面发布了涵盖旗下17款数码影像新品。

包括具备“智慧AUTO”模式的四款IXUS伊克萨系列新品和四款PowerShot博秀系列新品；为用户带来更高影像质量和更简便操作的五款高清摄像机新产品；更加自由组合倾角·偏移效果的两款广角和超广角移轴镜头；以及彰显卓越影像画质的两款高清投影机产品。

“你好，色彩”是佳能的全新诠释，标志着佳能产品在外观与技术上的双重突破。



打破世界纪录 成功穿越美洲

天梭赞助“巴特卧式自行车之旅”

现年57岁的让·菲利普·巴特是一名心脏病患者，曾经历了3次心脏手术。

这位曾身患重病的冒险家没有令我们失望：他佩戴着天梭最新款-腾智系列，骑着卧式自行车，从去年8月的阿拉斯加开始，用双脚穿越了25,000公里，那意味着14个国家，5个时区，以及对整个美洲的穿越！

巴特每天在腾智清脆的闹铃声中开始征程，用天气预报功能预测天气走势，然后在极限行进中计算温度，海拔信息，气压变化。他以完美的表现地诠释了天梭对准确无误的不懈追求及对突破自我的极限精神！



三星W699

——臻金睿智映耀人生

三星Anycall W699，臻金质地，绝佳工艺；双屏视角，非凡见地，属于成功人士的少数理想之物。

臻金，独特的玫瑰金外观设计，华贵而内敛，柔和释放气质光芒。拉丝图案金属材质，尊贵简洁，彰显领袖气质，金属键盘，美观时尚且手感舒适，毫厘间准确把握。

双屏，内外超大双触摸屏，与众不同中显露务实本色。2.2英寸超大外屏，2.8英寸超大内屏，菜单界面可滑动拖拽，手写触摸的那一刻更有沟通的震感触动，心随指动，精彩常伴左右。

CG双网双待，卓然商务为成功人生避开纷扰，5频（CDMA800/1900MHz, GSM900/1800/1900 MHz）漫游全球，完美成就跨界商旅。

500万像素数码相机，自动对焦，补光闪光灯，提醒您留意稍纵即逝的美丽；脸部识别模式防抖功能，随心珍藏心动的瞬间。

三星Anycall W699使您既是创造商业奇迹的巨子，更是可以指点生活的大师，GPS定位让您随时随地查询位置信息；人性化语音导航，音乐播放功能为您唱响契合不同心境的乐章；导航手机商务，更让您无论身处何地都有精彩一路随行。

在您理想的私域，睿智是天赋，远见是气度，事业是成就感，生活才是终点，三星Anycall W699，如同您的臻金人生，多数人仰望，少数人拥有。

